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红墙白宫—30年前的秘密



导言 大白于世的中美最高机密

尘封了近 30 余年的美国与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极机密的谈判记录，包括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对话全文，终于大白于世，以《红墙白宫》(是与散见于市场此类书籍相比解密最高的版本)的专著出版。

本书总共有 18 份当年被美国政府视为极机密的外交文件，深锁在白宫和国务院的保险柜里，其完整性和权威性比英文的《红墙白宫》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在此告慰读者。

这 18 份文献时间的起迄是自 1971 年 2 月下旬尼克松访问中国和毛泽东举行历史性的会谈起到 19 万年元月基辛格因福特落选下台前止，长达 1 年，从这些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到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起伏，中美可以尽弃前嫌，而且变成有默契的战略盟友，直应了英国人所说的：“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选入本书的 18 份文件有毛泽东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 5 次会谈记录，尼克松与福特各占 1 次，而基辛格则是 5 次全程参加，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毛泽东洞悉世局，宏观的战略格局，反应敏捷，思维灵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以他只念过中学，不曾喝过洋水，也不懂外文的情形，而能和基辛格低低面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俱为犹太家族所控制及保守亲台参议员高华德最新的演讲内容，实在不得不令人对毛泽东的国际知识之广刮目相看。

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和尼克松在 1971 年 2 月 21 日初次见面时，根本没谈，只提了一下蒋介石，还用略带诙谐的口吻说，他和蒋介石互骂对方是匪，但他和蒋介石的历史渊源，远超过他跟尼克松、基辛格二人的新关系。第二天(2 月 22 日)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时，尼克松向周恩来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毛泽东对台湾问题提的虽不多，但所谈俱属大原则。1973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和基辛格长谈，毛泽东主动提起台湾，他说台湾和祖国的关系要比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复杂得多，而且他不相信可以和平解决。至于美国和中国建交，必须以和台湾断交为前提。最终卡特遵从“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与中国建交，只不过多了台湾关系法的架构，和台湾维持非官方的往来。

综观收录的对话，最突出的是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一些观点，而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则是轻蔑到鄙视的程度了。如毛泽东嘲笑赫鲁晓夫吹嘘“戴维营精神”和他的美国“朋友”艾森豪威尔等。邓小平则根本瞧不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认为葛是没有主见只会逢迎主子的泛泛之辈。

美国对中苏交恶势不两立，原是求之不得，因此视中国为知己，对中国推心置腹，基辛格每次向中国简报时，把苏联和美国的秘密交涉，一五一十的和盘托出，而把自己与中国的往来经过，则绝口不向苏联提。

上面的种种见于 1971 年 2 月和 11 月基辛格两访中国与周恩来四度会谈的记录。1974 年后，周思来的癌症开始蔓延，而“四人帮”大力展开“批林批孔”的运动，其真正的矛头则指向周恩来，从此周恩来不再过问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事，而由邓小平出面与基辛格周旋谈判。书中基辛格做国务卿时

召集的两次内部会议的文件，甚有意义，值得一读。

一份是 1975 年 10 月 6 日的会议记录。此时尼克松已被迫辞职，美国和中国正常化受水门事件影响，难以进展。另一份是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垮台后的会议记录，从这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集思广益的场景，以及国务院高级官员们的中国政策观。

中国首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虽系军人出身，但观其与基辛格在 1977 年元月福特与卡特政府交接前的对话，粗中有细。至于黄华，早在 30 年代美左翼作家斯诺在延安窑洞访问毛泽东时，他即担任翻译，崭露头角了。后进入联合国后的首任常驻代表，肩负了中国在美联络处和白宫秘密沟通的懂务。基辛格 1972 年 8 月与黄华在纽约会谈时，传递了基辛格要推荐西德和中国建交的重要讯息。

《红墙白宫》能够问世，是附设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的专家学者们，经 6 年的努力的结果，他们利用美国会通过的资讯自由法 (FOIA)，迫使美政府将原先列为高度机密，乃至只能目视的总统图书馆所藏的文献、国务院档案以及曾和基辛格共事的官员们私人文件中搜求，整个过程的神秘诡异，据波尔博士 (Dr. William Burr) 说，就好像侦探办案一样。波尔是位精研外交史的史学家，目前在乔大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担任高级分析员。必须在此说明的是，中文版的《红墙白宫》并非是英文版本的翻译，而只是把档案馆所收录的英文官方文件选其精华译用，故本书与英文原书相辅相成，并行不停，而在观点上及对许多人物背景的介绍，更适合中文读者，更具可读性。

这套秘录，是基辛格本人交代美国会图书馆藏之高阁的孤本外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版本。基辛格的孤本目前仍列为绝对机密，非经他本人特许，外人不得借阅。还规定他的秘录必须等他过世五年后才能解密，公诸于世。

为适合本书的需要，有个别文字略作更动，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朋友更好地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些内幕。

参与会谈人士一览表

美方人士

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1913—1994)

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1947—1951 年任美国共和党众议员；1950—1953 年任加州选出之美国参议员；1953 年—1961 年任美国副总统；1964—1968 年返回民间任法律事务所合伙人；1969—1974 年间任美国总统；后因水门事件，面临被弹劾下台的危机而辞职。

尼克松是首位在任时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福特 Gerald R. Ford (1913 年生)

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1949—1973 年为美国共和党众议员；1965 年当选为众院共和党领袖；1973—1974 年为美国副总统；1974 年 8 月尼克松辞职后继任总统；1976 年竞选时，被卡特击败。

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1923 年生)

哈佛大学博士，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1938 年与父母移民美国，以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1954—1969 年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1958—1969 年为哈佛国际中心执行长；1957—1961 年任国际事务中心副主任；1969—1975 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任内于 1971 年夏秘密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谈，消息公布后，举世震动。1973—1977 年任美国国务卿。离开公职后，创设基辛格合伙公司，自任董事长。现为美中协会主席、电视评论员和专栏作家。

范锡 Cyrus R. Vance(1917 年生)

耶鲁大学毕业。1956—1961 年为美国民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963 年任美国陆军部长；1954—1957 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7—1980 年任美国国务卿。

海格 Alexander M. Haig, Jr.(1924 年生)

西点军校毕业，乔治城大学硕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1970—1973 年)，白宫幕僚长(1973—1974 年)，美驻欧洲部队总司令及欧洲盟军最高统帅(1974—1979 年)。自军中退役后，曾任联合技术公司总裁，里根当选总统后，被任命为国务卿(1981—1982 年)，后因与白宫失和辞职。海格在国务卿任内，美中签定了。

罗吉斯 William P. Rogers(1913 年生)

康耐尔大学法学院毕业。1953—1957 年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957—1961 年任司法部长；1961—1969 年返回民间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969—1973 年担任美国国务卿。1972 年随尼克松访问中国。

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二次大战后美国最强硬的国务卿，追求战争边缘政策，1951 年美日和约的谈判代表。1953—1959 年任美国国务卿。

史莱辛吉 James Schlesinger(1929 年生)

哈佛大学毕业。1961—1966 年间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73 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1975 年间任美国国防部长。

布鲁斯 David K. E. Bruce(1898—1977)

美国著名外交家，战后曾参与执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驻法国(1949—1952 年)，西德(1957—1959 年)及英国(1961—1969 年)大使，70 年代初美与越南在巴黎谈判的代表，1973 年美国在中国设联络处，尼克松征召布氏为首任主任，那时布氏已自外交界退休。

哈比卜 Philip Habib(1920—1992)

爱达荷大学森林系毕业。黎巴微裔的职业外交家。1951 年派驻越南任公使，曾参与和越南在巴黎的谈判；驻南韩大使；1974 年—1976 年间担任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升为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

西斯科 Joseph J. Sisco(1919 年生)

芝加哥大学博士，职业外交家，早年(1936—1940 年)当过记者。曾任国际组织、近东及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自外交界退休后，任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校长(1976—1980)。

葛林 Marshall Green(1916—1998)

耶鲁大学毕业，职业外交家，1969—1973 年任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曾随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访问中国。葛林是日本专家，60 年代曾任美驻汉城代办，香港总领事及印尼大使，1973—1975 年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汉密尔 Arthur W. Jr. Hummel (1920 年生)

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之子，父汉慕毅专治清史，编有《清代名人录》。40年代初，汉密尔在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下同)辅仁中学任教，珍珠港事变后，被日本人关入集中营，1944年逃亡到山东参加中国游击队抗日，1950年进入国务院，先后供职香港、东京、仰光等地，后升任美国驻缅甸大使，1976—1977年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后外放巴基斯坦担任大使，1981年里根当政后出任美国首任驻中国大使。

洛德 Winston Lord (1937 年生)

耶鲁大学毕业，美国外交官，1969—1973年间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并于1970—1973年间担任基辛格特别助理，曾随基辛格于1971年夏秘访中国。1973—1977年任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会长，里根任内继汉密尔任驻中国大使，1993—1997年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洛的太太是华裔的包柏漪，是美国知名的作家。

所罗门 Richard H. Solomon (1937 年生)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1966—1971年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1971—1976年，加州兰德公司政治学部主任；里根和布什政府时期先后任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1991—1993年任美驻菲律宾大使，现任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主席，

格莱斯廷 William H. Jr. Gleysteen (1926 年生)

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之子，耶鲁大学毕业。1974—1976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后任驻南韩大使，自外交界退休后，曾任亚洲协会会长，日本协会主席。

弗里曼 Charles W. Jr. Freeman (1943 年生)

耶鲁大学毕业，职业外交官。1971—1974年任职国务院中国与蒙古科，1972年随尼克松访问中国，担任翻译。曾任美驻中国大使馆的代办，海湾战争时的美驻沙特阿拉伯大使，90年代于助理国务部长任内退休。

阿姆斯特朗 Oscar Vance Armstrong (1918 年生)

戴维森学院毕业，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之子，1946年即进入国务院，1949年前曾在广州及北平任领事。1973—1976年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司中国与蒙古事务科科长并代理副助理国务卿。全球首次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纽约时报)记者莫莫安是他的姐夫。

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1925 年生)

西点军校毕业，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美空军将领，1973—1975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1975—1977年升任为助理。1982—1989年，基辛格合伙公司副董事长；1989—1993年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郝伊 Jonathan T. Howe (1935 年生)

于1969—1974年初获塔虎脱大学博士学位前，担任基辛格的军事助理，并曾于美国海军之核武学院(Nuclear Power School)接受特种训练，派在导弹潜艇“华盛顿号”与“派区克亨利克”上服役过。

曼斯菲尔德 Michael Mansfield (1903 年生)

1951—1977年任美国蒙他拿州选出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并为参院多数党领袖，尼克松访华后曼氏曾与共和党领袖施高特连袂访问中国，布什总统任内的驻日大使。

杰克逊 Henry M. Jackson (1912—1983)

民主党内有名的反苏强硬派，自 1953 年起即任美国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直至 1983 年过世为止。由于其楔而不舍地为他选区争取国防工作，而被冠以“波音公司的参议员”之名。

斯诺 Edgar Snow(1905—1972)

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美国左翼自由派记者，于 1930—1970 年代初期，均着重报导中国事务。他也是在 1936 年，首位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西方记者，著有《西行漫记》一书，是报导中国早期革命和领袖人物的经典之作。

雷斯顿 James B. Reston(1909—1995)

原籍苏格兰，二次大战时任美联社驻伦敦记者，曾两度获得普立兹新闻奖。曾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主任暨副总裁，也是自李普曼之后，最负盛名的政治评论家，1939—1989 年间经常于《纽约时报》撰稿。

艾萨浦 Joseph Jr. Alsop(1910—1989)

哈佛大学毕业。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保守作家及记者，于 1946—1958 年间担任《纽约前锋论坛报》的专栏作家，1958—1994 年间，为《华盛顿邮报》及《洛杉矶时报》撰写专栏。是飞虎队英雄陈纳德将军的得力助手，战时在重庆，与宋于文友善，也是罗斯福总统的远亲。

中方人士

毛泽东(1893—1976)

湖南人，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任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1949 年由他领导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6 年间一直是中共领袖。

周恩来(1898—1976)

江苏人，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于 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1976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49—1958 年间并兼任外交部长，是中国蜚声国际的外交家。

邓小平(1904—1997)

四川人，于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任 129 师政委，抗战胜利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刘伯承任司令员，合称刘邓大军，转战中原及西南；1952—1967 年间于中国共产党内担任多项高职，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与国务院副总理。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遭批斗下放，于 1973—1974 年间重回权力中心，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又于 1976 年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遭职；1977—1994 年重新上任，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

黄镇(1909—1989)

安徽人，上海艺专出身，中国外交部职业大使。于国共战争中担任解放军的政治联系工作；1950—1954 年为驻匈牙利大使；驻印尼大使(1954—1961 年)；外交部副部长(1961—1964 年)；驻法国大使(1964 年—1973 年)；1973 年—1977 年，中国驻美国华盛顿联络处主任，调回北京后，出任文化部长。

乔冠华(1912—198?)

江苏人，清华大学毕业，1931—1927 年留学日、德，获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

周恩来长期的助手，抗战期间在重庆襄助周恩来，和妻子龚澎从事国

际统战，1954—1964 年任中国外交部长助理；1964—1974 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74—1976 年任部长。1971 年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担任首次出席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龚澎后因癌症去世，乔续娶章含之为妻。

黄华(1913 年生)

湖北人，曾就学于北平燕京大学；于美国记者斯诺首次访问毛泽东期间担任翻译；1958—1960 年间曾参与中美华抄会谈；1971 年驻加拿大大使；1971—1976 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76—1982 年，担任外交部长。

章文晋(1914—1991)

浙江人，中国外交官；清华大学毕业，少时曾在德国读书。章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祖父章一山是清末翰林，其父章以吴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同学，章是周恩来的翻译，1971 年夏基辛格由巴基斯坦密赴北京时，章文晋奉周恩来之命，前往巴基斯坦迎接，是基辛格接触的中国第一位高级外交官。1971—1972 年间担任中国外交部美洲西欧司司长；1972—1973 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73—1976 年，驻加拿大大使。1981 年起任中国驻美大使。

韩叙(1924—1994)

原籍江苏，生长于北平，燕京大学肄业，本姓沈，名崇健。40 年代初期加入八路军，在聂荣臻部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外交部工作，从礼宾官员做起，1972 年中国在美设联络处，韩叙任副主任，并率先头部队在华盛顿开馆，后任美洲、大洋洲事务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1985 年继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1989 年直到逝世，任“对外友协”会长。

冀朝铸(1929 年生)

山西人，于幼年时期随父冀贡泉滞美 10 年，就读哈佛大学时朝鲜战争爆发，因此返回中国，后毕业于清华大学。于朝鲜战争停火协议期间担任中方翻译。文革期间遭下放，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时，始被召回担任翻译工作。1973 年—1975 年间，服务于中国驻美国华盛顿联络处，任参赞。1979 年初随邓小平访美，冀充当翻译，深受美国人赏识，《纽约时报》并以社论表扬他。

王海容(1928 年生)

湖南人，北京外语学院出身，中国外交部长助理，是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孙女，曾任毛泽东的翻译，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后，1974 年升为副部长，曾随中国代表团到过纽约。

唐闻生(1943 年生)

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出生，北京外语学院毕业，英文名为南施。她的父亲唐明照是纽约的《华侨日报》总编辑，而实际上则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分部的领导人。她于 50 年代初随父母返回中国，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担任周恩来的翻译，也是毛泽东接见尼克松、斯诺、基辛格等美国人士的翻译，后担任中国外交部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的副司长。1984 年复出后的头衔是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

林彪(1907—1971)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于 1959 年担任中国国防部长；1969 年被指定为毛泽东接班人。

在阴谋政变曝光后，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逃往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丧命。

叶剑英(1897—1986)

广东人，云南讲武学堂出身，青年时期曾旅居新加坡、河内，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国地位最高的元帅之一。1954年至60年代中期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71—1985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及代国防部长之职，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是逮捕“四人帮”的重大功臣。

华国锋(1920年生)

山西人，长征时即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红军时不过15岁。曾在湖南省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975—1976年间担任副总理与公安部长；于1976年擢升为总理，毛泽东过世后，华国锋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身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党中央主席。自1981年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江青(1913—1991)山东人，本名李云鹤，艺名蓝苹，电影和话剧演员，1938年嫁毛泽东为妻，1909—1976年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为“四人帮”之一，毛泽东去世后被捕审判，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张春桥(1917年生)

上海人。1969—1976年为政治局成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亦为“四人帮”之一，在1976年被逮捕。会谈提及人士

勃列日涅夫 Leonoid Ilyich Brezhnev (1906—1982)

于193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1966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1981年任总书记；1960—1964年及1977—1982年间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葛罗米柯 Andrei Gromyko(1909—1989)

1949—1957年任苏联副外交部长；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于1973年获选入苏共政治局。

马立克 Yakov Alexandrovich Malik(1906—1980)

生于乌克兰的苏联资深外交家，莫斯科外交及领事人员学院毕业。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1)，两度任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8—1952；1968—1976)，前后判若两人。马氏于二次大战时任驻日大使(1942—1945)，亦曾任驻英大使(1953—1960)。

勃朗特 Willy Brandt(1913年生)

1957—1965年任西柏林市长，1966—1969年任西德外交部长兼副总理，1969—1974年任西德总理。

施罗德 Gerhard Schroeder (1910—1989)

西德基督教民主党政治人物；1951—1966年任西德外交部长；1966—1969年任国防部长。

达拉第 Edouard Daladier(1884—1970)

1938年任法国总理，同年9月间与英国首相张伯伦举行慕尼黑会议，支持捷克将苏台德割让与德国；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达拉第加入英国对抗德国的阵营。

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

二次世界大战时“自由法国”的领导人，1958—1959年担任法国总理，1959—1969年间任法国总统。

蓬皮杜 Georges Pompidou(1911—1974)

1962—1968年任法国总理；1969—1974年，任法国总统。

齐奥塞斯库 Nicolae Ceauscescu (1918—1989)

自 1965 年起即任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直至其政权于 1989 年被推翻，本人并被处决。于 1974—1989 年间并兼任罗马尼亚总统。

福田纠夫 Takeo Fukuda(1905—1995)

日本自民党党魁；1976—1978 年任日本首相。

大平正芳 Masayoshi Ohira(1910—1980)

日本自民党政治人物。1951—1964 年间及 1972—1974 年间，任日本外务部大臣。

西哈努克亲王 Norodom Prince Sihanouk(1922 年生)

于 1942 年成为柬埔寨国王。于 1960—1970 年与 1975—1976 年为国家元首。

宾努 Penn Nouth(1906 年生，卒年不详)

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亲人；于 1948—1969 年间，多次出任总理职务。也曾担任 1970 年 5 月在北京成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联合政府的领导人。

朗诺 Lon Nol(1953—1985)

1955—1966 年任柬埔寨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1960 年任高棉王国部队总司令；1963 年、1966—1967 年、以及 1969—1973 年间任总理职务；1972—1975 年任总统及三军总司令；朗诺于 1970 年西哈努克亲王滞留于欧洲期间夺得政权。

一、历史结合了我们两人

1972 年 2 月尼克松到中国作了一星期历史性的访问，照尼克松的说法，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盱衡那时的世局，这话并不夸张，因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确实使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等局势起了重大变化，而出现了美国、苏联、中国的三角关系，也即是美国学者专家所说打“中国牌”后出现的新国际形势，当然，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也因尼克松此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最后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这些发展极具戏剧性，但并不突然，尼克松自己说，早在 1967 年他在《外交季刊》撰文时，已为日后的改变播下种子。毛泽东则在 1970 年 10 月接见美国左倾作家斯诺时，已明言欢迎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只是要等到 1972 年 2 月，方才水到渠成，诚如尼克松对毛泽东言：“历史结合了我们两人。”这个是在毛泽东随时有可能逝世的危险情况下写下的，因为在尼克松到北京前的几周，毛泽东生了场大病，因他不信邪，不肯听从医生的话治疗，不好好休息，在 2 月 21 日尼克松和毛泽东二人会谈时，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率了一个医疗小组隐身幕后待命，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的局面，而外面看到的却是一个犹如久别重逢的两个老朋友的聚会，还拿蒋介石来开玩笑。

白宫

1972 年 2 月 21 日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加会谈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周恩来、中国外交部礼

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翻译唐闻生、尼克松总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洛德(笔录员)

日期及时间：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下午2时50分至3时55分

地点：北京，毛泽东寓所

(双方见面先相互问候。毛主席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尼克松总统表示能与毛泽东会面乃莫大荣幸)

尼克松：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周总理说，你书看得比他多。

毛泽东：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你说，一定要谈谈有关哲学的问题。

尼克松：我这么说，是因曾拜读主席的诗词及演说稿，我早就知道他是专业的哲学家(中方人士笑)。

毛泽东：(看着基辛格)他是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有脑筋的博士。

毛泽东：那请他担任今天的主讲人如何？

尼克松：他的专长是哲学。

基辛格：我在哈佛教书时，都指定学生研读主席的选集。

毛泽东：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我写的东西不足为训。

(看着摄影师)他们现在要来打断我们的会面，破坏我们的秩序。

尼克松：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我没那个本事去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你这个讲法的。他骂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克松：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称蒋介石呢？周围来：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帮。我们的报纸有时骂他蒋匪，他们也回骂我们共匪，反正，我们就是骂来骂去。

毛泽东：其实，我们跟他的交谊比你们跟他的交谊历史还长。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毛泽东：我们俩不能唱独脚戏。如果不让基辛格博士讲讲话那可不成。你访问中国访出名了。

基辛格：是总统定下方向，拟好计划的。

尼克松：他会这样说，真是个聪明的幕僚。(毛泽东、周恩来笑)

毛泽东：他是在赞美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他看起来不像个情报员。但他是唯一一个不是自由之身，还能密访巴黎12次、中国1次的人，而且还没有人知道。或许，只有一两个漂亮妞儿知道吧。(周恩来笑)

基辛格：她们也不知道，我只是拿姐儿当掩护。

毛泽东：在巴黎？

尼克松：懂得拿漂亮姐儿当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官。

毛泽东：所以你的姐儿也经常派上用场啦？

尼克松：是他的，不是我的。如果我拿妞儿当掩护，那我麻烦可大了。

周恩来：(笑)尤其是在选举的当儿。(基辛格笑)基辛格博士不参选总统，因为他不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

基辛格：唐(闻生)小姐有资格当选美国总统。

尼克松：那她会第一个女总统。我们的候选人就在那儿。

毛泽东：如果你们有一位这种候选人，那可非常危险。不过，我们说真的，就民主党来说，如果他们再度执政，我们免不了要跟他们接触。

尼克松：我们了解。我们希望不至于给你出这样的难题。

毛泽东：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与(周恩来)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有个美国先生叫法兰克·寇伊，他在贵国一片大乱之时，也就是你上次竞选时，曾写了一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总统。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却反对(你)这次访问。

尼克松：主席说曾投我一票，那他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泽东：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艾德华·希斯首相也是右倾。

尼克松：戴高乐将军也是。

毛泽东：戴高乐就另当别论了。大家也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倾。我比较乐见这些右派掌权。

尼克松：我认为，该注意的是在美国，至少是目前，右派说到的右派能做到。

基辛格：总统先生，还有一点。左派的都亲苏联，不会鼓励我们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他们也拿这些理由批评你。

毛泽东：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

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

周恩来：这件事你或许清楚。

毛泽东：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坠机残骸和尸体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周恩来：在外蒙古。

尼克松：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美国左派严厉抨击我没有跟印度站在同一阵线，其实说穿了只不过是：一则，他们亲印度，二则，他们亲苏。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眼大局，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大，并吞其邻国。此举虽让我付出政治代价，我也不后悔，因为这么做是对的，而且认为历史也会证实这是对的。

毛泽东：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不可以少做点简报呢？若你把我们的谈话与哲学讨论跟别人简报，你想妥当吗？

尼克松：毛主席尽管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泽东：这就好。

尼克松：举例而言，我希望和周总理以及稍后和毛主席就台湾、越南、南北韩等问题交换意见。

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像是日本的前途、南亚的前途、印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全球以及影响世界局势的主力时，我们才能正确判断迫在眉梢的问题。

毛泽东：你讲的那些烦人的问题，我没有多大兴趣，我比较喜欢讨论你的哲学问题。

尼克松：举例来说，毛主席应该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部分国家都乐见我们今天的会面，但苏联有异议，日本则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印度也不赞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决定未来政策如何发展，才能因应全球以及眼前南北韩、越南、当然还有台湾的问题。

毛泽东：是的，我同意。

尼克松：比如说我们必须自问——这话不出这个房间——为何苏联在中国的边界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我们也必须自问，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是要让日本保持中立、完全没有武装好呢？抑或让日本与美国在某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关系好呢？我知道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以哲学观点而论，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里无所谓好的选择。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绝对不能留下真空地带，因为别人会趁虚而入填补。诚如周总理而言，美国已经伸出友谊之手，苏联也伸出手来，问题是哪一方会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美国人会入侵？抑或苏联比较可能侵略？这些问题虽棘手，但我们不能躲避。

毛泽东：就现况而言，不管是美国入侵或中国打美国都算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换句话说，侵略之类的问题可说根本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两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贵国打算撤出若干部队回国，我国也没有派兵海外，因此，贵我两国之间的情势十分古怪。这是因为过去 22 年来，我们从未透过谈判沟通彼此的想法，我们双方进行乒乓球交流至今不到 10 个月，而自你在华沙的提议算起，到现在也还不到 2 年。此外，我们这边做起事来，还是摆脱不了官僚气。例如，贵国希望双方人员能够交流互访，或是相互贸易，这些提议全被我们的人搁在一旁，他们坚持旧立场，说是在解决重大问题之前，根本没有次要问题出场的份儿。我自己也曾这么坚持过，后来我明白你是对的，于是我们就开始打乒乓球。周总理说，这也是在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才有的。

巴基斯坦前总统给我们介绍了尼克松总统，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还反对我们和贵国接触，他说应该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与尼克松总统孰优孰劣，但雅亚总统说了，这两人不能比，也比不来。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反正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约翰逊总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都不太喜欢。我们不是很喜欢杜鲁门与约翰逊。

从杜鲁门下台到约翰逊上台之间的 8 年，都由共和党总统执政，那段期间你大概也没有把事情想清楚。

周恩来：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泽东：他(周恩来)之前也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个。

尼克松：但他们(指向周恩来与基辛格)握过手。(周恩来笑笑)

毛泽东：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博士？

基辛格：毛主席，那段期间全球局势改变很大，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直到尼克松当了总统，我们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本质，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不同之处。

尼克松：毛主席，我了解有一段期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让毛主席与周总理完全无法赞同。现在我们能坐在一起畅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认清了世界新格局，也认清国家内部的政治思维模式没那么重要，主要的

是看我们对外与对彼此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老老实实的说，我们的看法不同，而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已就这些歧见交换意见。

同时，就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强权而言，我们知道中国不会威胁到美国领土。我想你了解美国根本无意染指中国，而中国也无意宰制美国，我们相信你也了解美国并无意称霸全世界。此外，或许你不相信，但我真的认为，中、美这两个大国均无意独霸全球，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议题的态度一致，所以不会威胁到彼此的领土。

因此，虽然我们理念有所不同，但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世界架构，双方均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路线上发展自己，其他国家我就不敢说了。

毛泽东：我们也不会威胁日本或南韩。

尼克松：或是任何国家，我们也不会。

毛泽东：(询问周恩来时间)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尼克松：是的，结束之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都冒了很大的风险邀请我们一访，对我们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但是读了毛主席一些谈话后，我知道他是不会放过机会，一定会掌握时机、只争朝夕。

另外，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想要对周总理说。周总理，你并不了解我。既然你不了解我，就不该信任我。以后你会知道，我从不吹牛，说些我做不到的事，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能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开诚布公。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掌握时机，只争朝夕”，我想总的来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大炮一样(周恩来噗嗤而笑)，说些“全世界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与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还有像我和匪徒(也在打倒之列)。

毛泽东：但你个人或许不会在打倒之列，据说他(基辛格)也不会被打倒，若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朋友了。

尼克松：毛主席，你的经历我们大家可是众所周知，出身赤贫，一路爬到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最高位置，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的背景就没有这么广为人知了，我同样出身穷苦人家，一路爬到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元首位置。历史结合了我们两人，虽然各自的哲学观点不同、却都是脚踏实地、起自民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突破历史，除了对中国与美国有利之外，亦能在未来几年裨益全球？而这正是我们聚在这里的目的。

毛泽东：你那本《六大危机》写得不错啊。

尼克松：你(毛泽东)书看得真多啊。

毛泽东：我书读得太少了，所以对美国所知不多。我还要请你派几个老师过来，尤其是历史与地理老师。

尼克松：好，一定找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泽东：我也跟斯诺先生这么说过，可惜，这位记者先生几天前过世了。

尼克松：真遗憾。

毛泽东：没错。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

一次失败，就会有人说，为什么我们无法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路子走错了，要是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就没话说了。

二、美国不支持任何台独运动

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美中关系正常化文件显示，1972年尼克松总统去中国做历史性的访问时，曾向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美国对台政策五原则，其中之一即是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这也是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宣布对台“三不政策”的原始根据。

1972年2月21到28日，尼克松到中国进行“改变了世界的一周”的访问后发表《上海公报》。事隔27年后，美国国家档案局终于把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的极机密纪录解密。

经由特殊管道，我们以最快速度取得了这一套当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视为独得之秘，连国务卿罗吉斯都不能窥其全貌的文件。

尼克松的对台政策五原则和不支持台独的保证，见于他和周恩来在1972年2月22日举行将近4小时的会谈纪录中。由于台湾现在仍是高度敏感的问题，经过长达25年以上，解密的文件仍有删减，即“净化的版本”(sanitized copy)以下是尼克松不支持台独的五原则全文：

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我控制我们的官僚体系，就不会再有类似“台湾地位尚未确定”的声明。

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三、在我们逐渐撤出台湾时，我们会竭尽所能地运用影响力，阻止日本进驻台湾。

四、我们会支持任何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与此有关的一点是，我们不会支持台湾政府任何想借军事手段返回中国大陆的企图。

五、我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完全正常化的障碍，但我们要在我先前所叙述的架构里寻求正常化，我们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并试着实现此一目的。

第三点所说的“逐渐撤出台湾”是指美军自台湾撤退。尼克松告诉周恩来，驻台美军的2/3军力和东南亚的情势(指越战)有关，越战结束后，就会撤离，剩下的1/3驻台美军也将在台湾的问题和平解决有进展时撤出，尼对此已做出决定。

至于美国将运用其影响力阻止日本在美军撤出台湾后乘虚而入，是因为周恩来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死灰复燃，再图染指台湾。

据周恩来透露，尼克松的对台政策五原则早在他访问中国前，就由他训令当时国家安全副顾问海格将军(里根的首任国务卿)衔命前往北京递送给周恩来的“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条，周恩来原来要求尼克松用“不允许”(not allow)的字样，但尼克松不同意，因为“不允许”超出美国的能力。后来周恩来建议用“不鼓励”(discourage)，尼克松表同意，而且“不鼓励台独的范围不仅限于台湾本岛，美国的台独活动也不在鼓励之列。”

白宫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士：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何志立、洛德；中国总理周恩来、副外长乔冠华、外交部西欧、北美暨澳大利亚事务司司长章文晋、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外交部人员赵穆华、翻译冀朝铸、唐闻生、两各记录员

时间：1972年2月22日星期二下午2点10分至6点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相互友善问候之后开始。周恩来指出美方没有一位人员抽烟，并表示毛泽东夫人将会出席当晚的芭蕾舞会，也指出要融合古典芭蕾与革命主题，是相当困难的。尼克松则指出，周恩来在年轻时曾经做过演员，而他自己则是在参与戏剧演出，担任一个没有追到女友的角色时，遇到尼克松夫人的。周恩来对此表示戏剧并没有反应真实的人生。

周恩来并证实，会谈所举行的房间，福建厅，正是他于1971年款待基辛格烤鸭午宴的房间。基辛格则回应道，他初访北京结果重了2磅，而第二次访问时则重了5磅。

尼克松：我想告诉总理，昨晚的晚宴太棒了。我们所有人和媒体人员今天早上都在谈论那场晚宴，大家都度过了愉快的夜晚。我今天早上与我的女儿通电话，她说她看到那场晚宴的电视实况转播，就在波士顿时间早上6点。她听到了总理的祝酒词，觉得印象深刻。她对于我能够使用筷子也同样印象深刻。我与各位来宾杯子碰杯子，并且全场敬酒之举，也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所有这些举动，都在早上6点到8点通过电视直接转播。

周恩来：人民注意到你的来访是件好事，这表明你没有白来。

尼克松：正如我所说，听到我们两个人个别现场演说的人，是历史上最多人数的一次。

周恩来：你们的人造卫星帮了大忙，我们希望其他的人造卫星也能尽这样的职责。

尼克松：我们也希望如此。

周恩来：那可不容易。

尼克松：总理希望今天的谈话如何进行？不管你希望如何进行，我希望如你所愿。

周恩来：我想听听总统关于这件事的意见：我们是不是该由世界主要议题展开，而后谈到台湾问题，最后谈谈关系正常化。或者我们由台湾问题开始，接着转入全球主要议题。我想听听总统的看法。

尼克松：我认为让总理比较了解我的看法的方式，是你让我先发表一项整体声明。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你都只通过我的特使基辛格博士来了解我的看法。我会简短地谈到台湾，然后对世界局势加以讨论，再转回如台湾、韩国、日本、南亚地区等具体议题，也会讨论其他与世界局势有关的话题。我想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觉得总理应该了解我如何把特定议题与世界局势连接在一起，以及我为何对某些问题已经产生结论。我希望总理明了我的想法，并清楚我为什么认为某些事很重要。稍后，我们可以谈谈具体议题。

你应该想要探查我的想法。如果你允许，我想我们就这样做。

周恩来：是的，我同意。请开始。

尼克松：我想首先对毛主席昨天在会谈开始时的谈话做个回应。他很恰当地提出了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谈话究竟会加以保密，还是会公开。我当时向他保证，也在车里和总理谈话时作出担保，这些谈话都是机密的。

让我说得更仔细，当基辛格博士在 7 月与 10 月结束访问回国时，他的会议记录总页数达 500 页。

周恩来：想读完这些记录一定很累人。

尼克松：事实上，这些记录很有趣。我想总理或许会认为这难以相信，不过除了海格将军(Ceneral Haig)与今天在座的诸君之外，当然还有基辛格博士，我是唯一一个看到完整的 500 页报告的人。我们提供了一份经过删减的备忘录给其他与我们一起到访的人，例如罗吉斯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葛林(Marshall Green)。这是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会谈的部分内容，才能工作。

这并不代表我们对罗吉斯或是葛林比较缺乏信心，只是我们的国务院就像筛网一样地容易泄密(周恩来笑)。同时，在我们的政府里，对于我在某些事物所采取的立场上，还有很大的反对意见，例如我们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问题的态度。

周恩来：(笑)你们三次会谈的记录都被公开来，只因为各式各样的人都参加了会议。

尼克松：我想告诉总理，只要是我与他(指周恩来)或是我与毛主席这次的会议，以及我与毛主席任何其他的会谈，都适用这个机密原则。唯一会拿到谈话记录的，只有这张桌子上的人与海格将军。海格将军必须拿到一份记录，因为他是基辛格博士的副手。

我们将提供一份备忘录给罗吉斯，里面只会提到一些能够被公开广泛讨论，而国务院又必须做回应的议题。不过，在这个房间里所举行的会谈的记录，除了在座各位以及海格将军之外，都不会外流到别人手中，而海格将军是一位完全可靠的人。

总理也许认为我们太过谨慎，但是如你所知，我们上一任政府有五角大楼文件(外泄事件)，而这任政府又有安德森文件(这是指揭发内幕著称的专栏作家 Jack Anderson 于 1971 年 12 月印巴战争时，连续报导白宫秘密会议的记录，暴露基辛格亲巴反印的政策立场。)。

我和基辛格博士决定这种事件绝不会发生在我们与你(指周恩来)的政府的关系上。让我这么说吧，在我们国家想要保密，比在你的国家困难。

周恩来：这我相信。

尼克松：举例来说，我不认为该把我打算致赠的礼物当成大新闻来报导。我希望我打算送的麝香牛，能够给总理带来惊喜，而我也认为送这个礼物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就在动物园管理人员听到这个主意的时候，他立刻就打电话给媒体了。他想要邀功(中方人员笑)。这看来当然只是件小事，但是我决定只要与我们两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命运相关的话题被谈及的时候，我们的会谈内容就会加以保密。

周恩来：的确要这样。自从基辛格博士首次访问北京以来，我们一直严守绝对保密的原则。不过我们了解对你们而言，想做到这样很困难。

尼克松：在我担任副总统的 8 年，就任总统的 3 年，以及在国会议员任内的 6 年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你(指周恩来)的政府更小心翼翼地保密与履行约定的政府。虽然这很困难，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互相信赖，因此我们希望会对会谈内容维持高度机密。我希望总理能够把我所说的话转达给主

席，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把话传达。因为主席必须了解这点。我不常作承诺，但是当我允诺的时候，我希望他知道我会做到。

尼克松：如果我能依照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把话题转到此刻我们暂无异议的台湾问题谈起。我想我们可以稍后再谈其他。我确定我们将讨论更多这问题的细节。

基辛格博士以前来的时候曾说明我们同意的五项原则。我完全赞成这些原则，总理可以相信我们，不管我们在其他议题有何说法。

原则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我控制我方官僚体系，就不会再有类似“台湾地位尚未确定”的声明。

第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第三，在我们逐渐撤出台湾时，我们会竭尽所能地运用影响力，阻止日本进驻台湾。

第四点是我们将支持任何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和此有关的一点是，我们不会支持台湾政府任何想借军事手段返回中国的企图。

最后，我们希望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全面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但我们要在我先前所叙述的架构里寻求正常化，我们将朝此方向努力，并设法达成。

尼克松：现在，我要补充一点，正如基辛格博士曾指出，我们目前在台湾的 2 / 3 军力是支援我们在东南亚的军队。这些军队，不论我们可能如何安排，东南亚情势一旦解决后，将会撤走，我已做了决定。在和平解决问题有所进展的同时，裁减剩余的 1 / 3 驻台美军的工作将继续下去。

问题是，总理先生，在于我们做什么，而不在于我们怎么说。如我昨天所说，一旦我做出有关我们政策方向的决定，我的记录显示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

现在谈到我们说什么的技术问题，我知道基辛格博士和总理讨论了很久，我知道基辛格博士和副外长今早也曾就此讨论，我不相信此时此地讨论措辞会有用。

我知道总理也有问题，这个议题基本上挺麻烦，同时情绪成分很高，因此必须在这问题上有进展。那是他那一边的问题，我对此有所认知，我在构想联合公报的用词时已经将之列入考虑。

容我十分坦率地向总理说明我的问题是什么，从政府观点说明。我们在此地所说的可能使得我不可能履践。我们的人民，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基于不同理由，都在注视这个议题。左派希望这次造访失败，不是因为台湾，而是因为苏联。而右派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则，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做一丝让步。然后还有一个团体，我们国内有执迷于亲印度情结的人，不喜欢美、中和解的观念。这些势力全部有其政治候选人代表，所以我们可能发现他们可能抓住我们会议结果语言上的小辫子，攻击这次造访，结果极右派、亲苏左派以及亲印左派会抗濯一气，结成联盟。

基辛格：你忘了亲日的人，就像我们的朋友赖绍和教授。

尼克松：我可以补充几句，另外有一个势力很强的团体，亲日的团体，譬如赖绍和；不是因为台湾，而是因为日本。他也是基辛格博士的学生。(周恩来笑)他们希望我们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行动失败。

总理是一位老练的美国政情观察家，你可能会把我方才所说的解释成一种对我有利的声明，只是为了保住我的政治地位而说的。我的回应是，现

在有着比我 11 月或是明年 1 月之后会不会还在位更重要的话题，那就是美中关系的开展。这才是重点。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找到符合总理要求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不能让反对我们双方展开关系的反对势力找到借口，让他们联合起来声称美国总统造访北京，出卖了台湾。

难处是，当政治竞选活动开始的时候，评论家也会开始参与讨论，他们不见得是支持台湾的，他们只是反对美中开始修好。当这些力量加总起来后，整个竞选的论调将迫使两党候选人向美国民众确保对台湾的关系。只要能够避免，我们必须让它不变成这样。

如果总理允许，我想在有机会与他讨论对世局的看法后，再回头讨论台湾问题。我了解这可能会多花些时间。由于基辛格博士与副外长(乔冠华)今天早上曾经有过有趣的对话，我希望总理明了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如此的，容我说一句，如此难缠。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基于愚昧的争辩，而是我们发现这个议题上，存在着对于整体美中修好的危机。我们的问题，就是要明智地找出能迎合你们需求的语句，但是又不至于让那些野兽被激怒得太厉害，以致于他们会在台湾问题上团结起来，对美中修好结盟一事发动攻击。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不愿意回到美国时由于这里所说的话，在记者会上或被国会领袖逼迫做出基本上强烈亲台湾的声明。因为它将使得我非常难以履践我已经决定要执行的政策。

总理同意的话，我愿把话题转到世界局势，这样我就能表达我对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的观感，抱歉我谈了这么久。

周恩来：不会。

尼克松：那是因为如果基辛格的谈话记录有 500 页那么厚，我也得发言达到同样厚度的时间。

周恩来：当然。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

尼克松：对的。我想石听总理的意见，但是我也了解总理到现在，除了透过基辛格博士之外，还没有机会听到我的谈话。但是，我当然也支持基辛格博士的论点。

总理与毛主席两位在前几年表达，关于炎对东西整体关系的态度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在 1959 年前，对我们美方面言，社会主义阵营仿佛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帝国，沙皇就在莫斯科(周恩来笑)。而在 1960 到 1968 年间，在我没有担任公职的时候，我有机会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并且就世界局势转变方面，达成我认为很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在堪萨斯商的即席演说中，已经扼要提过了。

顺便提一下，那篇演说的内容，文字不怎么样，观点胜过文采。我曾经与英国邱吉尔首相的儿子蓝道夫谈过话，他也是替邱吉尔首相写传记的人，最近他也过世了。我曾经听说邱吉尔首相在事先没有港备笔记的情况下，能做精辟的演说。我很诧异地问蓝道夫，邱吉尔怎么能不打草稿，就做出这么精彩的演说。蓝道夫答道：“副总统先生，”当时我还是副总统，“我的父亲花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光阴，来写这些即席演说的讲词。”

关于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方面，究竟是什么让美国与中国凑在一起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有歧见，虽然在我看来，长期来说我们的歧见并不大，但是在短期来说确实是很困难。我们对东南亚局势有不同看法，我

们对日本、对韩国的态度也不一样。

现在我们认为，而且大多数天真的美国媒体也相信这种说法：中美间的新关系，是由于双方人民有着基本友谊。但是，总理与我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人有私谊，长期的关系不能仅止于友谊。我记得我在念法学院一年级时，一位法学教授曾说，合约的有效性，是看双方是否有意实践它而定的。身为朋友关系，我们可以同意某些语句，但是除非我们的国家利益都能藉着遵循这些言辞而达成，否则这些辞令都不会有什么意义。

就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一事上，我与总理的分析有所差异。让我纯粹由思想意识上来说，如果我处在总理的位置，是一位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徒的话，我在他与基辛格博士的谈话中对美国的意见，将会和他的一样。而且在公开场合里，我也认为总理与毛主席会持那立场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强权，对外伸出魔掌，其实它应该从亚洲与欧洲两地退出，让民主主义的和解放的势力各自发展。

我有些顾问告诉我，如果我鼓吹这样的政策，我在下次大选中能大获全胜。因为美国人并不希望在世界上称霸，他们也希望不需要在欧洲维持兵力，也不用对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维持承诺。有些人还说为什么不把美国国防预算由 800 亿减少为 400 亿元，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些钱用在内政方面，拿到帮助穷人，重建都市这些事情上。

我一直在抗拒这种说法，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新美国孤立主义，也一直在一些关键议题的表决上(在国会)很勉强地获得多数支持。我们的立场很讽刺，因为我不是好战主义者。我不希望美国陷于征服世界各地的战事中，但是在我分析世界局势，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维持适度的国防，我们的危险会更大，在维护这些程度的国防上，我不得不强硬些。

现在让我讲到正题，我认为要维持中美双方的利益的话，就非常需要美国维持现阶段的军事部署。而美国也必须在除了一些我们稍后可以讨论的例外情形下，维持目前在欧洲、日本的军力，以及我们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我相信在这点上，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是同样大的。

让我来做一个我相信不会惹人反感的比较。宗教信仰上，我是个教友派(quaker)信徒，虽然我不是非常虔诚，我是崇尚和平的。我的本能是反对大规模建军，也反对军事行动、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总理是他的信念的当代代言人之一，因此，他也必须反对如美国这样的大国维持大量军事力量。但是，我们大家都得把国家生存放在第一位，如果美国降低了军事力量，或者由我方所说的地区撤军的话，对美国固然是相当危险，但是对于中国会更危险。

我不想追究苏联当前领袖们的动机。我必须尊重他们所说的话，但是我也必须基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而制定政策。在核武均势方面，苏联在近年来都以让人警惕的步伐发展核武：我已经决定美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否则我们在欧洲和一些定，太平洋地区与我们有条约的国家的防护盾，就没有用处了。

接着，在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情势方面，正如同我们昨天所提到的，苏联在中俄边境的武力，比他们指派在西方盟国所部署的还要多。(此处有数句未解密而从缺。)我认为如果总理能够在非军职人员之外，指派诸如军委会的副主席(指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话，对他而言会极感兴趣的，不过，如果能这样安排，会谈地点应该要高度保密。

基辛格：我们已经谈过。

尼克松：好的。

就我看中国及中国的邻国方面，这是让我比较担心的地方。我相信毛主席与总理所说的，属于中国不寻求扩张势力范围，以及即使他们支持解放运动的力量，他们也不会占领他国领土的说法。（此处有数段未解密而从缺。）当我们对印度及巴基斯坦采取强硬路线时，我们不仅仅是针对这两个国家，我们其实也是针对苏联，而我们也让他们明白了这点。

这也把我的谈话带回到我主要的前提，如果美国相对于苏联，处于比较软弱的地位，那么不论美国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对苏联都会比较没有作用。为了让美国能防止苏联在诸如南亚等地区渗透，美国必须至少与苏联维持对等的位置。

在这个政策上，我们饱受攻击，因为，再一次的，我们面对着反对我们的邪恶聪明（周恩来笑）。这些人包括支持苏联的团体，在美国拥有巨大宣传机构的支持印度的团体，还有所谓的反巴基斯坦团体，因为他们不满意目前巴基斯坦政府的形态。他们指称我们正在牺牲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国，而只是为了我们想在中国建交议题上向前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总理先生，那就是我们双方在南亚地区的政策必须相符。我所指的并不是勾结，我的意思是，在对印度及巴基斯坦问题方面。我们不会在不照会你们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这个地区的关注应该比我们大。在这方面我们即将面对一个问题，在我返国后，就会有人提出是否要恢复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样印度可以有余款向苏联购买武器，从而能够自行制造这些武器。

但是，总理和我都应该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应该选择和印度维持一些关系，以便对印度有些影响力，还是该把它让给苏联？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认为美国在亚洲保持关系，不仅对美国有利，也对中国有利的论点。我想，基于总理本身的观点，你在对日本问题的看法上，应该是主张美国应该从日本撤出部队，美日间的安保条约应当加以废除，而日本应该成为没有武力的中立国。我相信总理先生将持续如此主张。但是我也希望他了解，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尽管与他所信仰的教条相违背，却对他的国家的安全有利。

美国可以退出日本海域，但是其他国家会来从中渔利。而中美两国与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曾经有过痛苦的经验。我们希望目前的情况能让日本从过去的军国主义特性中，产生永久的变化。如果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减弱，我们将无法保证事情会这样演变。我们的结论是，如果美国对日本置之不理，两种情况之一将会发生，而这两种可能的结果都对中国不利。其一是，一旦美国的安全保证移除了，日本基于他们极高生产力的经济能力，他们巨大的天然动力，以及对输掉了战争的记忆，将会开始架构自己的国防武力。

（此处有数句未解密而从缺。）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可能选择靠近中国，但是也可能选择靠近苏联。

所以，在这点上我的结论是，我可以这么说，而我认为总理会相信我的说法，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现无企图，美国将会运用对日本与其他和我们国防合作关系，或是接受我们经济援助的国家所建立的影响力，阻止他们制定对中国不利的政策。但是如果美国势力撤出亚洲，撤出日本，那么不论我

们的抗议如何大声，套用总理所说的话，都会像是在放空炮。我们将失去在这个地区再凝聚的效果，因为 15000 英里的距离实在太远，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声音。

我也了解我现在好像把我自己描绘成了一个老牌的冷战斗士(周恩来笑)。但是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而当我们分析局势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种局势将使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不是理念方面，也不是友谊方面，尽管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而是基于我方才所提的层面上，我们双方在国家安全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我最后要提的，就是在这个分析之余，我不希望造成一个印象，认为美国不会试着去找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苏联，试着达成任何协定，来降低彼此的危险。我们的政策将对中国完全开放。自从基辛格博士访问之后，我们将与苏联的所有联系，都完全告知他的(指周恩来的)政府。如果总理同意，当我们与莫斯科方面开会时，我希望让基辛格博士前来，亲自向总理报告我们与苏联讨论了些什么，以及双方在莫斯科达成了什么协议。

举例来说，我们将会设法达成限武协定，而如果届时中东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也会在这方面试着取得进展。

但是由中国和美国的立场来说，我们都该记住的重要事实是，如果美国采取的行动是减少防御能力，由其他国家大量撤军，或是完全撤回美国本土，那么依我看来，全球只会陷入更大的危机。美国无意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已经在过去犯过这个错。我并不是指控苏联有意侵犯其他国家，但是从这些不是世界超级强国的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如果世界上有两个超强，而不是只有一个的话，这些国家会安全得多。

我已经占了总理太多的时间了，但是我希望他能在这些议题上，了解我的基本想法。

周恩来(用英文)：谢谢你。

(周恩来接着建议大家休息 10 分钟，尼克松同意，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在由 3 点 50 分到 4 点钟的休息时间里，大家谈了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包括翻译毛泽东诗集的困难度。)

周恩来：我想对于总统先生就你的观念及作法，所提供的详尽介绍，表达感谢之意。

当然，有些看法已经由基辛格博士传达过。但是，能亲耳听见总统先生讲述一遍，还是让我们更能了解你的观点。

当然，我们双方对世界的展望有所不同，这是根本上的差异，我们都不企图掩饰这个差别。但是这并不阻挡我们两国的关系迈向正常化，因为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基于一个国家的利益，我们是能够找到共同点的。

至于各国间人民希望进步，以及希望前进，不论是中国政府或是美国政府，都不能阻止。这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后世子孙。正如总统先生所说的，你希望为下一代的和平奋斗，但是你的和平主张，只能及于现在的这一代。

尼克松：但是会比梅特涅(metternich, 1773—1859, 奥地利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时期要长。

周恩来：但是我不同意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书中所提出的看法，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点了。

尼克松：那很有意思。

周恩来：时代已经不同了。

基辛格：我告诉过总理，我在不把自己与奥地利外交政策扯上关系的情况下，来讨论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够困难的了。

尼克松：聪明的说法。

周恩来：所以问题就来了，也就是说，在我们两国目前的利益方面，我们有可能找到共通基础。但是这个共通基础必须够可靠。它不能是架构在沙地上，因为这样的结构无法建立。

总统先生刚才描述了一下世界局势，而目前的世界情势，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 26、27 年来，是处于动荡不安的。这种变动目前还在增加，而未见减少。当然，如同我们所说的，在这个时期，世界性的战争并没有爆发，但是区域性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问题就像总统讲的，全球现在没有一个真空地带。现在的问题，是属于比较基本思想层面的。

举例来说，关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根据雅尔塔协定，美国是在中国有势力范围的主要国家，而苏联应该只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拥有势力范围。

(会谈由于点心送到而暂停。周恩来说王海容告诉他，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的电视画面已经处理好了。由于中国摄影人员发现器材过于沉重，以致拍摄时有些摇晃，导致画面有点模糊。此外，由于会谈是仓促安排的，他们[指摄影人员]完全没有准备，因此看来非常紧张。)

周恩来：我们能继续了吗？

所以紧接着二次大战后的情况，已经在那些协定里载明了。此外，蒋介石当时还与苏联签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要持续 20 年有效。还有，根据雅尔塔协定，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独立，现在已经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了。无论蒋介石现在如何表示他对日本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一事有多么遗憾，我倒想写封信给蒋介石，问问他当初是谁签了合约，允许外蒙独立的。

在那个时候，英国的葛莉琵夫人(lady Cripps)到了延安，也见了毛主席。毛主席问她你们这些强权为什么想要在我国划定势力范围。她说她无能为力，不过英国的力量在消退中。所以据我当时看来，整个情况当时已经底定了。

接下来，总统先生可能还记得，美国派了赫尔利大使(Ambassador Hurley)来中国，让他调停国共的问题，他倡议成立联合政府。后来，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为特使来调停。在那个时候，赫尔利大使很热心。况且，他还有胆量提议临时的联合政府，还在延安和我签订了那些条款。(周恩来笑)

在那之后，毛主席立刻派我去找蒋介石，因为我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让我继续谈判。但是蒋介石拒绝谈判。杜鲁门总统要赫尔利大使这样做的原因，是斯大林已经告诉他应该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组联合政府。对我们中国共产党而言，苏联从来没有协助过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与他们没有联络。我们甚至连雅尔塔协定都不知道。我们很晚之后才知道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事实上，我们还是从国民党方面得知内容的。由于蒋介石拒绝，所以联合政府无法成立。然后马歇尔将军来了，其后的历史就是大多在艾奇逊的《白皮书》(Acheson's White Paper)里有所记载。在那个时候，

章文晋先生是我的翻译与助理，我们和他们(指国民党)谈判了一年，也签了各种文件，但是都没有用。接踵而来，就是内战爆发，而内战至今还在持续中。美国当时站在蒋介石那边，因为你们国家与他有关系，我们理解这点。

但是结果如何呢？结果就如同总统先生在他一份竞选文宣中所说的，杜鲁门政府失去了一个有6亿人口的国家。失去中国，意味着美国其实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外交关系。

事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杜鲁门政府承认他们对中国与台湾都没有占领土的野心。但是由于他对蒋介石的怀疑，认为他可能借机卷土重来，所以他还是采取行动，而结果就是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从那时开始，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发展下来，最后杜勒斯与台湾在1954年底签订条约，而条约也从1955年初起生效。

现在，还有一个国务院经常要应付的问题(周恩来笑)，那就是由周以德(Walter Judd)所组成的自由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他也是百万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的发起人。他的中文名字是周以德，和我同姓。

历史发展显示，在中国没有真空时期。美国势力离开了中国，苏联势力同样地离开了中国，而中国人自己把这个真空时期填补起来。因此，只要我们相信人民，相信人民能解放自己，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真空时期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的解放。

总统先生，在你的竞选演说中，尽管你曾经抱怨杜鲁门政策的危险性，你还是承认了中国目前的现状，承认了中国人民的成就。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会见面。今日中国的状况，与200年前相似。我们所说的，是美国建国时的1776年。

当时英国殖民势力被逐出美国，而美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时期。这是对事情的一种看法。

既然总统先生提出了可能的危机，我想问总统一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危机，但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我们应该借着相互扩张军备力量来解决危险吗？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水涨船高”。你们已经公布了你们的军事支出。苏联虽然不公开他们的军事预算，但是毫无疑问地，他们的军事预算所占总预算的百分比，不会比你们低。否则的话，苏联人民的生活怎么会这么糟，而农业情况又这么坏。他们不能说这只是坏天气搞的鬼。(尼克松笑)尽管加拿大的天气和苏联的一样，加拿大的农产绝对不差。所以这种坏农收情况不能以坏天气来解释，而是因为苏联用了比较多的预算在军事支出方面。

至于限武会议方面，已经召开了几十次会谈，但是都没有结果。苏联在联合国所提出的建议只是想欺骗大众，所以我们的乔冠华先生指出了我们对这个提案的看法，而激怒了马立克沙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而结果这个提案遭到搁置。然而，苏联还是要求联合国大会投票，对他们提出这个议案表示谢意。

现在，如果你们两国像这样持续扩张军力，结果会如何？一定会是战争。当然，不一定是场核战争，但是很可能会由小规模的传统式战争开始，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传统战争。当然，如果你们两个强权国家能够达成限制武器协议，那就很好。我们对于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一事，毫无任何反对意见。

基辛格博士对这个事实，可以发誓作证。我们甚至建议总统先生先访问苏联，再来找我们。那就是毛主席先前要我告诉基辛格博士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觉得先访问苏联比较有利的话，你们可以如此做。当我说有利，并不代表单方面的利益，而应该是对双方有利，也对全世界有利才对。

但是，总统先生，现在你先到了中国，而莫斯科把这件事小题大做。不过，让他们去吧！我们不在乎、他们鼓动了许多他们的人民和支持者来诅咒我们。我们所关切的、是你们两个超级强国花费了这么多钱在武器扩张上面。这对世界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对长远的结果有何影响？

最坏的可能，就是我在我们的会谈记录中，曾经告诉基辛格博士的，也就是说，你们两国最终都会攻击中国。苏联从北边来，日本和美国从东边来，而印度攻进中国的西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当然要做出可怕的牺牲，但是也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也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当然只是在谈最坏的可能。正如基辛格博士与总统先生所说过的，我们两国间没有矛盾，而我们双方的利益也不必起冲突，美国也不需要占领中国的领土，尽管我们双方在思想上是有差别的，而我们也有句口号：“打倒美国帝国主义。”毛主席昨天曾经提到过这点，也说明这只是“空炮”。基辛格博士知道这个名词的。

基辛格：副部长(指乔冠华)现在也知道了。

周恩来：布什先生也知道。但是，马立克和苏联都在诅咒我们，他们说美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正在展开一场调门一致的二重唱。

尼克松：容我打断一下你的话，对副部长表达赞扬之意。他所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在马立克发言的时候，他只是面带微笑看着马立克。这让他气得快要发疯了。(周恩来笑)

周恩来：你从电视上看到的？在这点上你比我们占便宜，我们这里看不到。在这些事情方面，我们还很落后，每个人或是国家也一定有长处。基辛格博士曾经说，尽管越南是一个小国家，却有伟大的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事实。

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如果一个国家只试着在扩张武力单方面来超越另一个国家，那会没完没了。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你说你们无意统治世界，也没有扩张领土的企图。你希望看见世界和平，而更希望先见到紧张关系的缓和。我们相信这的确反应了你们人民真正的希望。

至于美国会不会完全回复孤立主义，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是二十世纪初期了。坦白说，今日所谓的孤立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而只是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涉美国的事务而已。总统先生，你说得很对，中国人民无法了解门罗主义或门户开放政策。

这个问题不只对中美关系很重要，也影响着世界的未来。既然中国或是美国都没有向对方扩张领土的野心，而且双方都不想统治世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希望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有所贡献。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设法在远东地区寻求紧张关系的缓和。

因为我们没办法寻求世界其他地区的缓和关系，那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如果我们那样做，只会造成新的问题。我们对非洲人民的协助，只是我们努力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我们只会谈谈我们局遭的状况，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南半岛。

在这个问题方面，只有中南半岛的人民有权发言，并与你们谈判。但是由于中南半岛这个区域与我们也有关，我们应该有权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义务对中南半岛的人民提供协助与支持。我在很多场合里，都对基辛格博士表达过这个看法。

既然美国已经决定要从越南和整个中南半岛撤出所有部队，而且美国也希望这个区域保持中立，也就是不结盟，也没有特定武力占据这个地区，如果这是总统先生与你的政府的政策，我想你们该采取比较大胆的行动。否则的话，你们只会协助苏联增加他们在那里的影响力。至于我们，我们不怕事情最后变成怎样，因为不论我们如何帮助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特权，也从来没有干涉过他们的内政。

我们甚至没有干涉过他们与我们不同的思想体系。举例说，西哈努克亲王的思想是佛教，我们尊重他的宗教，越南的思想体系，同样地，可能与我们的不全然相同，但是我们没有干涉过他们的思想体系。

由这个角度看来，你们越晚从中南半岛撤军，你们的处境会越来越被动。而尽管你们的用意是要让战争光荣地结束，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你们承认戴高乐将军从阿尔及利亚撤军的行动非常的明智。事实上，戴高乐将军还从阿尔及利亚撤出了多达百万名欧洲人，这项行动我们想都不敢想，而他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而戴高乐将军在自己国家中，遭遇了很强的反对声浪。不过，由于他是一名军人，他的观念和所受到的遭遇，可能和总统先生的不一样。我了解总统先生很欣赏巴顿将军。你可能不欣赏他想攻打苏俄的念头，但是却欣赏他的胆识和他“为所当为”的观念。

总统先生，也许在试着就此事说服你方面，我的这些话都是多余的。但是我希望能够明白表达我的看法，这样对我们讨论其他议题会比较容易。我明白我们在这件事情方面意见不一致。基辛格博士已经告诉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态度比越南的态度强硬。

基辛格：比苏联还强硬。

周恩来：明显地，他们所说的不是能算数。我相信你们可以采取比较大胆的行动，而且更能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如果当地的和平能够早日来到，你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将能够维持。法国人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东西。法国人想要借着为缓解紧张情势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将美国与苏联拉拢在一起。但是那不成的，你们也不赞成，是吗？

尼克松：我想那是不很确定的问题。

周恩来：当我想到日内瓦协定的时候，我的结论是这是个错误。

尼克松：你指的是 1954 年的会议？

周恩来：是的。当时，我们同意加入签字。而这个和约对你们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被拉入泥淖。在那个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终止了韩战，那对他而言是很勇敢的举动。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料到，杜勒斯会把他拉入泥沼，还让美国深陷其中。

大家怎么想得到一个国家会谈妥和约，面不签字呢？你曾说你会履行协定内容，但是实际上却破坏了这些和约。结果就是应该在两年后举行的选举，却没有发生。如果这项选举有举行的话，就算没有国际势力在旁监督，毫无疑问地，胡志明会在越南全国各地大获全胜。他是我的老友，我们在 1922 年于法国认识。如果越南是由胡志明来领导，那么整个越南与美国的关系就

不会恶化，甚至还可能更好。

但是历史就是充满了种种转折，就像我们两国间的历史一样，在理年后，我们再度会面了。那就是历史，而且在历史上有很多例证。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在中南半岛采取大胆的行动的话，你们有可能获得中南半岛人民的好感。至于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不能讲，因为我们不参与谈判，也不想参加。我们的立场是，只要你们继续目前对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的政策，而让他们持续作战，我们除了继续支持他们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我希望总统先生能够注意一事实，那就是我们协助中南半岛国家，包括越南及其他中南半岛人民的这个政策，和我们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政策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会在朝鲜战争时，派遣中国志愿军到朝鲜呢？那是杜鲁门逼我们这样做的。他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让我们无法收复台湾。更过分的，是他的军队长驱直入，逼到鸭绿江口。

我们当时已经说过，如果美国军力直逼鸭绿江的话，尽管中国才刚刚解放，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当杜鲁门的军力抵达鸭绿江边，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说到做到的。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确定能够胜利，因为苏联并不愿意派遣军队。你们对这件事是很清楚的。

最后的结果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后，他明白战争必须结束。但是你们在朝鲜战争中所损失的生命与资源，比越南要少得多。没有人预料到这种情况。与其浪费这么多力气在这种地区性的意念性战争中，你们应该采取更勇敢的态度，在该撤退的时候赶快撤退。

台湾问题很容易讨论。例如说，你先前提的 5 点计划，已经在总统的指示下，由海格将军通知我们了。而总统方才也再次重申过。坦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等了 20 年，我们还能再等上几年。我们还能再让一步，就算台湾回归祖国之后，我们不会在那里建立核武基地。我们在那里设立核武基地有什么用？只有苏联还占着日本北方的四个岛，他们可能继续占领下去，或是把它们卖给日本。更过分的，他们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是日本不能在北海道设防。我们可以预先告诉总统先生和日本，在台湾回归祖国之后，我们不会在那里建立基地的。这些基地有什么用？我们无意派遣任何军队到国外去，我们对其他国家的领土也没有野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设置基地？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自卫而已。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中南半岛，而全世界也都在注意着。所以，在你前来访问的时候，美国的民主党试着对你施压，指称你这次前来中国，是要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没有办法经由会谈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此事交换意见，由远东地区紧张情势获得和缓谈起，研究世界紧张局势和缓的好处。总统在这方面并没有说太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总统可能对这些议题有不同的意见。至于其他问题，我们可以明天再讨论。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尼克松：关于越南吗？

周恩来：关于整个中南半岛。

尼克松：总理先生，我们在越南问题上，不应该再有分歧的意见。总理刚才建议，如果我们更快点行动，那将是明智又勇敢的事情。这个可能性我们考虑过，但是在整体考虑下，我们还是拒绝如此做。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行动有多么快速。目前我们在越南的部队已经不到 10 万人，而且我将在 4 月中旬，再一次宣布减少兵力。所以，我们现在所谈的，

是在未来 2—3 个月之间，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将会结束，除非我们的战俘问题仍然不能解决。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是经由撤兵来结束美国的介入，因为这已经是既定的事情，而且只要再几个月就会实现。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将和平带到整个中南半岛，包括老挝与柬埔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越南应该仔细考虑我在 10 月份所提出，而在 1 月又提起的建议。

让我撇开 8 点、5 点、和 13 点等等诸多条件，直接告诉你我们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如果我现在就和越南的领导人面对面坐在谈判桌上，而能够商量出一个结论以停火和释回我们的战俘的话，6 个月内，所有美国军力都会由越南境内撤出。让我同时指出，我们在去年年中，就已经向越南提出了这些建议，也表示了我们愿意基于这个基础来谈和。但是他们拒绝了 this 提议，并且坚持我们的和谈条件，必须在解决军事方面问题外，还要达成政治上的协议。

对于总理所说的，让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做出自治决定，不要外来干预的论点，我完全同意，我们已经这样建议了。我们提议撤出所有美军，套用总理的话，不留下任何“尾巴”在后头，而且只要我们的战俘获得释放，我们同意让中南半岛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让那里的人民作决定。但是越南坚称我们不能只达成军事协定，他们要我们设定一个未来的政治局面，还要我们推翻现在的政府，支持基本上是他们所选择的政府。

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非常尊重总理对这个主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议题上，唯一会因为战事持续而获利的一方是苏联。他们希望美国在这里被困死，结果当然是他们在越南得到更多的影响力。由我们的情报显示，他们可能甚至煽动越南撑下去而不要和谈。

我也该指出，我了解我们可能对这件事情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谁知道谁是对的？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理晓得的，我对戴高乐将军在极端困难又激烈的阿尔及利亚地区所作的决定，非常敬佩。但是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只会影响他们两个国家，法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但现在已不再是世界强权了。

如果美国不只是撤出越南——根据我们的“越战越南化”政策，这件事在几个月后一定会发生——而是在撤出后又加入了那些一直是我们敌人的阵营，去推翻那些一直是我们盟友的人的话，那么依我看来，美国可能会永远受创，以至于没有任何国家能依靠美国。

我明白有些人的看法与我相左，但是当美国处于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全球许多国家，例如许多欧洲国家，都依赖美国提供国防协助。如果美国不能遵守约定——我甚至认为为了遵守承诺而死犹有不足——那么美国就不再是个能被视为朋友的国家，而世人也不会再把我们当成盟国看待了。

总理所提出的论点，是我们不能说服对方的一个问题，而我尊重他的观点。我希望他能了解，我们的政策，是真正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制定的，这不仅是为了越南的人民，而是为了所有东南亚的国家。我认为让总理了解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不希望留下任何错误的印象；沟通管道仍然敞开，而如我所说，我们愿意就达成军事和解展开谈判。

阮文绍会退位，而中立组织将会举办大选。如果越南的回应是要升高作战层次，那么我将别无选择，而我所采取的行动将会非常强硬。这是我的

作法，而这也将是我们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一来，世上其他国家才会知道，如果他们想考验美国，我们的反应将会很强烈。

越南还应该考虑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讨论越战越南化时，我们所指的是长远方案。这个方案假定美国撤军，将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所讨论的是全面撤军，完全不留下剩余部队的话，他们就要和我们讨论这件事，我们不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就这样走开。

我也该指出，美军目前没有在老挝或是柬埔寨部署军力。从我们的策略来看，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使用美国空军的力量，攻击在这两个国家里的越南武力。如果越南同意从这两个国家撤兵的话，那么至少这两个国家里的战争能够结束，而后让人民决定他们的未来。

结论就是，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柬埔寨、老挝、与越南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协助他们战后重建，也准备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援助越南。我们不希望留个尾巴在后头，我们也不希望成立基地。我们愿接受总理所提出的中立区的主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想达成协议，必须要双方都同意才行。

我们真的觉得，如果仔细研究我们的提议的话，就不难发现，我们为了解决军事问题，已经让步很多了。我们认为，应该让历史演进来决定或是解决越南军事与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选举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的局势与 1954 年时大不相同，因为我们会保证举行选举，而这些选举会由外界力量所组成的公正团体来加以监督。总理很敏锐的指出，我的一些政治对手已经制造了一个印象，就是我来会晤总理的目的，是要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周恩来笑)。这样说吧，我很坦率地希望他了解，我们当然很欢迎任何协助，来帮助我们展开谈判。不过，我们无所期待，而且如果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帮助，我们会谅解的。我们将继续以我所提的方式，与越南周旋下去。这条路漫长又艰苦，但是对越南而言更是如此。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和谈是有捷径的。

周恩来：也许我们不大容易快速地把这些事情弄清。我在许多场合中，已经与基辛格博士谈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能继续支持他们，但是不代表他们发言。《联合公报》的内容已经讨论过了？

尼克松：是的，我相信公报草稿已经拟好。

这(指越南问题)真是一个讽刺性的情况，美国将会同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责备(周恩来笑)。

基辛格：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战争结束，而苏联希望战争继续下去。

尼克松：是的。

周恩来：是的。

尼克松：我们在这次会谈中可以非常的坦诚以对。我明白总理的立场，在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总理的意见，并且知道这事对我们双方的关系相当不利。我希望向总理保证，我正在尽力除去这个不利因素。我的前任几位总统派遣了 50 万军队进入越南，而我则撤出了 50 万人。我将结束美国在这件事上的介入，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在这一点上，我可以非常确定。我们现在所谈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借由协议的加速达成，而非我们的突然撤退来加快这个撤退的过程。

容我很直接地说，我们将会撤军，事实上，我们正在撤出军队，但是

我们不能够——这点我们非常强烈地认为如此——我们不能够推翻越南政府，然后把政权交给越南。

这是我们不能作的。我们相信如果透过我们认为公平的选举，越南很有可能能够达成这个目的。但是我们不会就此撤军。然后更进一步地推翻越南政府，把政权交给越南。我们不能这样做。在我的想法中，如果我们这样做，美国就会遭世人和各国鄙视，不论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什么。

周恩来：那还是你的老调，你不想离弃老朋友。但是你已经离弃过许多老朋友了。

在这些被你们抛弃的朋友里，有些是好朋友，有些则是坏朋友，你们该慎重择友才是(周恩来笑)。这还是思想上的问题。举例说吧，总统先生，你昨天问我蒋介石是不是老朋友，而我说他和我的交情比和你们的还要深。我曾经和蒋介石合作过，我也曾经和他争执而且对抗过。蒋介石到现在还相信一个中国，这是很好的，而我们也可以好好加以利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在越南方面，你们的介入纯属意外，为什么还不放弃呢？越南和韩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因为韩国确实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而被分成南韩和朝鲜。我不太记得这是不是波茨坦协定(Potsdam Agreement)造成的结果。如果能让东南亚成为不结盟地区，对解除远东地区的紧张情势会很有利。

尼克松：我相信这终究会发生，这只是个……

周恩来：你有这个信心吗？但是如果苏联也介入，而你们两个大国在那里竞争，那么那里就不会有缓和情势的谈判了。当你们增加军事支出时，美国政府等于公开做了个声明。而现在你们已经了解我们对你们不构成威胁，而对对我们来说，你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对东南亚有领土侵占的念头。

尼克松：我们也无意染指东南亚。

周恩来：但是你们被越南政权套牢了。事实上，那个政权与你们先前所签订的条约，完全没有关系。你们是和保大签的约，但是根据杜勒斯的手法，你们让吴廷琰来代表保大。

尼克松：保大现在出去猎狮子去了。

周恩来：而后你们与吴廷琰和他的兄弟合作，他和他的兄弟已经去见上帝了。这些家伙不可靠。如果美国真的想让世界各国留下个好印象，你们不需要这些所谓的朋友。

你们也许会说，如果你们由这个地区撤退，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而苏联就会填补这个真空地带。事实是，你们越晚撤出，那里的情势就越紧张，而另外一个和中东问题类似的局面就会形成。然后那就会又变成一个紧张局势的延伸，由地中海到中东到印度洋到中南半岛到东南亚到南中国海。

如果那里的战事持续，那么我们当然将继续援助他们，因为我们说到做到，但是除非你们攻打我们，否则我们不会介入。如此一来，那里的紧张情势将会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讨论缓和紧张关系？我第一次与基辛格博士见面时，他说你想要缓和紧张情势，你必须找一个地方下手。

日本的情形与东南亚不同，那是另外一件事。

尼克松：容我打断你的话。在总理开始谈那个话题前，我只想补充，我们现在已经在巴黎提出我们的建议了，也会持续鼓吹这个建议。我们认为这是个公平的提议，对缓和紧张情势也有利，而如果越南有意在最后展开谈

判的话，也会很有帮助。我不要求总理对这个提议采取任何行动，当然更不要求你为它公开做任何事。我只简单地说，我们希望紧张关系能够舒缓，我们不想要建立基地。

我相信总理将要开始谈到日本，而这与日本的情形委不相同。

周恩来：让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吧，我们在观赏今晚的表演之前，还要共进晚餐。

尼克松：我想向总理表示，我很感谢他对这些议题的直率态度。当然，我本身也试着让他明白我对这些话题的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几天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在重大议题方面，我们的利益会把我们越拉越近。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能够相互谅解，丽这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

周恩来：至少在对远东重要的问题上是如此。

尼克松：是的。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谁能做先知呢？我认为在未来 25 年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否，恢关全球的和平，因为欧洲地区的势力相对地很均衡。中东当然也是个候选者(周恩来莫)。但是，我相信太平洋地区仍然握有枢纽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会谈对全世界这么重要。

周恩来：当你说一代的时候，你是不是指 25 年？

尼克松：我是说我们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而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已经打了两次仗，分别在韩国和越南。我不想放肆地说我能预见 25 年之后的事物，如果我能够往后预见未来 25 年的发展，那将是我的极限。同时，总理先生，我经常提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纪里，每一代的美国人都经历过战争。第一代的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0 年代有朝鲜战争，而 60 年代有越战。我想一个世纪中有 4 次战争已经足够了(周恩来笑)。

周恩来：的确如此。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也认为应该要找个方法，解决武力扩张的问题。

尼克松：我想在稍后的会谈中，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试图与苏联讨论限武谈判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认为如果要避免军备竞赛，就必须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周恩来：在这方面已经花了太多经费了。我们的后代子孙会因为这么巨大的浪费，而谴责我们。

尼克松：是的。

周恩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还只在初步阶段。我们不希望花费太多金钱。你们大概也注意到这件事了。

尼克松：是的。

周恩来：我们是很诚恳的，我们不希望扩张。

尼克松：我明白，在世界和平议题上，我认为在此刻，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世界和平比较有利。我并不是建议中国应该改变政策，变成一个超级强国。但是强大的中国有助于这个世界枢纽地带促成势力均衡，这是非常迫切需要的。当然，我也有个自私的理由，如果中国能够成为第二个超级强国，美国就能够降低我们自己的武力了。(周恩来笑)

周恩来：你对我们太有信心了。我们不想这样。我们明天下午 2 点钟可以再见面。

三、中美双方都不应争霸

白宫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士：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何志立、洛德；中国总理周恩来、副外长乔冠华、西欧、北美暨澳大利亚司司长章文晋、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外交部人员赵稷华、翻译冀朝铸、唐闻和、记录两人

时间：1972年2月24日下午5点15分至8点5分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你们今天早上的长城之旅一定相当累人吧？

尼克松：有趣的事永远不会让人感到疲倦。

周恩来：尼克松夫人感觉如何？

尼克松：她喜欢长城。

周恩来：天气冷吗？

尼克松：不会，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连厚大衣都没有用到。

周恩来：基辛格博士今天没有去长城，洛德先生也没有。

基辛格：乔副部长很难沟通。（周恩来笑）

尼克松：我相信基辛格博士也是一样。

周恩来：那倒是。

乔冠华：这样说比较公平。

尼克松：在讨论重要事项的时候，我们必须很坦率。我们的态度必须幽默但是直接。

和赫鲁晓夫谈话相当不同，他会把鞋脱了，然后用鞋来敲桌子，那是在乔副部长到联合国之前。

周恩来：正如我昨天向总统说的，今天我想谈谈我们一般的立场与观点。因为我们打算在联合公报里讨论和平共存的五项原则，而双方都已经准备好，要努力在双方关系方面实现这五项原则。总统已经表示过，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没有侵略领土的企图，也不打算控制另一方或是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愿。不过，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有个进程。对我们来说，这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在你这方面，总统先生，这不仅是你个人在政治方面的一步，还有你前任政府所留下来的残局。这些都是你得弄清的问题。

所以，精确地说，我们希望你能继续在位。如我昨天所说，我们也希望基辛格博士也能继续辅佐你，总统先生。否则，我们可能今天才讨论过一些事，而明天别人又接掌了大权、到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以前讨论过的内容究竟还有没有效。

尼克松：那是真的。

周恩来：基于这一点，在联合公报发布后，我们认为应当安排两党领袖来访问中国，并就此事进一步讨论，也就公报内容做更直接与公开的探讨。我们希望贵国的两党都能支持这个步骤与态度，因为这不是为了总统的竞

选，而是为了两国人民长期利益着想。

所以，在四项原则方面，我们将宣布我们已经取得共识，而在公报的最后一点方面，这就是我们该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不仅对我们两国的人民有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们并不害怕大国，这由我们对于美苏两国谈判的态度，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宣称我们双方正在讨论如何反抗苏联，以达成反苏联盟。

他们在莫斯科提出这种论调，而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明显。

在第二个原则方面，我们双方的意见很一致，那就是要降低国际间军事冲突的危险。

我已经表达过我们的立场，希望美国与苏联间就限制核武一事达成协议，那不是很好吗？如果这种协议无法达成，那是他们的错误。

尼克松：苏联吗？

周恩来：是的。

尼克松：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周恩来：是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双方都不该企图在亚太地区取得霸权地位。而隐含的意义是我们两国不在此地争霸，日本也不该如此。

尼克松：还有苏联。

周恩来：对的，苏联也不可能。

尼克松：印度也不可能。

周恩来：没错。公报的用意是双方应该试着做些有益的事，而不是坏事。

尼克松：让我澄清一下。它的含意是我们双方都不该争霸，同时也表达了，我们都会抗拒其他国家争取霸权地位的企图。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是的，也就是我们抗拒任何其他国家的企图。（基辛格博士宣读联合公报中关于霸权的句子。）

周恩来：我们双方同意的第四项原则，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得代表第三国进行谈判，或是签订针对其他国家而制定的协议或是协定。因此，很清楚地，我们所进行的是一个双边磋商，而我们并不代表任何第三国家来进行讨论。第三国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之间的这四项原则都很清楚，不会有误解发生。

尼克松：他要向新闻界解释，因为大多数的新闻人士都不知道“霸权”是什么。（周恩来笑）

基辛格：正如我告诉副部长的，总统已经指示我与副部长或你就这个问题找出个说法来（指霸权）。

尼克松：你想说什么？

基辛格：我们会事先决定我们要说些什么，然后就不会逾越这个范围。我会预先告诉你我究竟如何解释联合公报的议题。

周恩来：既然我们准备达成协议，我们就该确定双方的解释是一样的，或至少是大致相同的。我们不该就公报内容方面引发误解。你们面对的麻烦比我们多。你们要向国务卿回报，而我们的副部长，当然也要向部长报告。但是他向部长报告，比你们向国务卿报告来得容易。因为总统也了解，我们不会泄漏任何讨论的内容。

周恩来：现在我要继续谈一些具体问题。首先是台湾问题。（此处有一大段内容未解密而从缺）

周恩来：我告诉总统说，昨天国务卿告诉我的助手姬鹏飞(中国外长)，他想要参加台湾问题的讨论，这么看来，台湾问题不管对你们或我们来说，都是关键问题。因为，假如在公报中，美国不能表明未来解决问题的所有方向，如果不能表明这个的话，那么就很难向我们的人民，或者邻近国家以及其他关心我们的国家说清楚。

基辛格博士今天下午拿来的初稿中，最后部分谈到了关于撤军、最后撤走全部军队的问题，但是里面没有提到撤军的日期。而且，你们还在这点上附加了一些条件。

当然，这是基辛格博士和我们副外长的事，他们需要绞尽脑汁提出构想模式。也就是说，需要让双方都了解各有某些义务，但也不需让人民了解得太详细。内容不要订得太死。

尼克松：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这种方案。

周恩来：基辛格博士日前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你们要求和平解放(指台湾问题)。

我们对博士的回答是说，我们会争取和平解放。这是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这样，但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当你们的军队驻在那儿的时候，我们不会和你们的军队发生冲突。我在宴会上祝酒时曾这么说过，15年前我也是这么说过。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总统(指尼克松)初上任时，你们政府的第一个善意讯号就是第七舰队不再在台湾海峡巡弋，只是偶尔经过。所以，我们双方已隐约地看到台湾问题应如何解决。

我昨天告诉总统先生，即使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台湾建立核基地。这就是说，我们不会使用台湾来对付日中。对这点，日本可以放心。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不能冀望(指干涉中国内政)你们不该干涉此一内政问题。你们不应强我们所难，我们也不会强加任何事在蒋介石身上。还有，总统先生，你应该注意，蒋介石的来日不多了。

尼克松：年龄吗？

周恩来：是的。

周恩来：当然，他的观念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肯定他这种看法。在1958年，那时杜勒斯国务卿希望蒋介石放弃金门与马祖，好让台湾与祖国完全断绝关系，在那儿划一条线，蒋介石不愿这么做。我们也建议他不要从金门和马祖撤军。我们采取向金马发动炮战的方式，建议他不要自金马撤军。这就是单打双不打，假日也不打。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意图，就没有撤军。不需要其他的手段或讯息，只要用打炮弹的方式他们就知道了。

前几天毛主席曾告诉你，他从1924年就认识蒋介石了，他们相识已将近50年。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和他合作或和他打仗。所以我们双方都非常了解对方。总统先生，你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同意只有一个中国，既然这是你的原则，那么只要在你在职期间，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尝试去遵守这些原则。这是有益于我们两个国家的，同时不对对方构成威胁。我要很坦率地说，当基辛格博士说这可能要花10年的时间时，我认为这太长了。

在一次简报上，你也说这可能要花10年的时间，这实在太长了。最好不要讨论时间。我等不了10年。你会有10年，你能够等10年。总统先生可能会连任到第三个任期。

基辛格：这是违反宪法的。

周恩来：4年后你可以再出来参选，你的年龄允许你这么做。但以中国现在领导人的年龄来看，这就不可能了。他们都太老了。

尼克松：总理先生，美国前总统像英国的国王一样，要负大责却无实权，我是指下野的总统。

周恩来：但你的生涯是历史上少有的，你当过两任副总统，然后落选(指败于肯尼迪之手)，后来终于当选，这是历史上少见的。

尼克松：即使是在野，还是可以有影响力的。

周恩来：就如同毛主席前几天所说的，他会投你一票。

尼克松：那会是很大的一票。

周恩来：我们希望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因为20多年已经过去了。根据杜勒斯在华沙会谈时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这个时间表已经超过了。杜勒斯透过美国大使提出的建议说，只要中国在10年、15年、25年期间不使用武力，他就很高兴了。如果我们达成这项协议，到现在为止，15年早就过去了。这你可以看你们国务院的档案。

基辛格：任何事实部分，你从未出错过。

周恩来：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但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就等同于接受你们干涉我们的内政。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个。

我们现在努力做的方案中，看得出来我们双方的观点正在接近中，只要不涉及干涉内政的问题，就不错了。我们不要你们除去蒋介石。我们自己来处理。

尼克松：和平地。

周恩来：当然，我们有自信。如果我们没有自信，我们怎能做得到？我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时，当然你们的部队可以离开，这是十分自然的。

所以说，台湾问题是我们两方之间的关键问题，而且在这儿我不得不多说一句，这是前总统杜鲁门造成的一个错误结果。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放在公报中，但我要在这里说一下。

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两个过去已敌对这么久的国家来说，要采取某些方式解决过去的问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是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伟大精神，才使这件事成为可能。他有勇气把这些事承担下来，并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在我们正在拟定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中，每一方陈述自己的立场，但是如果任何人能够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话，他应该知道，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对这个问题有共同的立场。如果一个人用一般的和表面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他可能就看不到那个共同的立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在毛主席的伟大精神引导下，我们才敢这么做。也只有在7亿中国人民全心依赖毛主席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提出这样一个文件。

所以，总统先生应该了解我们有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勇气面对这些困难，再去克服它。

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达成一个协议。一旦协议达成，其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也就是说，台湾问题是关键问题。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找出某些至少能接近我们观点的方案。

尼克松：总理要我现在就表示意见，还是等我们讨论其他的问题过后再说？

周恩来：请说。

尼克松：就如同我开头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要怎么做。就像我先前所说，我的目标——先前总理也直接指出来了——我的目标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我了解，要实现这个目标，解决台湾问题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在我个人与总理之间，在我与毛主席之间，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向，已决定了。这个方向就是两国关系正常化。1951年我在《外交季刊》中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这种看法，并有一些说法了。如今，我试着以行动来推动它。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是我个人一开始就主导发动要做的，而且实现这个目标也是我的意向。

现在我们如何来说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我是否能实现它。如果我们的两位专家拟定出来的公报，让我的反对者逮到机会大作文章，说是美国总统跑了16000哩只为了背弃我们对台湾政府的承诺，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中严重损害我们的关系。

举个例说，当我下令有关第七舰队的行动时（指不巡戈台湾海峡），我的政府内就出现反对的声音，但我还是做了。因此，在越战不管用什么方法结束后，我们将会撤出我们驻在台湾2/3的部队。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但还是要做的。

我也会设法减少其他的部队，就是剩下1/3的部队，当我们的关系开展时我就能这么做。

还有一件事是极其重要的，我必须能够在回华盛顿时说，我和总理不曾台湾问题上有秘密交易。我知道总理对于美国的媒体与国会有所了解，因此能了解我这么做的道理。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公报用语中，必需提供“活动的空间”，这样就不会让台湾问题在未来两、三个月或未来两年、三年或四年中，成为大问题。如此，我方能够做一些事，好让我们能向实现我们的目标方向迈进。

周恩来：关于这点，我们的外交部长与国务卿一样，也有他的局限性。我们几分钟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过去也说过，我们应该保留一些活动空间以及不要有时间表。

也就是，你们有你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外交部长代表的是人民的情感。好在因为毛主席的领袖威望，去说服我们的人民是有可能的。

尼克松：毛主席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我也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1000年，我也不是说10年。但我认为总理应该记住，毛主席也该记住，我说过我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

如果我可以赢得大选，我就有5年的时间去完成。就如我前面所说的原因，我不能够现在搞一个秘密交易，然后握手，说我在第二个任期就可完成。如果我这么做，当媒体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就会被他们摆布了。所以，我不想这么讲（即承诺在第二任内完成正常化之意）。

让我把这件事与日本的事作个比较。例如，我知道总理的立场是认为我们应该从日本撤出所有军队，我不同意这个立场，公报中也是这样显示的，那么我就不会自日本撤出我们的军队。（此外有一句未解密）我们谈过的任何事情，都是说需要我们的部队留下来。

关于台湾，我不相信美国（军队）永远驻在那儿，对美国的安全是必要的，正因为如此，“我的目标”，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会议中用这个词，“我

的目标”是撤出我们剩余的部队，不只是 2/3，而是所有的部队，包括剩下的 1/3。那是我可以完成的一个目标。

现在，如果总理能够了解为何我必须这么说，这是为了能向国会促销。也就是，这必需符合一个所谓的“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我知道总理不同意这个主义。

在这个主义下，我们削减在韩国的军队。当然，韩国与台湾的情况不同，韩国的问题主要是与日本相关联。总理先生，我在想我要怎么做，也就是我必须处理民意。但愿我能尽快处理完越南问题，然后 2/3 驻台部队就会撤走。我的计划是，在我还有权力去做的期间，减少剩下的 1/3 部队，然后就完成撤离。不过在明年一月以前我做不到。需要有 4 年的时间。

我回国时，若有人问我：你和总理是否已有交易要将美军从台湾完全撤离时，我会说“没有”。但我告诉总理，这是我的计划、然后，随着一步一步的撤军，我可以逐步地获得国会的支持同意我的行动。

同时，我也会把美军不须再驻扎台湾一事以诉诸民意为基础的方式进行，我相信这也不至于伤害到你们的民意才对。

我还告诉毛主席，他不认识我，所以也不该信任我。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建立完全坦诚的关系，以及承认除非是出于我们的利益，否则什么都不该做，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要告诉总理的是：我并未要求他信任我。考虑美国的自身利益，以及期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我已决定一项政策——但并未要求明文化——，我决心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时间表来推动撤军的事宜。

我的结语是：我将毫不迟疑地这么做，因为我很了解政治的形势，只是我能逐步且不回避地推动即可。但如果我现在就宣布，事情就很难做了，因为时机不对。

我说完了。

周恩来：我们并不是要求有个时间限制。我们也没提过这个问题。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这在 5 项原则(指尼克松的对台五原则)里就已提到。总统先生提过的这几点我认为很重要。

首先，你们希望，而且也不会阻碍台湾的和平解放。其次，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时，你们会阻挠和不准日军到台湾。

(此处有些对话仍未解密)

周恩来：是的。当美军还驻扎在台湾时，你们会阻止日本人过来吧？

尼克松：我会更进一步。在我们军队撤出后，我们仍会努力阻止日军进行驻台湾。

(此处有些对话仍未解密)

周恩来：你说到的第三点是，你将不会支持或允许台独运动，也不会鼓励它，不管是在美国或台湾。

基辛格：应该用“鼓励”二字。“允许”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周恩来：不鼓励怎么样？

尼克松：就用不鼓励吧。

基辛格：但是该这么说，当美军还驻扎在台湾时，你不会允许台湾有台独运动。这点很重要。

尼克松：当他们(美军)还在时。

(此处有一页多的对话仍未解密)

周恩来：至于怎么找出解决台湾问题的适当方案，你们两位会想出办法来。只有等到这点解决以后，我们才会同意开全体会议讨论此事。

尼克松：绝对应该如此。

周恩来：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尼克松：这是应该在我们之间、而不是在大会上解决的事。

周恩来：确是如此。

尼克松：我们得说服罗吉斯(国务卿)、葛林(亚太助卿)两人，这是我们的难题，那是基辛格博士的事(周恩来笑)，而不是全体会议的事。

周恩来：我想讨论另外一件事。当然，我们只是互相交换意见。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南半岛部分。在这部分，你应该知道中南半岛人民的建议，我们支持这个提案。

尼克松：你指的是七点建议。

周恩来：我们支持越南临时革命政治(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所提出的 7 项建议，还有两点说明，以及印度支那人民高峰会议联合声明。这些都很明白。

如果那里的战争持续，不论是美国已经撤军，或者美国仍然有部队驻守，而战争仍然继续，我们会持续支持下去。这不只是在越南境内，而是在整个中南半岛三个国家里都适用，这是无可避免的。

第三，如果美国完全撤出该地区，而那里的战争成为一场内战的话，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目前在越南、老挝与柬埔寨境内所支持的一方。这一直是我方的立场，我们也不会改变。当然，我们希望战争能结束。但是你们双方还没找到解决方法，而我们不能干预，所以我们只好等着。我们再三申明，我们只有义务支持他们，而不能代表他们进行谈判。这已经在我们的四点公报中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我想谈些没有放入联合公报的东西，我们也不想影响你们的观点，这只是我们的看法。总统先生，像你这样以高瞻远瞩著称的一位领袖，尽管你仍然决定要实行撤出 50 万军队的命令，如果你们留下了个“尾巴”的话，那对你或是美国的荣誉都不好。因为在西贡和金边都有着不是可靠朋友的人，到最后，人民会推翻他们。那里的战事可能会拖延下去。

尼克松：总理所说的“尾巴”是指什么？他是指美国军队吗？

周恩来：是的。“尾巴”指的就是美国军队。你已经说过，如果和他们无法达成协议，那么空军和海军的轰炸将会继续，你们会持续在交通运输方面协助他们。

尼克松：我感谢总理的直率。你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很困难，正如你所提到的，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到这里来，将会得到贵政府的帮助，以结束越战。当然，总理告诉了我们，在越南方面你不能帮助我们。

周恩来：你的对手，也就是民主党人，正试着利用这点来做选举口号。

尼克松：显然的，即使公报用的字眼很有技巧，人们一定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我们对台湾采取行动，结果得到的想要的东西。而我们所企求的，是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协助我们，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得到。

请了解我明白总理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他能明白，这对我们而言确实有困难。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证，在我来访之前，我从来没有就越南问题，给国会方面任何鼓励的感觉。相反的，我告诉他们总理的政府对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困难，而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方法来解决越南问题。

基辛格：你也在《世界局势报告》(State of the World Report)中提到过这点。

周恩来：还有，在(公报的)四个共同点里，已经说明你们不会代表任何第三者举行谈判。

尼克松：我希望总理知道，我们当然必须这样，做些维护我们的利益、保护我们的部队，以及救回我们的战俘的事。我了解总理的政府可能必须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回应。

除了我们认为为了达成目标所必须做的事情以外，我们不会采取别的行动。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的战俘回来后，完成撤退行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展开谈判，那么就不是我们，而是越南方面在强迫我们持续用兵。不过，总理先生，越南和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已经做了决定。只是它必须依循正确的途径，这个问题不会纠缠我们太久了。

翻译：你说的是撤军？

尼克松：是的，完成美军撤出。但是如我所说，我强调这必须循着正确的途径来完成，我们不会在尚未达成我们的政策目标情况下，单方面开始撤军。

周恩来：但是这使得事情相当复杂，因为你的政策并不是由你的政府开始的，而是由你的前任展开的。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派遣美国军队进入。当你们开始派军后，越来越多的军队就被派去，而你让自己深陷泥沼。现在你们的政府不得不撤退，而这个不幸的问题就落在你的手里了。

至于释放战俘部分，他们一定会被释放的，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也有些例外，就像印度，他们从巴基斯坦俘虏了太多的战俘，还想留着他们当作谈判筹码。

尼克松：越南现在就是这样对付我们。

周恩来：谈到战俘问题，我倒想谈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你还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你可能并不清楚。我们对这件事展现了相当的自制。艾森豪威尔总统结束了朝鲜战争，这是件好事，而你们的战俘与支持你们的其他国家的战俘都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释放。可是在我们的战俘方面，蒋介石派遣人员到南朝鲜，在战俘营对我们的许多战俘进行各种的特别活动。正式的战俘遣返过程，是在由印度担任主席的国际委员会监督下进行。中间还有所谓的甄选过程，他们设立了小房间，让战俘由一个门进去，询问他们是否想要到台湾，然后让他们由另外一个门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在受到武力威胁的情形下，这些战俘不大可能说出真心话。许多战俘被送到台湾，有些人逃跑，而后回到了祖国。

我们当时可以把事情闹大，可以询问：“蒋介石有什么资格，插手遣返战俘的事情？”由于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而且我们送去的都只是志愿军，我们觉得不宜因战俘问题而坚持要继续打仗。我方被骗到台湾的战俘人数不只几千人，而是高达一万人以上。可是我们还是忍耐了下来。

所以，一旦发生战争，事情就会不同。对当时的我们而言，虽然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只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结束。我只说这么多。这事已成历史，但仍是我们的心头大事。

不过，即使我们的战俘去了台湾，那里还是中国的领土。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加入蒋介石的部队，这些人现在大多很老了，有些人还逃回了祖国。

尼克松：在越南方面，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了解总理的立场。不过我

们也希望；虽然他不能表示他能够干预越南情势，他也至少不要做苏联目前显然在做的事，不要鼓励越南拒绝和谈。

现在的问题是，苏联希望美国被困在越南。他们不希望我们抽身，看来他们是在阻止越南从事谈判活动。我不要求总理做回应，但是如果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都阻止越南进行谈判，那就会成为问题。

周恩来：起初当约翰逊政府在 1968 年宣布停止轰炸时，我们并不是很支持巴黎和谈的结果。当时我们觉得那个和谈并不适宜，不过，在 1959 年以后，我们的立场有了改变，开始支持和谈。事实上，为了让巴黎和谈开花结果，我们终止了华沙会谈。后来，完全是由于在南斯拉夫驻华沙大使馆一场时装表演上所发生的事，让这些会谈再度展开的。

他们也告诉了我们一些谈判的内容。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很支持谈判，因为即使战事持续下去，终究还是要谈和的，就像朝鲜战争一样。

乔冠华先生也参与了朝鲜战争谈判，这场谈判持续了两年。到最后，停战协定终于在 1953 年达成。

和谈的管道不该被关切。不过我们也只能谈这么多，我们不能干预他们的事务。

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是关于柬埔寨的。就我看来，西哈努克亲王是个很聪明的人。

尼克松：我认识他。

周恩来：他也是个爱国者。我还认为，他与朗诺、马塔克(Siril Matak)，与宋鄂丹(Son Ngoc Tanh)这些人不同。当然，在战争时期，西哈努克与柬埔寨的左派势力结盟是无可避免，也很自然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政策。尽管西哈努克亲王中的一些人员在北京，但我们从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他已经写了 30 篇东西，对他的人民发表。我们让他自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

他撰写的这些文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他的理想和我们的完全不同。基辛格博士知道这点，而总统也很快会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言论自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他现在已经在中国待了将近两年，而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可以集结出版厚厚的书了。我们任何人所发表过的文章，都不会比他多。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爱国者，所以我们支持他。他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他是个爱国者。

所以，在我们继续为双方取得相互了解的情况下，我想告诉你，这是我们的立场。

尼克松：我们.....

周恩来：你该知道，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西哈努克的好友。

尼克松：我在 1953 年曾经见过西哈努克两次。

周恩来：在金边吗？

尼克松：在金边，还有在他于 1951 年初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没人相信这点，不过，并不是我们的政策让他在柬埔寨被废立的。

周恩来：(笑)我们就这件事和基辛格博士有点争论。

尼克松：我认为，如果他与中国有亲密关系，这并不会对西哈努克造成伤害。但是他与越南的亲密关系，对他造成了伤害，因为柬埔寨人民痛恨越南人。这是我的分析，我想它与总理的分析不同。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形就是这样。如果越南肯离开柬埔寨，那么柬埔寨人民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西哈

努克回去。但是只要越南还在柬埔寨，我想西哈努克想重新掌权就很不可能。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过我们无法掌控这件事。

周恩来：由于我们的分析方法不同，我们无法达成相同的结论。因为在我们看来，约翰逊政府派遣美国部队，去镇压越南的爱国分子。而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拒绝让他们在北方的同胞南下，去支持他们的南方兄弟呢？

尼克松：我想尽管我反对这个说法，我还是能了解。我能了解北越进入南越，因为毕竟那都是越南。但是越南不该介入柬埔寨。柬埔寨人一直都在与越南打仗。他们无法对介入一事自圆其说，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会影响局势。

周恩来：这是个历史角度的问题，法国殖民主义者把中南半岛三个国家连结起来，也把他们的利益连结起来。事实上，“中南半岛”这个名词，也是由法国人订出来的。

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他们是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非常密切，其次则是经由海上交通与柬埔寨有关系，而我们与老挝则没有太大的关系。

连结他们共同利益关系的，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后来，法国人惹起了重划疆界的问题，增加了三国之间的矛盾，就像英国在非洲地区所造成的一样。

尼克松：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周恩来笑)(编注：麦克马洪线是1912年10月中英西姆拉会议时英国代表搞出来的，和非洲无关，也不为中国所承认。)

周恩来：在日本遭到挫败后，法国人再度回来占据了中南半岛的三个国家，而这也再次把三个国家的人民连结在一起，来抵抗法国殖民主义。在1954年达成协议后，这三个国家再次分隔开来。在那之后，我们才开始了解这三个国家的情况。在此之前，我们除了越南之外，对他们知道得很少。胡志明总统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如果美国当时的政府没有破坏日内瓦协定的话，情形就会不同。越南将是统一的国家，柬埔寨可能还是在西哈努克亲王的统治之下。在老挝方面，那里的情况比较不同，但是也能够于1952年的日内瓦老挝协定中解决。

可是在约翰逊当道时，约翰逊派遣了这么多部队进入南越，如果你们只看看派遣兵力的数字，单是人数的优势，就会发现他们超过了越南武装部队与南越部队的人数。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情形，就连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因为如此，越南部队利用柬埔寨作为部队移动及掩护的地区，但是我们直到1969年才知道这件事。事实是，西哈努克亲王同情越南军队，而允许他们穿越柬埔寨境内，因为他们曾经携手反抗法国殖民主义。所以，西哈努克亲王对越南所展现的同情心，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如果战事结束，越南军队一定会从柬埔寨撤出，而柬埔寨还是属于柬埔寨人的。

尼克松：总理提到中国的原则，就是不以军事武力干预邻国。那么，总理是不是反对越南以武力统治柬埔寨与老挝呢？那是我们的立场。

周恩来：那是因为战争已经爆发了，战争是由美国军队开始的，因为美军在那里活动。

尼克松：当战争结束时，总理是否认为越南应该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兵？

周恩来：如果战争完全结束，也就是说柬埔寨政权交回给西哈努克亲

王的话，那么越南一定会撤出。如果朗诺的势力在柬埔寨，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的柬埔寨人自己都不支持朗诺，他是由外力强加给柬埔寨的人。

我还是认为，在中南半岛问题方面，你们犯了错误。当然，这并不是你的政府的责任。因为原本那个地区可以变成和平而且中立的地区，或者至少那里 2 / 3 的地区能够变成这样。但是由于杜勒斯的重新划国境政策，以及破坏日内瓦协定的举动，使整件事弄成了一团糟。这在艾登(Anthony Eden, 英国首相)的回忆录里都有提到。日内瓦协定中清楚地提到要在两年后举行公民投票，但是杜勒斯却说那只是说给国内人民听的论调。

所以，如果我们想将和平与中立带到一个地区，不只是中南半岛的三个国家，而是整个东南亚的友善关系的话，我想现在还不算太迟，否则那里将不得安宁。我不单是指中南半岛，而是整个东南亚，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菲律宾。现在在这些国家里都有这般潮流，我们应该协助他们，在争取独立时，也往和平与中立的方向走。

不过这样一来，总统先生，你可能会说另外一个权力真空地区又会形成，而情况会更复杂。无论如何，你晓得我们不会介入这些地区，你也承认了这点。我们的观察结果是，如果麻烦产生的话，当地人民自己会把这个真空状况填补起来。在第一次会议时，我已经讨论过这点，当然，时机可能没有那么快，这要看每个国家人民的政治自觉程度而定。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不能自己独立起来，那么的确有可能某个强权国家将会介入这个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我们在公报里也谈到了这点。(察看公报内容)

尼克松：我们的看法不同。正如我告诉总理的，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在越南事情方面，越南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八点建议。这些建议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实现总理刚才所描述的中南半岛中立的目标，至少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个国家会是如此。我想是我们现在的问题，而我将以正确的方法来解决。

我很高兴知道，总理的政府将不会鼓动越南，不参与我们的和谈。谈判比起军事手段解决而言，是最好的解决问题方法。

周恩来：这里有个具体的问题，只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他们说他们想要继续谈判，你们说你们不愿意在这个月 17 号谈判，但是同意在 24 日。你们拒绝 17 日谈判的原因，是因为凡尔赛人民会议(Peoples'Conference in Versailles)。

基辛格：我们不认为那天合适谈判，他们今天将会见面展开会谈。

尼克松：是的，我们在试图谈判上很乐于合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听命于越南，我们也不打算要他们听命于我们。他们根本不想谈判，他们只是很强硬地认为他们就要这样，我们要不就接受，要不就拉倒，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如果他们能理性地谈判，就像总理和我现在这样，那么即使我们意见不一致，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通的基点。这件事在两年前

尼克松：韩国？

周恩来：对的，韩国。我们当然很感谢你们在南韩地区逐渐减少军力一事。

尼克松：我们在那里的兵力已经减少了 1 月。

周恩来：但是如果日本的武装部队被允许侵犯南韩的话，那将会制造紧张局势。(此处有数句尚未解密。)

尼克松：如果日本干预韩国局势的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都不会有利益。

(此处有数句尚未解密)

周恩来：在日本问题方面，我假设你了解中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对立时期，因为他们和蒋介石所签订的那份所谓和平条约是不算数的，就连蒋介石自己都这么承认。所以他们一定想找个解决方法。

目前日本执政的佐藤政府的话不可靠，他们可能今天说一套，等到哪天又说另外一套。就连他们自己的议会都不再相信政府了，所以，我们寄望在下一任的日本政府身上。

如果中国与日本能恢复外交关系，中日间的友谊不应伤及日本与美国的关系。

我们甚至还说，如果我们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那么我们甚至会不首先使用核武。所以，我们对他们并没有威胁。这个和约，将不会限制日本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在目前，苏联可能比你们还要反对日本与我们建交。葛罗米柯最近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公开告诉福田首相，在5年内，中国与苏联间将会产生大冲突，这个冲突将比珍宝岛事件还要严重。

葛罗米柯还告诉了福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苏联可能考虑把北方四岛在和约中载明归还给日本，但是现在还不能归还。为什么呢？因为中苏国界谈判正在进行，如果苏联现在归还领土给日本，谈判就对中国比较有利。

尼克松：就像连锁反应。日本人永远不会拿回四小岛的。苏联人从来不会把任何东西还给任何人。

周恩来：他们一直在后悔当初沙皇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的事情。当初卖了多少钱，是不是500万美元？

基李格：1000万美元。

尼克松：这是我们所做出最好的购买决定，现在我们还发现那里有石油。

周恩来：他们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那里有石油。

尼克松：那里有个很大的油田。

周恩来：你去年在那里接待了日本天皇，你这次还要回去……

尼克松：我们会在那里过夜。

周恩来：那里不像关岛或是夏威夷那么温暖。

尼克松：那里没有白天，只有长久的黑夜。每天大概只有两到三个小时阳光，他们叫它“午夜阳光”。

(此处有数段尚未解密)

尼克松：不过，有一件事很有趣，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及日本，都接受美国的援助。还有许多其他国家都接受美援，我想如果我们分析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表现得这么好，那是因为他们人民有原动力，也愿意辛苦工作，而有些我们援助的国家人民则没有这种特质。这也就是我的重点：有用的并不是我们带给一个国家的援助，而是这个国家人民有没有意志力利用这些援助。如果他们没打算去好好运用这些援助，那么这些钱就只是浪费了而已。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对印度的援助。(周恩来笑)除了好像我们援助得越多，我们在那个国家的影响力反而越小这件事以外，我们并不后

悔援助了印度。重点是，与日本相比，印度似乎没能好好利用我们的援助，因为他们缺少那种原动力，也缺乏日本人那种决心。

周恩来：一个国家人民的特质是一回事，但是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些共同的特质。最重要的事就是，日本和德国都是战败国，而他们很急于恢复活力。你也可以用意大利来举例，但是他们的人民缺少那种精神，你可以拿他们做个反例。

尼克松：日本和德国有很强的原动力，中国人也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特质。但是有些(南亚)次大陆的人民，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因素，就是没有这些特质。(此处有一段尚未解密)

基辛格：总统指的是美国的印地安人(基辛格故意开这个玩笑，以免消息外泄后，过于刺激印度人，却也可看出基辛格视印地安人如无物的种族偏见)。(周恩来笑)

周恩来：在所谓的次中国问题方面，我们很同情巴基斯坦，因为他们被分割了。我们该协助他们，总统说你只能给经济援助，我已经注意到了。至于承认孟加拉共和国这件事，当你们决定要承认他们的时候，请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双方已经同意，在你们如此做之前，你们会告诉我们。

在我们这边，我们当然会在你们承认孟加拉之后才承认他们，我们还可能是最后一个承认他们的。但是那并不代表我们会拒绝与一个有这么多人民的地区进行接触，那样做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希望让巴基斯坦处于旭她的处境，认为他没有朋友，我们也要考虑回教国家的感受。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发生前，我们已经在仔细考虑让我们的驻印大使返回住所了。

我们希望增进与印度的关系，而印度政府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愿，甘地夫人公开明说了。

尼克松：当我在新德里与华盛顿与她见面时，她告诉我这件事。但是她也告诉我一些其他事情(周恩来笑)。她说她不会反对我与总理及中国政府见面，只要不伤害她的话。

周恩来：但是.....

尼克松：但是.....

周恩来：不要伤害她.....谁要伤害她啊？

基辛格：总统先生，我们该再度指出，关于承认孟加拉共和国一事，你的决定是把它与三月底印度撤军以后串在一起。就这个问题，总理无疑地将会由美国媒体上看到许多揣测之词，因为在这件事方面，美国官僚体系和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希望我们的脚步再加快，孟加拉也要求我们承认他们。

尼克松：他们要我们在此一访问之前就采取行动，而我拒绝了，

基辛格：所以，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会通知你。在那之前，不要相信你听见的道听途说。

尼克松：只有你从我们，从我这里听到的消息才能相信。不要相信媒体。

周恩来：好的。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你如何看中东问题的解决之道？(周恩来笑)法国希望我们参加中东问题的讨论，我们拒绝干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介入那里的事务。

尼克松：我们正试图就苏伊士运河问题，研究一个可能的临时性解决办法，也试着让以色列政府与阿联共和国(埃及一度与叙利亚合并后的国家)间，进行间接的对谈。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不认为这些问题能在短期内得到

解决。那可能是因为，解决中东问题的重要关键之一，是操纵在苏联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既然我们与总理完全开诚布公，我希望能说得更精确些。我们希望能维持停火状态，我们也会试着让双方展开对谈，并且对以色列运用我们的影响力。但是双方目前在达成协议方面，距离还很遥远。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很困难，也许当副外长回到联合国的时候，他能够把中国式的智慧带过去，而解决问题(周恩来笑)。

周恩来：那是不可能的。

尼克松：你得和马立克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笑)。

周恩来：就连基辛格博士都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担心他们会怀疑他。所以基辛格博士不想与我讨论中东问题。你对苏联一方面表示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部送了那么多犹太人去以色列的做法，有什么看法？那不是会让事情更复杂吗？我听说他们会送 50 万人去以色列，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养活这些人吗？

基辛格：总理先生，我不认为他们要送这么多人。

尼克松：他们都想要去。

基辛格：是的，他们想去以色列。目前为止，苏联送回去的多半是老年人，没有生产力的的人，他们对以色列政府是个极大负担。他们并不很能生产。

尼克松：以色列不是个富裕的国家，它没有石油。

基辛格：我必须承认，苏联的作为是令人不解。我相信人数远远不及 60 万人，我猜是每年 5000—1 万人。我可以找到详细的数字，我会找出详细的数字。

尼克松：我们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问题采取强硬的立场的原因之一，是要阻止苏联采取与中东地区相同的冒险政策。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所可能导致的风险，比巴基斯坦的未来还要高得多，而单是巴基斯坦的未来，就已经是很大的赌注了。它牵涉到一个原则，就是由苏联所支持的大国，是否能够分割他们的比较小的邻国。一旦这种事被容忍了，世界就变得不安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联合国投票时，是以 10：1 的比数反对。

可措的是，这件事没有得到太多的报道，你几乎会认为联合国对这件事完全没有讨论过。

周恩来：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面倒的情况。票数是 104：11，而在那 11 票的赞成票中，其实只有两个国家，那就是苏联和印度。

尼克松：我想总理对我在中东问题的观点会很有兴趣。苏联并不把以色列看成一个麻烦。我知道中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苏联事实上是在玩比较大的赌注，它要在地中海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它要取得通往非洲之路，也要争取在中东地区的全面影响力。

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而以色列只是个小卒，只是苏联的托辞而已。

总理先生，我们对中东地区的关切，至少我的考虑，不仅是以色列而已，而是更大的地区。顺便正试着把魔掌伸到这个地区，而他们必须被制止。举例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约旦危机的时候，采取警告苏联的立场，我们警告他们如果苏联对当地采取积极介入的态度，我们会认为事关我们的利益所在。

周恩来：时间到了。我再讲两句话，我们可以在明天多谈一点。其实上，我的话还不只两句，让我们明天继续吧，因为尼克松夫人就要来了。我

们最好在尼克松夫人即将来临前停止会谈，我们明天可以继续。

尼克松：或者我们可以在今晚凌晨三点继续(周恩来笑)。

基辛格：他会接受的，他有一次让我工作了一整晚。

周恩来：你可以在享受了烤鸭晚宴以后，和副部长整晚工作。总统明天想去看看紫禁城。(一行人离开会桌时，他们还在讨论未来要举行的全体会议及私人会谈事宜。)

四、美苏禁核协定

中国不能接受

1973 年春天，美国与中国协议在华盛顿和中国互设联络处前，双方沟通的秘密管道，除基辛格不时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外，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黄华和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是两位重要角色。后者联络的对象是甚受基辛格信任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华特斯将军，基辛格本人趁去巴黎与越南谈判之便，也会和黄镇见面。纽约方面则由黄华负责与美交涉。基辛格、黄华在纽约会晤的地点值得注意，既不是美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不是中国代表团办公室内，而是中情局在纽约的秘密招待所，双方交往的隐密性可想而知，国务院当然是被蒙在鼓里，而国务卿罗吉斯大权旁落，早在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即已很清楚了，罗吉斯以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竟不能参加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谈。基辛格旁若无人地大搞秘密外交，从他与黄华会晤时，有意拉拢西德与中国建交以及把苏联有关核武的秘密建议透露给黄华等动作中表露无遗。

白宫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加会谈人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洛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翻译施燕华

日期及时间：1972 年 8 月 4 日，下午 5 时 15 分于 6 时 45 分。

地点：纽约市

(会谈刚开始，与会人士先是寒暄。基辛格对黄华的浅灰色的轻装加以赞美)

基辛格：我今天早上遇见布什大使，你对于韩国的立场把他吓着了。你们还威胁他。

我们得多给他些支持。

黄华：(立即拿出一张纸，并宣读内容)承接我们上次的谈话，我想针对基辛格博士在 7 月 26 日就美、苏双方有意签订一项核互不侵犯条约一事，提出下列意见：“第一，中方认为苏联提议之目的，是赤裸裸地想建立世界核武霸权。

“第二，苏联的建议只表明苏联和美国不应向对方及其盟国使用核武器。这很明显地是延续着片面禁止核试爆条约及禁止核武扩散条约之后的另一个企图，该核武器成为少数国家独占的工具，维持核武的优势，并且继续对仅有极少核武、没有核武、和被禁止发展核武的国家做出核武威胁，强迫这些

国家接受两个核武霸权国家之一的影响，从而使两个核武霸权国家得以随心所欲地瓜分世界，并操纵各国的命运。”

(黄华并进一步解释，美苏禁核协定，中方是不能接受的。这份协定抵触国家平等原则，透露了两个超级强权国家合谋的讯息，也违反了《上海公报》中反霸权的主张。北京方面对核武所能接受的唯一协议是，必须以规定要销毁核武器，并且声明不使用核武，尤其是不使用核武对付非核武国家，作为第一步。)

黄华：我们希望美方能慎重考虑这点。

(黄华并宣读了三份备忘录，第一份要求联合国停止干预朝鲜问题，第二份感谢美国在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国外访问期间，所提供的保安协助，第三份则是感谢基辛格在增进中国与西德的交流方面所作的努力。不过，基辛格对中国坚持要在联大讨论韩国问题一事，不表赞成。他提议中国应该考虑采取一些不至于让南韩与中国更加疏离的行动。)

基辛格：关于德国问题……我有个不需要通过外交路线，就能够与德国总理联系的直接管道。

黄华：总理？

基辛格：勃朗特总理。我的管道是总理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助理，他的工作性质与我协助美国总统的工作很相似。他曾经就北京与波恩间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询问过意见，据他个人表示，这件事并不是非常紧急。他也表示，西德最重视的还是欧洲。

我现在要考虑如何答复他。根据我的情报透露，巴尔——这是我的管道的名字——与苏联的关系很密切，而每次我同他谈话，他都会向他苏联方面的朋友报告。因此，我在回答他的时候，必须稍微谨慎一些。可是，正如我先前告诉你的，我可能在9月初前往西德，我可以直接和勃朗特总理会谈。

站在美国的立场，我们很支持西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是，你们是不是想要在西德大选前完成建交。根据巴尔给我的电报，西德是在12月3日举行大选，这个大选的日期，还没有公开宣布。

黄华：我们在与西德建交方面，还没有得到具体指示。

基辛格：当然，在我从你这里得到任何答复之前，我只会给他一个非承诺性的回答。

黄华：我的消息(看着他的资料)显示，在西德外长施洛德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指出西德各方都希望早日与中国建交，而中方也已经做出正面回应。

基辛格：目前的问题，就在于双方对“早日”的定义了。如果你希望，我可以通知德国人你们准备好要建交了，不过也许你们会另外通知我。我必须通过巴尔以外的管道来作这件事。

施女士(翻译)：什么？

基辛格：要经由巴尔之外的管道进行这件事，因为巴尔会立刻把此事向苏联报告。

不过，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请告诉我，我会等候回答。

(黄华指出建交没有太大困难，因为西德与蒋介石集团间没有关系。基辛格也指出，建交的时机，以及究竟是通过目前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或是基督教民主党建交，基本上只是个策略问题。基辛格接着说：“我只会概略地给他一个回答，并且只说和你进行的很顺利，不会就时机问题透露任何讯息给他们。”)

基辛格：我们来谈谈核问题。首先，我们同意你先前所提出的分析。不过，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你们“认定”的我方动机(黄华在此时特别向翻译纠正英文文字 ascribe 的翻译)。

因为如果这真是我们的动机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们讨论了。

让我告诉你我们对情况的分析和我们打算采取的策略，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我们的分析是，苏联的政策有意孤立你们，而由过去两年之间苏联所签订的许多协议，以及他们在面对其西方国家政策挫败时所展现的耐心来看，我们相信苏联对东方的野心非常积极。(黄华在此时向翻译问了一件事。)这是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苏联对东方国家展开侵犯的最危险时期，会在1974年—1976年间。我们也认为，允许莫斯科建立欧亚地区的霸权，对美方并不利。因此，针对我们的需要，而不通过任何(与中国间的)正式协议来防止这个情况，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了。我们不能刻意在西方国家间维持紧张关系，因为我们的盟国有他们的策略，而且西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对我们并没有直接利益。

黄华：你是说，西方国家对你们没有直接利益？

基辛格：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无益于美国。我们无意维持西方国家间的紧张状态，但是我们有意维持我们在西方国家间的立场和地位。只要尼克松总统还在位，我们绝不会片面削减驻欧兵力。正如我曾和贵国总理谈过的，即使签订协议减少兵力，美方也不会裁减超过10%。

不过，在我刚刚指出的危险时期之前，我们要努力完成的事情，就是和中国建立足够的关系。这样一来，一旦中国遭受攻击时，美国可以声称这将影响我们的利益。如果你认为我们只是想向你们谋取商业利益，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至少就我们这一任的总统看来，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利益，只是第三优先而已。我们的基本策略就如刚才告诉你的。为了要建立一个说得过去的关系，也为了不要让苏联有借口说他们被包围，我们希望与苏联周旋，维持表面的对等状况。(黄华在此时查看了翻译的翻译内容，而后向基辛格微笑表示他可以继续。)这是个很复杂的策略，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也是个很复杂的情况。美国不会参与任何有意孤立中国的协议，也不会参与可能针对你们的协议。我们想要的，是找出一个方法，去除这份(核武)建议案的实质内容，但是又能绘它笼统而抽象的特质。这样一来，这份条约就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对苏联的提议作出答复，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的想法。

举例来说——我要告诉你，这是我们正在考虑的内容文件——有个提案的构想我们要玩一玩，在竭尽全力以创造一个国际环境，让任何人都不得使用核武。而在第二段中，我们打算建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双方必须同意不对对方、对方的盟国、或是对任何第三国家实施威胁或是军事行动。还有，任何一方都不得鼓励其盟国或是任何第三国，从事威胁或是军事行动。

我们还没有提出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案不在内部讨论中。它使这项协议非常广泛，不只是适用于核武国家，却也不具约束力。如果你有任何看法，我们都很欢迎。正如我所说，我们还没有对苏联的提案有所回应，也不会接受我先前和你提及的那个关于核武的提议。

黄华：中方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白了(查看手边的资料)，那就，中方希

望美方能慎重考虑中方的建议，也就是说，有关完全禁绝或彻底摧毁核武的协议，须与所有国家咨询商来达成(重复)……与所有国家磋商。

基辛格：我了解你的意思。

黄华：(看着手中的资料)第一，核武国家应该达成协议，同意不对彼此及其他非核武国家使用核武器。我们认识只有这样的协议，才是正确的，而且才能解决问题。

基辛格：我了解这点，这和我们的看法并没有不同。

黄华：你认为苏联方面会接受这样的提议吗？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

基辛格：(稍微停顿一下)你问他们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

施燕华：是的。

基辛格：你们好像曾经提过这样的建议。

黄华：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中，我们曾针对这个议题提出我们的立场，并要求马立克答复，但是他没有回应。在过去，苏联方面曾经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和建议。

基辛格：这我不太确定。我怀疑苏联曾经提出过这种建议，但是我不能确定。你可以确信的是，关于这件事，在我们采取任何步骤前，都会通知你。

黄华：那么美方同意我们的建议吗？

基辛格：(稍微停顿一下)我们在试着避免的一个状况，就是苏联能利用传统武力胁迫我们的盟国，而我们却不能使用核武器来保卫西欧国家。

黄华：中国所提出禁用核武器，并不是唯一的步骤，而是第一步。

基辛格：这也是我们的主要考虑，苏联在欧洲部署的军力很强，是我们任何一个盟国都不足以自我防卫的。

黄华：我希望当美方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你会通知我们。

基辛格：那当然！我们不会采取行动，而让你们毫无所知，或是没有机会和我们讨论的。你可以告诉总理，我们将不会接受苏联的提议。

黄华：我会向总理报告的。

(基辛格接着讨论自己如何利用幕后管道，与英国内阁秘书长川德为达成美、英在三角策略上的共识的努力。)

黄华：(打断基辛格的话)我想搞清楚一点，你刚刚提到美国有意避免这种情况。这句话是不是针对苏联的提议案而说的呢？你刚刚说：“避免这个情况。”

基辛格：我们是想阻止苏联在东亚地区积极运作，这是我想防止的情况。我们也和东亚国家讨论过关于苏联提议案的事情，但是还不知道他们的反应。和他们讨论的时候，并没有像和你们讨论这么多细节。而且，我只和东亚地区两个国家讨论过这个问题……

黄华：你能不能再多谈谈关于 1974 到 1976 年间，将是最危险时期的说法？

基辛格：我的看法是，苏联方面要到那个时候，或可能再稍微早一点，才能完成与西方国家的和议和欧洲安全会议，裁军谈判也会有更多的进展，以及军队的调动。

黄华：所以，是在欧洲安全会议和裁军谈判都有进展时……

基辛格：是的，那时候，苏联将已经建立一个基本上希望和平的动机与声誉，而他们的军力建置也已经完成。我认为 1974 年是危险期的一个原

因，是有一项新的核武器已经开始研究，而这项新核武到 1974 年可望完成。

翻译：你说有新的核武器正在研究……？

基辛格：用在战略武装方面。这些武器主要是针对我们。

黄华：针对你们？

基辛格：多多少少是的。我不希望你们觉得只有你们才被苏联盯上了。(苏联的)战略武装来防范我们……大多数是针对我们的。有些是防范你们，但是大多数是针对我们的。

黄华：谢谢你的说明。

基辛格：我不想误导你。这只是我们在白宫方面的解读，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些看法。如果美国政府换了，他们对情况发展的看法，可能不会那么剧烈。

翻译：什么？

基辛格：在这次选举里面，我们的对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想你们可能也知道了。

(基辛格简短地讨论起越南和平谈判，拿了些文件给黄华看，并指出越南企图“从我们国内下手。”))

黄华：我们的会谈结束了？

基辛格：是的。

(在结束会谈的轻松谈话间，基辛格询问黄中，如果有意在中国境内拍摄电影，应该如何与中国政府联系。“譬如说，美国政府的一个好朋友，鲍伯·霍伯，最近提到想拍摄中国的一些景物，供一个节目里的背景使用。”虽然基辛格不打算介入，但是他表示：“如果这些人能得到较有人情味的回应，将会是很好的事。”而黄华则表示霍伯可以写信给设在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或是直接写信给他。)

五、送 1000 万名中国妇女到美国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加会谈人士：毛泽东、周恩来、外交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芸；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洛德。

日期及时间：1973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晚间 11 点半至隔天凌晨 1 点 20 分。

地点：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寓所。

1973 年 2 月 17 日晚间 11 点，于钓鱼台宾馆附近，基辛格与访中官员住宿的别墅里，周恩来在会议中告诉基辛格，他和洛德已获邀在今晚 11 点半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表示，他会很快亲自陪同到毛泽东的寓所。

基辛格和代表团成员稍后返回宾馆，周恩来则在 11 点 20 分赶到，随即与基辛格同车至中南海，洛德则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朱副司长陪同前往。周恩来先让基辛格在毛泽东寓所的外厅等候，然后从另一个房间进入毛泽东的起居室。

(毛泽东由身边年轻的女看护搀扶，从座椅中起来，向基辛格打招呼，

一旁的摄影师则忙着拍照。毛泽东欢迎基辛格来访，基辛格则表示，距离上回他首次见到毛泽东已将近一年。毛泽东接着招呼洛德，并称他好年轻，比两个翻译都要年轻，洛德则答道，他再怎么说明都要比翻译年纪大。接着毛泽东指指一旁的大沙发，两方人员逐一坐下。摄影师则继续忙着拍照。)

毛泽东：(边走边说)我看起来还不差，老天已经准备叫我回去了。(转头朝洛德说话)你真年轻。

洛德：我已年事渐长。

毛泽东：在座的要数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元帅则是反对你们的政策。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他也反对杜勒斯拒绝承认我们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

当年，你们跟我们作对，我们也跟你们作对。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辛格：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现在我们之间算是朋友。

基辛格：我们也是这样想。

毛泽东：也正是我说的。

基辛格：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跟其他国家会谈时，从来不像跟你们这样坦白和开放。

毛泽东：(对着摄影师说)这样就够了。(摄影师旋即退下)不过，我们别说些假话或耍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找个地方放一下，测试一下我们。我们也不搞隔墙有耳、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连大动作也没什么用。我跟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一碰到重大事件，你们中央情报局就没有什么用处。

基辛格：的确如此，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的。

毛泽东：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某方面的消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比如，他们就不知道林彪这桩事(周恩来继续笑看)。还有，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泽东：你事情办得不错。你飞遍全世界，你是燕子，还是鸽子?(大笑)越南那档子事基本上应该算是解决了。

基辛格：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也该过渡到平静发展了。

毛泽东：对呀。

基辛格：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我们这里也是一样(边说边比手势)。你们总统当时坐在这里时也说过，每个人依其需要，按自己的方法行事。这样贵我两国才能携手合作。

基辛格：是的，我们都面对同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致的。

毛泽东：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互相伤害。我们才能联手对付一个浑蛋。(大笑)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

要批评我们。照你们总统的说法都是意识形态作怪。你们说，共产党滚蛋，我们就说，美帝滚蛋。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嚷嚷，不这样嚷的话不行。

基辛格：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反而会混淆视听。我跟周总理提过，由于你们坚持原则，你们在欧洲讲话就比我们更大声，这很怪。

毛泽东：至于美国，不论在欧洲或是日本，我们都希望你们能够跟人家彼此合作。

还可以拌嘴吵架，基本的合作还是需要的。

基辛格：至于中美之间，就算有时彼此批评，我们还是会配合你们的，也绝对不会参与任何打算孤立你们的政策。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也同意在重要事务上应该和他们密切合作。欧洲现在的领导圈子非常软弱。

毛泽东：(做着手势)法国总理蓬皮杜现在可是腹背受敌罗。法国社会党跟共产党一起跟他捣蛋呵。

基辛格：是啊，那两个党合并了。

毛泽东：(手指着基辛格)他们要一起搞，苏联则希望法共执政。我不喜欢法国共产党，就像我不喜欢你们美国共产党。我喜欢你，但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大笑)

西方历史上，你们总是有套政策，譬如说，两次大战中，都是你们逼着德国和俄国宣战。

基辛格：但是我们可没有逼俄国人打中国，因为中国发生战争对我们来说，就和欧战一样不利。

毛泽东：(翻译还没有翻译基辛格的发言之前，毛泽东就先用中文回答，还一边数着手指头。翻译唐闻生翻完基辛格的话，再把毛泽东的话翻成英文。)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是不是打算推动西德和苏联和平相处，然后苏联就可以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打这个算盘，让苏联往东推进，好对付我们和日本。或是用苏联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牵制你们。

基辛格：我们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比较支持不赞同这项政策的德国在野党。(毛泽东开始拙雪茄，并试看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辛格：我们也没有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毛泽东把脸转向周恩来)

周恩来：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 10%—15%。

基辛格：安全正确。

毛泽东：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导弹部队吧。

周恩来：大概在 35 万左右，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泽东：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辛格：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 27.5 万人，还不包括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泽东：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韩国军队，我听说大约有 30 万人。

基辛格：大约 4 万。

毛泽东：蒋介石那儿大约有 8000—9000 人。

周恩来：在台湾吧。

毛泽东：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4 万人在琉球、2—3 万人在日本本

士。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只有美军 1 万多人。

基辛格：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泽东：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 4 万人。

基辛格：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泽东：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辛格：我们在南朝鲜确实有地面部队。

毛泽东：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辛格：主席，我们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再另外去一趟东京。

毛泽东：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辛格：有点爱恨交加。

毛泽东：(比手势)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说，总之一句话，二次大战期间，苏联专干看人上吊抽椅、落井下石的勾当。

基辛格：没。

毛泽东：也可以这么说，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地。(周恩来轻笑)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半个新疆和东北的满州国，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基辛格：他们还拿了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泽东：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毛泽东转头和周恩来讨论)库页岛属于千岛群岛南部，我得查查字典，看它的中文名叫什么。

基辛格：日本人非常想去俄罗斯做生意。

毛泽东：(点头)他们也想从苏联那儿抓点儿什么回来。

基辛格：但是我们会鼓励日本与我们之间密切交往，也欢迎他们与中国发展关系。

毛泽东：我们也认为与其让日本和苏联越来越密切，我们希望他们改善和你们的关系，这样比较好。

基辛格：如果日本和苏联达成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那会满危险的。

毛泽东：这大概不会发生。

周恩来：前景目前看来不是很好。

毛泽东：我们这方也能帮点忙。

基辛格：苏联已经展开行动了，不过日本还没回复。他们已经邀请(日本的外务省大臣)大平正芳访问莫斯科了。

周恩来：是的，今年下半年。

基辛格：今年。

周恩来：在这个问题方面，大平对苏联的立场好像比较清楚。但是，日本方面有些人对苏联的了解，比不上他们的外务省大臣。

基辛格：没错。

周恩来：那也正是您所称的官僚作风。

基辛格：我们已经准备就这些事情与你们交换情报。

周恩来：(向毛泽东)我们已经谈定，在彼此的首都设置联络处外，还要维持黄华和白宫间的联络。

毛泽东：(向周恩来)重点在哪里？

周恩来：联络处将处理一般公众事务，至于不由联络处处理的比较机密和迫切的事项，则透过黄华大使的管道来处理。

毛泽东：黄华最近运气很不顺。(周恩来笑)他在你们那里干得挺好的，一回到上海就扭了背了。

基辛格：等他回去，我们会帮他找个医生。

毛泽东：是的。(周恩来笑)看起来他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些。他一回到上海，就跌了一跤。从你们的总统接待我们的杂耍团的气氛上来看，我认为越南问题就要解决了。

还有些谣传说你也快失势了(笑)，这儿在座的女士们都对这些谣传很不高兴(笑，尤其是自女性。)他们说如果博士失势了，我们都会失业。

基辛格：不只是在中国如此。

毛泽东：是的，对整体局势也会产生骨牌效应。

基辛格：那只是媒体界的臆测而已。

毛泽东：只是臆测吗？

基辛格：纯属臆测。

毛泽东：毫无事实根据吗？

基辛格：毫无根据。而且事实和你们臆测的恰好相反，我们目前在主要位置上，都可以部署自己人。

毛泽东：(点头)你的总统说，你们目前在贸易障碍问题上所提出的一项提议，就像是要把万里长城搬到美国去一样？

基辛格：我们想做的事，是要降低贸易障碍。

毛泽东：是降低吗？那你们所做的事情，可真是吓死者百姓了！你们说你们会增加关税及非关税障碍，我们以为你们这样做，是要恐吓欧洲和日本。

基辛格：有部分目的是如此，我们正在向国会提出一个让我们有权力增加和降低障碍的法案，以便让国会通过。我们必须让大家有个印象，就是我们可能会增加贸易障碍。

我们希望能争取以这项行政权，而不需要每次经国会通过。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国会降低贸易障碍，他们会加以拒绝(周恩来笑)。所以，我们要求行政权，来增加或者减少贸易障碍。

毛泽东：万一国会不通过呢？

基辛格：我们相信国会会通过的，这是场硬仗，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会赢。在我们的议案里，我们的文字很广义，相信可以免除对中国的歧视状况。

毛泽东：我们两国之间目前的贸易少得可怜，不过也在慢慢改善中。你要晓得，中国是很贫穷的。我们的物资不多，唯一过剩的就是女人(笑)。

基辛格：在女人方面，我们没设下进口限额或是关税。

毛泽东：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是几万个(笑)。

周恩来：当然，是要在自愿的基础上。

毛泽东：让她们到你的地方去，她们会制造灾难，这样一来，你就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了(笑)。

基辛格：我们在对华贸易的兴趣并不在于商业上，我们的重点，是要建立一个双方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双方目前已经展开的政治关系来说，是必需的。

毛泽东：是的。

基辛格：我们的会谈，也是本着这个原则进行的。

毛泽东：我曾经和一位外国朋友谈过(此时翻译与毛泽东进行讨论)。我说我们应该在这些国家间划上一条平等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此时毛泽东咳嗽得很厉害)、土耳其和欧洲。

基辛格：我们的观念很相近。你可能已经由报上得知，海姆斯(前中情局局长，美国驻伊朗大使)已经前往伊朗去了，还有许多揣测，认为这会对我的地位产生影响。事实上，我们派海姆斯去伊朗，是让他解决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波斯湾问题的。他以往的职位和经验，可以胜任此职，而且我们在那里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能了解当地急需解决的复杂情势及问题。(毛泽东此时又点了一根雪茄)虽然我们没有公开声明，我们会充分授权给他，让他和这些国家打交道。

毛泽东：我们不太了解你们美国的事情。有许多事我们不太了解，例如，你们的内政事务，我们不了解，还有你们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不了解。也许在你未来四年任期内，我们能够多学一点。

基辛格：我告诉总理你们的行为模式比我们直接甚至大胆得多了，由于我们国内情势的关系，我们会坚决执行并且不受民意干扰。因此，彼如有真正的危险出现或敌对的意图活跃，不论他们在何处显现，我们都将坚决抵抗；而且，就像总统跟主席说的那样，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故作仁慈。

毛泽东：(笑)这真是一句实话。

基辛格：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毛泽东：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 1000 万人。(在座人士皆笑，女士笑得特别厉害)

基辛格：主席给的数目更多了。

毛泽东：我们这样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损害你们的利益。我国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的小孩也太多了。(笑)

基辛格：这可是一个新奇的提议，我们要好好地研究。

毛泽东：你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你的访问正是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笑)

基辛格：我们会研究如何利用与分配。

毛泽东：要是我们叫她们走(去美国)，我想她们都会肯的。

周恩来：这也不一定。

毛泽东：那是因为她们的封建思想，大国沙文主义。

基辛格：美国人肯定会接纳她们。

毛泽东：中国人非常排外，比如，在美国你可以看到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但在中国你看得几个外国人？

周恩来：非常少。

基辛格：非常少。

毛泽东：现在在美国大概有 60 万中国人，我们这儿的美国人可能还不到 60 人。我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总是搞不懂。

唐闻生(翻译)：洛德先生的太太是中国人(编注：名叫包柏漪)

毛泽东：哦？

洛德：是的。

毛泽东：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就是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外国人。我们这儿大概没有印度人，日本人也不多；可是跟其他外国人比起来，他们人数就比较多，有些还在这儿结婚生子呢。

基辛格：当然，你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没有那么幸运。

毛泽东：是的，也许那正是一部分的原因，过去 100 年前，义和团革命时，主要是对抗八国联军，接着是日本。日本占据中国 13 年，他们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土地；过去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不但强占土地，还向中国索取赔款。

基辛格：对呀，还有治外法权。

毛泽东：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避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估算赔款也很困难，没有任何会计师能够算出来。然而，如此我们才能消弭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可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多了。

基辛格：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司法上的问题。(毛泽东点头称是)未来几年间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马上就会开始运作。

毛泽东：是吗？

基辛格：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泽东：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吗？

基辛格：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恩来：你是指苏联？

基辛格：我就是指苏联。

周恩来：沈小姐了解你的意思。

毛泽东：(看着翻译沈若芸)这个中国人英文讲得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恩来：她是沈若芸。

毛泽东：姑娘。(周恩来笑了。)今天我讲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得向中国的妇女致歉。

基辛格：可是在座的美国人听了都垂涎三尺。(毛主席与女士们都笑。)

毛泽东：假如我们要去美国设联络办事处，你要沈小姐还是唐小姐啊？

基辛格：我们会透过黄华的管道来处理此事。(笑)

毛泽东：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辛格：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都很称职。

毛泽东：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 20—30 岁，等到他们老了以后，就不能翻译得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恩来：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泽东：我们应该送一些只有这么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辛格：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流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泽东：100 个学生当中如果有 10 个人学好外语，那就很成功了，即使有几十个学生不想回国，好比说一些女孩想待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着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不肯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

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的。许多老一代的华侨不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就好多了。

基辛格：在美国，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说英语。

周恩来：指比较年轻的一代。第一代都不肯学讲当地语言的。有一位老华侨后来回国定居，1950年代时，她在北京去世，死的时候90多岁。她当时还是我们政府的人，一个英文字也不讲，她是广东人，保守得不得了。

基辛格：中华文化太特别了，所以很难跟其他文化同化。

毛泽东：中国语言还不差，中国字就太难了。

周恩来：中国字很难学。

毛泽东：而且口语和文字读写之间有很多矛盾，口语是单音节的，文字却是用部首组合的。我们也没有拼音字母。

基辛格：我听说你们打算要把中国字拼音化？

周恩来：我们第一步还是要把语言标准化。

毛泽东：我这样的老头子学不来(标准)中国话，我们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都是中文，甚至没有几本字典，其他大部分的书都是中文。

基辛格：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辛格：“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笑)

毛泽东：假如俄国要攻击中国，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讲我们将还以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

(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泽东：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会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辛格：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欧洲想什么我不想判断，他们反正也不会做什么事，基本上他们根本与此事无关。(毛泽东此时请基辛格和洛德喝茶)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孤立。

毛泽东：(笑)那又如何？因为自从你们陷在越南以后，碰到这么多困难，你想，如果苏联陷在中国，他们感到舒服吗？

基辛格：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泽东：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陷在中国里面，半年、一年、二年、三年或四年，再去动苏联的脑筋，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就是追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帮助来对抗中国。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动机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故意联苏打中的。

毛泽东：(打断基辛格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的目标是要瓦解苏联。

基辛格：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泽东：(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基辛格：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我们希望避免这种事情。(周恩来看表。)

毛泽东：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基辛格：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周恩来笑。)

毛泽东：我们国家有许多妇女，她们根本不会作战。

唐闻生：那不一定，我们也有妇女特遣队呀。

毛泽东：她们只是在演练，真的作战时，她们一定会赶快逃进地下庇护所。

唐闻生：假如我们公开这几分钟的谈话，将会激起半数中国人的公愤。

毛泽东：那是中国一半的人口。

周恩来：首先，那根本过不了外交部这一关。

毛泽东：我们称今天的会议是秘密会议；(中方人笑)我们今天的会议要公开，还是保密？

基辛格：都由你决定，假如你同意，我打算公开会议内容。

毛泽东：你的意思如何？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基辛格：我想还是公开好。

毛泽东：那么，咱们今天讲到女人的话都当没讲。(笑)

基辛格：我们将从记录中删除。(笑)我一回去，我们就来研究这个提议。

毛泽东：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对付美国的方法，那就是送 1000 万名妇女到美国，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美国的利益。

基辛格：主席这个想法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了，我下次开记者会的时候一定要拿出来讲。(笑)

毛泽东：对我来说无所谓，无论如何，老天他已经给我一封邀请函了。

基辛格：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泽东：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摄影师进入会客室)他们要拍我们。(毛泽东在不需旁人搀扶下起身向美国访客道别。)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不能见到她及罗吉斯国务卿。

基辛格：我一定会转达。

周恩来：新闻声明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内送给你。(毛泽东陪着基辛格到外厅并与他及洛德道别，然后周恩来陪同基辛格登上座车)

六、柬埔寨发生政变问题

以下两篇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主题是柬埔寨。此时美国和越南已在巴黎签定了和平协议，可是这并不是持久的和平，柬埔寨当时外在的情势如此，内部则是朗诺当政，而国王西哈努克自遭朗诺发动政变废立后，一直在

中国支持下，在北京度其流亡生涯(有时也去朝鲜的平壤小住)，可是朗诺政权在红色高棉打击和拥护西哈努克势力的双重夹击下，并不稳定，已呈摇摇欲坠之势，完全靠美的军援支撑着。但在美国国会一再通过法案，决意停止对柬埔寨援助的情形下，柬埔寨的情势已是岌岌可危。基辛格想借中国总理周恩来之助，促成朗诺与柬埔寨境内各种势力与西哈努克之间的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甚至不惜牺牲朗诺，同意西哈努克重返柬埔寨执政为代价，基辛格愿意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要证明美国并未参与或支持朗诺发动的政变。

中国方面因不愿见越南称霸中南半岛，加上周恩来不认为红色柬埔寨已有主宰全柬埔寨命运的能力，故愿意助美国一臂之力。据基辛格最新的回忆录(再生岁月)说，1973年5月27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了以下和平方案：一、军事上就地停火，美国停止轰炸；二、政治上朗诺出国，此事须在停火后一段时间内实现；三、朗诺政府的人员继续留用，基辛格亲赴北京与西哈努克展开谈判。可是6月间美国会通过法案，规定美国在8月15日起停炸，并禁止美军在中南半岛再有任何军事行动，基辛格的和平计划成泡影，基辛格原计划8月6日访问北京的，但周恩来要求暂缓到8月16日(国会法案生效的第二天)，同时告诉基辛格中方不愿再担任转达美国和平方案给西哈努克的信使了。

基辛格与周恩来对话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周恩来把柬埔寨70年代的情形与40年代末期的国共内战相比，有趣的是苏联对朗诺的态度也一如当初对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即这两个政府垮台前夕，苏联仍派大使驻在其首都。因此，莫斯科在朗诺政府所在地金边派有大使，1949年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后，苏联大使亦迁往广州，比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够意思多了。

基辛格一直到1974年底，边试着透过法国与西哈努克直接商谈，挽救柬埔寨覆亡的命运，可是中国已不感兴趣，甚至拒绝给法国使者前往北京的签证，此际周恩来的生命，无论是生理的或政治的，已因癌症和“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来日无多。

白宫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会人士：因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芸、两名记录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李查·肯尼、记录人艾琳·G·德鲁丝女士

日期及时间：1973年2月16日，下午2时15分至6时整

地层：中国，北京三号别墅

周恩来：是的，我们也不十分明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苏联大使目前正在进行一些活动。另外，苏联驻金边大使也已经返回金边。

基辛格：仍然是大使身分吗？

周恩来：是的，是苏联大使。

基辛格：他们在那里应该只有一名代办。

周恩来：他们在那里是有一名代办，根据消息，他们即将派遣一位大使去那里。

基辛格：这我倒不知道。

周恩来：这是最新的消息。至于柬埔寨方面，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和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身分，展开会谈？

基辛格：我对他的认识不如总理这么深。据我了解，和他谈话会让人神经崩溃。（周恩来大笑。）

周恩来：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有没有同你谈到或者讨论什么？

基辛格：有的，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已经准备与西哈努克展开讨论。

周恩来：不幸的是，西哈努克亲王不在北京，他目前在其他地方。你们的人说等你们总统连任以后，曼斯菲尔德参议会再到中国来。

基辛格：是的，不过，他不能代表我们讨论此事，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混淆。他对这项议题太过情绪，而这不是一个情绪的问题。我将会……总理先生讲完他的看法了吗？

周恩来：我刚刚提起了这个问题，也了解了你们的看法。

基辛格：有人告诉了我（指着中方手中拿着的一份文件），就是这份文件吗？我还没有详细看过，只看过内容摘要。事实上，越南总理范文同听我们说，只要我们通过拨款给他，他们就可以在特定范围内自由使用那款项的时候，他非常讶异。明显的，其他国家却没有给他这样的待遇。（周恩来笑）

但是对我们而言，能够这样做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中南半岛的国家都能独立自主。

我们对这个地区没有任何企图，美国不必在中南半岛建立基地。不过，为了让我们达成这个期望，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合作才可以。如果老挝境内不能停火和撤军，外国武力必须无条件地自老挝和柬埔寨撤出，美国方面已经作好撤军的准备，我们也和泰国谈妥，他们也打算撤兵了。所以，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必须履行约定。

目前，老挝已经非常接近停火状态，而我不了解什么事情延误了停火协议。希望他们能在今天达成协议。

周恩来：我们每天都能由官方管道取得最新资讯，以了解协议是否已经签订。

基辛格：好吧，我会在回去以后了解整件事。关于柬埔寨部分，很明显地，情况很复杂，而美国对于当地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特别的偏爱。

周恩来：从一开始你就不肯承认这件事，我指的是军事政变那件事。这个政变中央情报局说不是他们策动的。在你查核过你们的工作记录之后，你能不能查出些证据，证明不是他们做的？

基辛格：确实不是他们做的。

周恩来：就像老挝的情况一样？

基辛格：那是不同的情况。

周恩来：那究竟是谁搞的？

基辛格：我曾经告诉过总理，我一听说发生军事政变，就猜想是西哈努克搞的，而且他会在 3—4 天内回来。我相信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要让河内政权知道，他们的军队让当地的人民很不高兴。我真的认为情形是这样的。

周恩来：没错，你的确是这样同我说的。

基辛格：我真的这样相信。

周恩来：但是我对中央情报局非常怀疑，所以请你仔细调查他们一下。

基辛格：我已经查过了。我何必跟你撒谎？今天的情况和当时没有差别，中央情报局的确没有介入。

周恩来：那么，是法国人搞的？

基辛格：有可能是法国搞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搞的，甚至可能是西贡自己造成的。但是，至少不是美国搞的，我们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的政策是和西哈努克关系正常化，你应该还记得，当时我和总理有一些书信往来。我们都反对越南在柬埔寨驻军，现在依然反对。我们认为越南应该把军队撤回越南，我们不认为他们有权力在外国领土上驻扎军队。

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在柬埔寨举行政治协商，邀请所有的政治势力出席。这并不表示目前的政府一定要主导协商。但是，我们怎么能在只承认一个政府的前提下，直接和西哈努克谈判？这是办不到的；但是，只要能够停火，而且越南愿意撤军，我们就可以协调出一个让西哈努克成为重要角色的政治局势。我们不见得希望河内政权主导老挝和柬埔寨，但是我们也不支持在这些国家，尤其是在柬埔寨，持续存在彼此对立的政治力量。

但是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最主要的将是越南的问题，他们已经违反和约的第 20 条 B 款。其次，我们几乎不可能要求国会提供经济援助给有军队进占外国领土的国家。在他们军队进占越南的情况下，向我们要求经济援助，甚为困难，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视为特殊情况处理。我们相信，让西哈努克亲王维持尊严的解决问题之道是可以达成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拒绝了其他国家所提出的与这个原则不同的提议。但是军事活动一定要终止，否则我们的空军将继续在这里积极活动，而双方将永无宁日。我不能和西哈努克亲王会面的原因，不在于亲王，而是在于目前的情况。

周恩来：法国和双方都维持着关系，苏联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事情会这么复杂。

基辛格：法国想捡现成的，不想冒险也不用投资。（笑）

周恩来：三年前，柬埔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法国把西哈努克亲王送到苏联。朗诺才能进一步宣布推翻柬埔寨王朝，并废止了王室制度。结果，柯西金又把西哈努克送到北京。因此，从公义立场来看，我们是应该提供他们协助。而且，朗诺当年还靠我们来维系原始关系的，他还同意我们使用西哈努克港运送武器到越南，就和西哈努克时期同意我们一样。在这之前，西哈努克也曾指示朗诺主导武器输入越南的事务，而他也从中获利。所以，朗诺对这件事是再熟悉不过了。而现在，在从事颠覆活动之后，他居然想直接从中抽税，这太不合理也太没天理，所以我们拒绝了他。在那个月——不只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继续催着要这样做，我们的大使可以证明这点。刚开始时，他甚至拒绝让我们的大使离开柬埔寨。

基辛格：我一直认为如果西哈努克回到金边，而没有去莫斯科的话，他可能还是国王或是总理。

周恩来：他也可能被逮捕。

基辛格：对，那也有可能。

周恩来：因为朗诺可以为所欲为。

基辛格：这点我们无法得知，但是无论如何……

周恩来：你和朗诺很熟吗？

基辛格：曾经是。我不认为他是个很有干劲的人。

周恩来：他已经半身不遂了。

基辛格：事实上，他还是很急着和你们建交。

周恩来：不可能，我们不会和这种人建立关系。你们也不该和这种颠覆自己的国王的人打交道。你们不支持印度瓦解巴基斯坦的决定是合乎正义的，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立场一致，因为你们支持正义。不过，我们认为你们承认朗诺是不公道的。

基辛格：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暂行方案，而且我想朗诺那边的人会愿意和西哈努克在这里的首席部长谈判。(向洛德询问：“那个人中什么名字？”)宾努。会谈可能会组成一个临时政府，从而决定最后由谁当国家元首，我们曾经考虑过这个可能性。

基辛格：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没有朗诺的分。

周恩来：不仅西哈努克的总理宾努拒绝参与这样的谈判，在柬埔寨内地还有红色高棉反抗势力的问题。

基辛格：是不能接受的议题？

周恩来：接受朗诺……

基辛格：不见得要和朗诺本人谈判，可以和他的政府里的人去谈。

周恩来：你有没有同苏联与法国就这件事情接触过，也许他们会接受你的安排？

基辛格：我们和法国完全没有谈过这个问题。至于苏联部分，他们的大使和我曾经就这件事略微谈过。我想他们比较偏向支持朗诺政府。他们肯定不支持西哈努克。

周恩来：那是因为他根本不喜欢西哈努克。

基辛格：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表示。我曾经在副外长(指乔冠华)访问纽约的时候告诉他：“我想和总理谈谈。”我曾和黎德寿谈过此事，他说他支持和谈。据他表示，河内方面不会做最后的决定，但是，当然，你和从前直接接触，应该知道多一些。

周恩来：他告诉我，你说你会来找我谈。

基辛格：对的。他先告诉我说，这件事最好先和你谈，而后我告诉他我很乐意。黎德寿总是在时间先后次序上有点弄不清楚。

周恩来：这个问题就和书记长的问题很类似了。(笑)当然，既然西哈努克人在中国，我们只好用我们的话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不过，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自己的立场。

基辛格：如果他能够不在报纸和其他访谈中重复这些意见，我们就感激不尽了。他的自制力还没达到中国的标准。

周恩来：那很不可能，我经常把我同他说的话告诉别人，有时候甚至会跟别人讲一些我汲同他说过的话(笑)。因此，总理告诉他的话不会很明确。我想，在了解你的意见，又经过我们的整理以后，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他可能会把我们告诉他的话公诸于世，而中国的报纸都会加以报导。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告诉中国的报纸，那就不太好了！我们《人民日报》给西哈努克的自由，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给予国家元首级人物的自由大得多。当年戴高乐将军在英国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如果我们告诉他任何事，他一定会记下然后发表出去。

我们支持他在1970年3月23日发布的五点宣言。当时你还未与闻此事。我们也支持由柬埔寨元首、总理和副总理在1月26日发布的宣言，这份宣言稍后也由三位柬埔寨内陆的部长宣布支持。我们的立场仍然没变。你知道所谓的五点宣言吗？

基辛格：不知道。

周恩来：那时候，你还是没有介入这件事。

基辛格：这事儿极为不寻常。我的同僚还从来没有听我说自己对某件事一无所知过。

不过，只要我拿到副本以后，我就会知道了。你有英文副本或是法文副本吗？

周恩来：我们两种都有。

基辛格：我两种语言都能通。我还没有研究过这份报告，不过，老实说，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官方立场，而是我们该如何预测这件事情的发展。而由我方来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与你们合作，只要我们能和他一起，找出一个能让他维护尊严的方法。

周恩来：你已经说明你的意思了，我们也了解了。但是就现在阶段而言，这也许是行不通的。我们会再加以考虑，下次我会同你说我们的想法。

基辛格：很好。

(次日再度短暂提及柬埔寨问题。基辛格向周恩来保证，只要中国愿意劝说西哈努克，美国原则上已经准备好“与你讨论谁是双方能够接受的代表，以及组成临时政府的原则。”谈话的重点，在于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能够“顾全双方的面子。”此处的双方，是指朗诺政府和反对势力。周恩来与基辛格在次日下午，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谈话。)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士：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次长章文晋、外交部长助理，美大司代司长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芸、两名记录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肯尼、美国国务院中国科长杰奎琳、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洛德、国家安全会议幕后洛德曼、记录员德鲁斯女士。

日期及时间：1973年2月18日，下午2时43分至7时15分。

地点：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我还有两件事想与你讨论。第一件事就是柬埔寨问题，目前看来在你们这次来访期间，我们很难就此事取得进展。我们了解你们的主张，你们对我们的立场也更了解了一些。我们提供你们英文和法文版本文件，也提供了1970年3月23日发展的五点声明，和1973年1月26日发表的新声明。不过，我们还应该让你们看看1月23日，由柬埔寨王国内陆国家联盟三位副部长之一所提出的意见。我们现在和越南一致，尊重柬埔寨国家联合阵线，以及柬埔寨王国民族联合政府的立场。我们目前倾向于请你们停止介入该地区。当然，你们的回复一定是其他团体也应该停止他们的干预。

基辛格：不错。

周恩来：如果这只是一场内战，事情就比较办好。当然，现在就要把局势限制在内战里，很不容易。目前的情况，就像中国人以前一样。我们不能期待柬埔寨完全翻版中国以前的模式。目前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谈话方式，让柬埔寨国家联合阵线的各方人马了解你们的用意。柬埔寨国家联合阵线并不是由单一政党所组成的，其中也包括了左、中、右各强人士。

当然，西哈努克希望能居于中心地位，就像老挝国王和(他的)佛玛总

理一样。目前，他们的阵营里有两个主要领导人，一位是国王西哈努克，另一位则是总理宾努。据情势看来，左派势力目前在柬埔寨内陆地区比较强大。我们相信，在朗诺集团方面，也同样存在内部的歧异。

法国和苏联在该地区也相当活跃，苏联也试图在当地组织自己的赤柬政权，但是加入的人并不多，不过，在未来他们可能还是会出现。因此，如果你们能够在这方面提供给我们一些情报，我们也会回馈一些情报。但是这仅止于情报，我们还没有办法就目前的情况，提出看法或是建议。

基辛格：我了解。

周恩来：我们也会审慎行事，因为我们希望柬埔寨的最终目标能够实现，那就是和平、独立、统一、主权、以及领土完整。

基辛格：我们完全同意这些目标。

周恩来：不过，我们还是要等着看看，这些目标要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而你们和西哈努克都应该知道，我们不希望让西哈努克变成我们的跟班或是随从。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变成了霸权国家了。他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许多意见，都不是我们授意的，但是我们给予他充分的自由。他已经写了歌曲，描述他对中国的乡愁情绪，在北京，他写了一首很好的诗，把中国称为他的第二祖国。虽然他写了这样的诗，我们却不抱有幻想。我还劝过他不要发表第二首歌，也试着说服他使用“故乡”，而不是“祖国”这种太过分的字眼，但是他坚持要用“祖国”。我们必须有所准备，预备好他哪天翻脸否认这些事情。但是，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诗与歌，和我们没有关系。当然，他现在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就像曼斯菲尔德先生一样。”但是这些都不算数，那只是私人关系而已。他仍然是信佛教的柬埔寨的元首。因此，我们都还得等着这件事情的发展。

如果我们希望见到东南亚地区沿着和平及中立的路线发展，而不要演变成苏维埃亚洲安全体系的势力范围的话，柬埔寨就可以当作一个范例。

基辛格：我们完全同意这个目标，而且我们也面临同样的困难，难以决定该朝哪个方向来加强我们的影响力。

周恩来：我们还要研究这个问题。

基辛格：我们已经准备好相互交换资讯，并严守秘密，我们也相信……

周恩来：总的来说，我相信你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的问题。当我指出朗诺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他所掌握的兵力无济于事。

基辛格：我了解。但是在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我们必须想想什么是另外一种选择。

我也同意，如果情势真的发展成柬埔寨内战，而不是涉外战争的话，就是朝向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周恩来：我们了解事情发展的倾向，我们也知道我们各自的方向。目前，柬埔寨不可能被完全赤化。企图赤化柬埔寨，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柬埔寨问题应该由联合阵线来解决，本着我刚才所提出的原则，那就是独立、和平、中立、统一、以及领土完整。

基辛格：我们同意这些原则，而我们现在要找出一个架构，能够兼顾所有实力派的方式，达成这些原则。

周恩来：所以，这次我们达成共识了？

（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讨论，在往后几个月间变得更为困难，但是基辛格对于短期前景仍然持乐观态度，因为他对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谈，抱持乐

观的评估。不过，在基辛格对尼克松的报告中也指出，他与周恩来的会谈焦点，并不是在东南亚事务上，而是苏联和美苏关系上。)

七、美国不会跟苏联走

中国愿意和昔日的“美帝”抛弃前嫌打交道，其目的之一就是“联美制苏”。

基辛格对周恩来说，美国不会跟苏联走，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莫说不容苏联摧毁中国，连对中国的大规模攻击，都不会袖手旁观的，所以双方的关系，已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至少美国单方面是如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美关系正常化已步入正轨，到达终点只是时间而已。

白宫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目视

会谈备忘录

参加会谈人士：中国总理周恩来、军事委员令主席叶剑英、副外长乔冠华、两名译员唐闻生和沈若芸、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德

日期及时间：1973年11月10日，星期六，晚间9点25分至10点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当大家走向会议室时，叶剑英元帅向基辛格说，当上了国务卿，现在基辛格的工作负担要更重了，基辛格回答说，比起国家安全顾问，这项工作更为复杂，但政策的方向是一样的，也有重大的人事改变。)

(基辛格向周恩来进行简报，其内容与他给黄镇大使的大同小异，即是美苏会谈期间，有关中国及中国核武能力的提议。)

基辛格：……从那个时候开始，苏联曾经三番两次试图在讨论限制战略核武时和我们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的用意就在于显示自己有权与美国平起平坐，此外，他们有足够的武器摧毁中国。而且由于中国情势，这些武器必须逐年增加。

总理先生，我告诉你此事，并非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因为我相信，让苏联摧毁中国或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攻击，将对整个国际情势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译员表示无法完全了解这点。)我讲这件事不是因为抽象的利他主义，而是因为我相信避免这种攻击符合我们的利益。总理先生，即使这种攻击似是有成功的可能，它对日本、欧洲、南亚及中东造成的影响，你和我一样清楚。

在进行这些谈话之前，我相信苏联对中国存有一种普遍性敌意，但我想他们还没有一套具体计划。你可能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不排除某些具体构想的可能。

现在，基于这些谈话的结果，我要求我们政府内部进行若干研究，只有4、5个人知道这件事，有关这种威胁可能会是什么，而据我们所知应如何避免，以及我们用不明显的方式提供何种协助——因为我想我们双方都不想有正式的关系。这些属于技术性质。

现在我手边没有这些研究报告，但我放在宾馆里。关于如何提高贵国

部队的防御及如何提前预警，我们都有一些构想，而我重申，此事必须保密并且暗中进行。

如果总理有兴趣，我可以要求乔纳森·T·豪威司令（编注：即基辛格的军事助理），或者我可以在小组讨论时详细说明——对总理或者是你指派的人，不涉及互惠或任何正式关系，而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及若干常规情报而做的建议。（译员询问何谓常规）“常规情报”表示，我们传达给你们的常规消息，而不是相反情形。

此外，我想你们可能也应该知道勃列日涅夫向我们表明的心态，就我们而言，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虽然实际上如何解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周恩来：在你最近短暂访问期间，他可能没有再提到这件事。

基辛格：不，他又提起来。他再度提出交换军事情报的问题。

周恩来：他们的卫星每天都能监视中国。

基辛格：我知道。

周恩来：他们还想要交换军事情报？

基辛格：我们相信他们的摄影技术不如我们。但我想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拿这件事做为合作的象征，而不是真的想利用这些情报。他们想要说服我们接受摧毁或限制中国核武能力，而非情报本身。不过，交换情报不算大问题，我们显然不会这么做，而他们也许拥有他们所需要的。

周恩来：尽管中东情势十分紧张，他们仍然讨论这种问题？

基辛格：当我在那里时，正是讨论中东停火期间？

周恩来：那是在我们警觉之前，你们原本要停火的。

基辛格：是的。

周恩来：他们邀请你了？

基辛格：当时我们并无军事压力的问题。军事施压是在4天之后，之后就再也没提起。

周恩来：只是在访问期间提起。

基辛格：只在我访问期间，之后没有。

周恩来：我想他们也会跟日本建议这种事。

基辛格：是有可能的；即使他们没有，不管是什么事，如果他们开始走这条路，我还不能判断日本会怎么做。我们没听说他们跟日本提这样的事。

周恩来：他们总是希望拉近日本疏远我们，他们知道不能完全切断你们跟日本的关系，但至少希望日本亲近他们、疏远你们。

基辛格：是的。

周恩来：我也对日本说，如果他们要开发西伯利亚，跟你们一起来，总比他们自己干要好。我想田中（角荣）首相跟你见面时，也会跟你提。

基辛格：我们的看法也是这样。

周恩来：我告诉过他们如果要搞，最好是跟着美国一起搞。我们说过，不怕他们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只怕他们会受骗，你觉得目前苏联三、四个领导人之间有矛盾吗？

基辛格：不觉得，因为我们总是跟勃列日涅夫打交道。

周恩来：是的，他一个人独揽大权。

基辛格：起初我们都是跟柯西金或包戈尼及勃列日涅夫打交道，葛罗米柯只是个办事的，不算领导人物。

周恩来：苏斯洛夫不参加谈判。

基辛格：只有一次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访问的时候。这方面我们没有特别的情报。

我们的人认为他和其他人比起来，意识形态较重，而较少官僚气，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周恩来：他了解历史理论，可他遵循的是其他的思想理论。他解释别人的理论。苏联共党史经过三次改写，三次改写都是他指导的。

基辛格：这点我倒不知道。我知道改了三次，但不知道是出于他的手笔。

周恩来：最后定稿的人是他，他是那种踵继他人的作者。

基辛格：苏联里面没有优秀的思想领袖。

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不可能有人的，因为他们是高压统治。谢谢你提供的情报和通知。黄镇大使已经提过这些报告，我们已做了记录。目前，虽然他们每天都记着搞政策和其他事情，每天还是在报纸上照骂我们不误。我们党里有人每天负责看报和搜集资料，但我们没时间整个看完。

(基辛格与周恩来同意接下来开始举行 5、6 个人的小组会谈。基辛格提醒周恩来说，如果叶剑英元帅要看特别的情报报告，洛德和郝伊都能提供。)

八、我们打的太极拳比较有活力

1973 年 11 月基辛格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再度召见博士，并和他进行长达几近三小时的对话，这是基辛格和毛泽东五次会谈中最长的一次。在这次会谈中，有两点关于台湾的部分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必须采用日本模式，也就是说，美国得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从那以后的美台关系，只能仿照台日断交后的模式。

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毛泽东宣称台湾问题很复杂不易解决，中国可以等，甚至等上 100 年，而在 1971 年 1 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周恩来则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希望再等上 10 年，因为他活不了 10 年，有生之年将看不到台湾重回中国。

白宫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加会谈人士：毛泽东、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芸、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大使、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穗

时间：197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5 时 40 分至 8 时 25 分

地点：北京，毛泽东的寓所

(毛主席依序欢迎国务卿、布鲁斯大使及洛德先生并相互寒暄闹谈，摄影师在一旁拍照。主席说睽违基辛格已久，他现在的地位更高了。国务卿回答，主席气色很好，主席说自己感觉也不错。主席对布鲁斯大使说他跟布氏一样年岁渐增，但布氏看来年轻多了。

布鲁斯大使回答他没年轻多少。毛主席对洛德先生表示他非常年轻。)

毛泽东：各位讨论了些什么？

周恩来：扩张主义。

基辛格：没错。

毛泽东：是谁在扩张，他吗？(指着基辛格)

周恩来：他先开始，其他人也跟进。

基辛格：关于均势，贵国外长不时批评我们，但我认为他了解真正的源头。

毛泽东：但那种扩散主义是微不足道，你们不该怕他们。

基辛格：我们并不怕他们，主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采取像两周前那样强烈的措施。

毛泽东：那些措施还不错。那时我们还无法说服埃及副总统夏菲。他来访的时候说对美国没有信心。他说你们偏袒以色列。我说那也不尽然。我说那些犹太人后裔也不是全都一样；比如说，我们就只跟恩格斯合作，而不与其他犹太资本主义者往来。

基辛格：中东的问题是现在就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泽东：他们不可能掌控中东。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可是能力有限。好比说古巴，你吓吓他们，他们就跑了。

基辛格：后来我们又吓了他们一次，可是我们没有声张。

基辛格：最近。他们出动好几艘潜艇，我们也出动好几艘军舰，后来他们就退了(指 1972 年 5 月苏联游艇接近古巴海军基地西恩费谷事件)。我很怀疑这个国家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刚开始卡斯楚派代表团来接触，领衔的是洛德利圭兹。他率领 6 名拉丁美洲同胞一起到中国，试图代表苏联与我们媾和。第二次他们试图通过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谋和，他们想要叫我们不要再在意识形态上搞斗争。

基辛格：我记得他当时在。

毛泽东、周恩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周恩来：他第一次到中国。(英语)

毛泽东：第二次柯希金亲自来，那是 1960 年。我向他宣布我们准备跟他斗一万年。

(笑)

翻译：主席说要斗争一万年。

毛泽东：我也直接跟他说，我们双方都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被你们(苏联)贴标签称作教条主义者，这是反马克思的。因此我说，那我们也回敬你们一个名称，叫“修正主义者”。(笑)所以我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次我给柯西金打了折。我说，我本来讲这场斗争要一万年，看在他亲自来拜访我的份上，我就减个 1000 年。(笑)你看我多慷慨。我一让步就是 1000 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商量)

还有一次，也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叫做波德欧洛维斯基的先生代表苏联来谈。这次我又折了 1000 年。(笑)你看，我的时限越来越短了。

第 5 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又来了——那是两年前——他又提起这个问题，我说：“这次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再让步了。”(笑)

基辛格：我们一定要采用中国式战术。

毛泽东：目前你我之间有些歧见。我现在讲话不太方便，因为我掉了两颗牙。你们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向来有仇必报。

而且我们逮到一点，就是柯西金总理和我们达成的协议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那是 1969 年 9 月 11 日在北京机场的协议。

基辛格：不论在车内或其他地方，我都和周总理解释过，我们的战术较为复杂，或许没那么大胆，但我们的战略一样。我们毫不怀疑谁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威胁。

毛泽东：你们的作法是中国式的太极拳。(笑)我们打的太极拳比较有活力。

周恩来：直接出击。

基辛格：的确，但是当真正的挑战出现时，我们的反应跟你们一样。

毛泽东：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您最近到阿拉伯世界之行非常成功。

基辛格：主席正在学英文。

毛泽东：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那桩屁事那么在意？(当翻译解释她不能照实翻译主席的“屁事”一语，因为那意即“放屁”时，中方传出更多笑声。周恩来问洛德先生是否知道中国字“屁”的意思，洛德先生回答“不知道”，周总理说 he 可以去问他太太。中方解释那是一个形容这种情况的字眼。)那不过是小事一桩，却引起这么大的乱子。再怎么讲。我们都不希望事情变得这样子。

基辛格：不过，主席先生，外交政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外交政策会锁定目前的方向，或者在危机情况下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都不会改变，我们过去的作为可当作证明。

毛泽东：对。即使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我想我跟你和总统而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基辛格：没有。对我而言根本没有问题，因为我跟这没有一点关系。总统也有办法妥善处理的。

毛泽东：我说的国内事务是指你们的通货膨胀问题，物价上涨，失业人口增加的问题，因为看起来失业人口已经减少，美元相对稳定，所以看起来问题不大。为什么水门案还会闹成这个样子？

基辛格：原因很复杂，包括有很多老派的政治人物不喜欢总统，因为他的政策不是那么传统。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变得虚无，想要摧毁一切。

毛泽东：例如詹姆斯·雷斯顿、约瑟夫·艾萨浦，现在都站出来反对尼克松总统。

这个我就搞不懂了。

基辛格：我了解雷斯顿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只是跟着人家走，反映流行的观点而已。

至于艾萨浦，我想他只是暂时有些失常，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立场。

毛泽东：你想他们会不会写写文章，比如说，试探大众的看法？

基辛格：他们都以为是自己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不时会轮流扮演一下总统。(笑)如果我们会在乎他们在搞什么，主席先生，那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做第一次访问(笑)。

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是在他们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

毛泽东：对。大家都说美国人守不住秘密。

基辛格：真的是这样。

毛泽东：我认为美国人可以好好的保密。

基辛格：基本上是这样没错，主席先生，不过你可以放心，只要我们

把消息留在白宫里不放出去，我们的讨论就不会流出去。

毛泽东：就拿古巴事件来说吧，还有你到中国访问的事。另外就是最近你们跟苏联的往来。在这事的保密工作都做得满好的。

基辛格：确实如此。我的办公室要保密的事项，都能够守得住。不过我们跟苏联之间的不会保密。跟苏联之间的事，我们一直都是有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我们跟苏联往来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保证未来也是这样。

苏联喜欢制造一种印象，让外界以为美苏有共同统治世界的伟大计划，不过这只能拿来骗骗其他国家而已。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笨。

毛泽东：关于苏联，你们的说法老是跟我们一样。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可能想要攻击中国。

基辛格：关于这点，主席先生，我以前老觉得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上的可能，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你们总理和大使说过。我们认为他们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武力。

毛泽东：但是我们的核武力只不过是苍蝇那么点儿大(笑)。

基辛格：不过他们担心的是 10 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要我就说他们该担心的是 30 年后或 50 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期间内蹿起来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之间没有任何安排也一样。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

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对外交部长姬鹏飞说)你相信能吗？

基辛格：我吗？他问的是外交部长。

毛泽东：我是问他(外交部长)。(周总理说了些话没有翻译到)。

他们(台湾)都是一伙儿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 100 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好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小岛罢了。

周恩来：他们现在有 1600 万人。

毛泽东：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 100 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

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 1976 年之前，或者在 1976 年期间完成这

个程序。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当作贵我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处用处非常大。

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在翻译之前说)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不可行的问题。

毛泽东：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碰澳门，顶多也只碰一点点。因为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地掌控着澳门(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赞同他们(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自中国割去的 150 万平方公里土地。

基辛格：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来做，不过这不是非做不可。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基辛格：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说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泽东：我们联络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辛格：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以前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泽东：那套说法可以不用再提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带。我们黄镇大使提过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不过他不了解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性。

基辛格：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也重述了联合国的官式立场(大笑)。

而我了解你们必须公开地采取某些立场。这些并不违反我们的共同立场。不过，事实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不是因为苏联施压才使然。

所以，每当苏俄施压，我们必须抗拒，除了争执本身有其优点之外，我们可说是为了抗拒而抗拒。然后当我们击败他们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朝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我们只是反对借着苏联施压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毛泽东：没错。

基辛格：而且我们现在的策略正是如此。

毛泽东：下次你再到中国来，除了政治，还可以同我谈一点哲学。

基李格：我很乐意，主席先生。哲学研究是我的初恋。

毛泽东：或许当了国务卿后就比较难研究哲学了。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辛格：他 1959 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泽东：我们在 1958 年决裂。他们 1958 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军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在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那就是他说的。那时候，他口气还很大，因为他见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沾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同我夸口，说他认识美国总统，讲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问布鲁斯大使；你知道这回事吗？)

布什：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泽东：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崴的。

周恩来：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泽东：现在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到过像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西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中方查看时间)

周恩来：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泽东：我本来还想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用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注：他指的是布鲁斯大使的酒会。)我想讨论的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会改采孤立主义。

基辛格：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不过，现实状况会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战术。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偏离现在的轨道。(最后一句话没有翻译)。

毛泽东：那你和我似乎是同一类的。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基辛格：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是我想形势所需，使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政策。

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趁着大家都还在位，而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加强关系，不要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泽东：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主张从欧洲撤军。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这是帮苏联的大忙了。

基辛格：我们将不会在我们尼克松总统任内执行。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极为迅速的解决。

毛泽东：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

毛泽东：我不喜欢你同我要外交辞令。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就会松手。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泽东：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开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说我是个好战分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觉得不要。如果你们真

的打，最好只用传统武器，核武器只是备用，尽量不要碰。

基辛格：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泽东：那就好。我听说你们以前这个方法是为了争取时间。

毛泽东：我们是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另一个立场，如果苏联攻击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我们必须防患未然。

毛泽东：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他笑着指向王小姐和唐小姐)。你不要因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较柔弱，就想欺负她们。

基辛格：主席先生，就我的经验，她们并不十分柔弱。她们也不按照主席的劝告行事。(笑)

毛泽东：她(唐小姐)是美国人，而她(王小姐)是俄国间谍。(笑)

(主席先生接着在无人搀扶下起身，陪着美国代表走到外厅，向国务卿、布鲁斯大使和洛德先生道别，要摄影师照相。当他和国务卿握手时，他说：“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国务卿回说一定会。布鲁斯大使和洛德先生表示很荣幸能见到毛主席。主席向洛德先生说曾见过他，洛德先生答是。)

九、建一条北京直通热线

紧接着基辛格和周恩来 11 月 10 日的会谈后，两人于 13 日再度会谈，在这次密谈中，基辛格更进一步的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应设立热线，如有军事突变，早期得到预警。美国有很好的间谍卫星，可以事前侦知军事行动，美国愿把这宝贵的情报提供给中国，虽说美国基于本身的利益，肯供应这种极机密与珍贵的情报，但以尼克松访问中国尚不足两年的光景，双方的关系已进展到这种境界，不可谓不神速。

令人稍觉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未当场接受基辛格建立热线的提议，而是说得先研究一下，但这一研究竟没有下文，无疲而终了。

白宫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加会谈人士：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副部长蔡洪景、幕僚(翻译)唐闻生、杨亦云(音译)女士；国务卿基辛格、布鲁斯大使、乔纳森·T·豪威司令、威尔玛·G·霍女士(记录)

日期与时间：197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夜间 10 时至 12 时 30 分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基辛格：我们可能在两方面提供协助。一，如果这场(可能的中苏)战争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能在装备上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今天我想讨论的是，如何缩短这段危险期。

缩短这段危险时间的一个方法，就是特别点出，任何势力防卫本身时必须特别留心的特定区域。任何国家都有的一个问题是早期预警。在对付轰炸方面，那意味空防不能遭人渗透。在对付导弹方面，那意味对于导弹空袭获取确实的警报。目前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的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资讯快速

传送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及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你们。

周恩来：透过卫星？

基辛格：呃，讯息先传至华盛顿，然后到北京。我们可从两方面避开注意。一方面，我们可以只宣布建立一条热线，就像我们和莫斯科和日本等一样。但跟你们的这一条另外有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用途是，这可以使你们在得知受到攻击时移防轰炸机，如果可能的话移动导弹。你们那时也会需要从北京与各个基地畅通的通讯系统，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方面暗中协助你们。

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上签署协议，就像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并且也建立一条热线。

我只是在考虑如何建立一条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的热线。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是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 * *

周恩来：至于您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必须先研究一下。明早在您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

1973年11月14日，星期四，上午7时35分至8时25分：

周恩来：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警告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我同意。

周恩来：如此一来，我们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公报(切实)(Concrete)磋商是正确的描述。

基辛格：总理先生，但是要“秘密”的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是的。我了解。

基辛格：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的人是我本人与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

(周恩来接着问起去年美苏签订的防止意外战争协议与热线协议)

基辛格：协议上的主要目的在于，万一有误射(导弹)的情形发生或雷达上有不明物体出现，双方可以立即，而且有义务联络通知对方，我们也愿意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设立一条热线，你们可以考虑把两者合一，或者把防止意外战争协议与热线分开来。

十、吓一吓那些神经衰弱的人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来美访问，基辛格对邓小平所知甚少而且印象欠佳，一度以“心怀叵测的小猫”私底下称呼邓小平，本来无意请邓小平吃饭，没想到后来不但会谈，还在国务卿设于华尔道夫饭店的套房里以晚宴款待邓小平和乔冠华，这一顿饭足足吃了三个小时，这次会谈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三点：

一、邓小平反苏的情绪强烈超过毛泽东、周恩来，大概这和邓小平多次率中国代表团访苏与苏共领导人针锋相对有关。

二、邓小平不提周恩来，只提毛主席，即使基辛格一再谈起周恩来，邓小平也不接腔，当基辛格意有所指的请教邓小平，“批林批孔”运动是否有针对个人之意(即针对周恩来之意)，和现在仍在世的人，而非古人。邓小平的答复是这种说法有些根据，无异暗示周恩来是被批的对象。

三、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以参加起草《上海公报》的当事人身份提醒基辛格，毛主席已明告基辛格，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能依“日本模式”才能实现，然邓小平补充两点：一是中国希望尽快解决此事，二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急，这两点都是毛泽东说过的，所以中国早在1974年4月基辛格邓小平纽约会谈，即已确定以“日本模式”与美建交的方针，故1978年12月卡特和中国的建交谈判，大体是依照日本模式完成的。

美国国务院

最高机密 / 密件 / 仅供内参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士：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黄华大使、翻译章含之、记录人罗旭、郭加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务次卿西斯科、国家安全会议少将斯考克罗夫特、国务院政策设计部主任洛德、副助理国务卿汉密尔、中国科科长费里曼(记录)

主题：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设宴款待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等人

日期与时间：1974年4月14日，星期日，晚间8时5分至11时

地点：纽约市，华尔道夫饭店，国务卿之套房

基辛格：副总理先生，很高兴能与你见面。(允许记者开始摄影)

邓小平：记者真多。

基辛格：他们要我们握手。(基辛格先后与邓小平、乔冠华握手)。他们要我们三个人一起握。我想，你们的摄影师比我们的要守规矩多了。

邓小平：我们不应该听他们指挥。

基辛格：但我们必须听他们的。不然，他们就会刊登最难看的照片。(新闻记者离开)

(简短讨论过邓小平的参访美国行程后，邓小平问是否可以抽烟，在基辛格表示同意后，基辛格说他不抽烟，邓小平说：“太可惜了。”)

基辛格：没关系，我还有其他不良嗜好。黄大使，你的背还好吗？

黄华：马马虎虎。

基辛格：你去看过我帮你安排的医生了吗？

黄华：还没有去。

基辛格：他怕我的医生会在他的背里面放麦克风。

邓小平：我想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中，你最早认识的是黄大使。

基辛格：是的，我和他在北京机场见面的。他可能已经忘了，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教训，教我们怎么谈判。有一次，我跟苏联人讨论一份公报，他们建议双方各提出自己立场的最高纲领，再试着化解歧见。但是，黄大使建议我一开始就把我们真正的立场坦诚相告，才更容易达成协议。结果正如他所说。

邓小平：你跟苏联打交道已经有多年的经验罗。

基辛格：的确有好几年了。一直是很累人，而且千篇一律。第一天气

氛通常很好，第二天双方就很火爆，到了最后一天，在离开的两个小时之前，当苏联人发现我们无意放弃立场时，他们又变得愿意妥协，气氛又转好了。总是这个样子。

乔冠华：(以英语)这就是辩证法。

基辛格：好了，咱们别谈这个了。副部长，你还欠我一首诗。

乔冠华：没错。

邓小平：我对付苏联的经验也很丰富。

基辛格：在什么时候？

邓小平：我去过苏联7次。

基辛格：你比我多一次。告诉我，苏联人一直都那么难对付吗？他们跟盟友也在会议桌上开骂吗？

邓小平：根据我的经验，我们从来没有达成协议过。

基辛格：我们倒还可以达成协议，只是很花时间。他们对武器管制的想法是，应该先讨论我们所拥有的军事基地。而他们应该有5年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基辛格夫人进入房间，基辛格转向夫人道：)我们正在谈如何与苏联谈判。邓小平副总理到过苏联7次。他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是，苏联人从来不同意任何事情。不过，我们倒与苏联人达成了一些协议。

邓小平：你比我厉害。

基辛格：当然我也能了解，现在我说了这么多，下一次我到北京的时候，副外长也可能对我吼，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邓小平：你应该也跟他吵了不少次架吧。

基辛格：跟他谈判一直很难，还好大家都很理性。而且，我们也能够达成协议。例如，《上海公报》谈判，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讨论措辞的细节。

邓小平：双方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只是在那几次协商中，我喝了太多茅台酒，以致我用中文在谈判。

邓小平：那你和副部长是同好，他也爱喝茅台。

乔冠华：要是你喝多了，那可不能怪我。

基辛格：可是在那几次谈判中，你都没有吃亏啊。(停顿一下)你知道吗，葛罗米柯曾向我抱怨你过去的一次演讲。

邓小平：他很不满意吗？

基辛格：他觉得你们在攻击他。他还要我代表我们(中、美)双方来回答他的问题。

乔冠华：(以英语)高招！可是，基辛格先生，即使你仔细听我明天的演讲，你也不会听到我们批评葛罗米柯什么。

邓小平：我认识葛罗米柯是在1957年。

基辛格：和那时候比较，他变了很多吗？你认为呢？

邓小平：他不是苏联内部的决策者。

基辛格：的确，就我的经验，他只是勃列日涅夫的跟班。谈判的时候，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他从来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过，最近他似乎变得比较有主张，因为他已经进入政治局了。

邓小平：1964年以前，勃列日涅夫也不是决策者。

基辛格：对。那时候他好像也不懂外交政策，而且在他整垮赫鲁晓夫

以后，自己也不敢轻易外出度假。

(双方去用餐，基辛格介绍西斯科与斯考克罗夫特，基辛格说，西斯科是“我在中东的分身”。)

乔冠华：你的意思是说，事成的话，功劳是你的，不成的话，帐要算在他头上。

基辛格：中东那档子事，副部长可得负全责。去年我们就曾经讨论过中东问题，而且我也完全遵守那次讲定了的要点。

乔冠华：上次我们碰面时，我跟你讲的，就是毛主席同埃及副总理讲的一样。你有两只手，两只手都要用，一手对付以色列，一手对付另一边。

基辛格：我们一直遵守当时讨论的政策。

邓小平：这是真的。要用两手。

基辛格：确实是。

基辛格：这是茅台。副总理先生，欢迎到纽约，在这里相会真是非常高兴。

西斯科：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

基辛格：如果你像乔副部长一样的话，你应该每一次都干杯。

洛德：我想有茅台我们就可以解决能源危机了。

邓小平：但是，我们能够解决原料危机吗？

基辛格：我想如果我们茅台喝得够多，就可以解决任何事情。

邓小平：那么，我一回中国，就该采取措施来增加茅台的产量。

基辛格：你知道吗，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回来后，还用实验向女儿说明茅台有多烈。

他拿了一瓶茅台出来，倒进碟子里，然后点火，结果碟子破了，茅台洒了整个桌子，连桌子也烧了起来。所以，你们几乎烧掉了白宫。

基辛格：自从黄镇大使(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回来后，我就一直没见过他。但我打算下星期去看他。

邓小平：我们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改变。

基辛格：我们一直将中美的友好关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有意将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像我跟毛主席与周总理说的一样。

邓小平：毛主席个人也支持这种政策及相关的原则。我相信，你与毛主席两次长谈后，也应该知道这点。我想，上一次你和毛主席谈话了谈了三个小时。

基辛格：在几次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们谈得很深入，不管媒体怎么讲我们的双边关系，我都不在意。就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向乔冠华敬酒)

邓小平：(乔冠华)喝了这杯茅台，你明天的演讲一定很精采。

基辛格：会令人感动，我也要抨击超级强权。我很高兴邓小平副总理证实副部长已经在北京告诉布鲁斯大使，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会改变。

邓小平：我读过你们和毛主席谈话的纪录。非常的清楚，你们从战略观点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唯一的困难是，不知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那里？就这点来看，我们之间还是有歧见，但这些分歧算不了什么，实际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战略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当然。无论苏联的第一个战略重点在哪里，它的下一个重点

已很明显。如果第一个重点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是中国。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国，那么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东，那么下一个在那里也是很清楚。

邓小平：在东方，我们曾经向日本人——我们的日本朋友提过这件事。他们好像不太了解这些。他们似乎认为苏联在东方的目标不包括他们在内。例如，我们谈过去西伯利亚油田勘探的泰曼计划，日本人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本身的立场，才不会冒犯到中国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日本的利益会受到这个计划的影响。

基辛格：日本人还没有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总之，我真的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看到中国来的老朋友。在我们这边说来，我们可以确认我们与毛主席与周总理谈话的每一个细节部分。我们也可以确认我们的政策方向。我们曾经和我们欧洲的盟邦有过一些争论，只是要他们了解事实，也希望他们实际一点。但这些都影响我们的长程战略，我们还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你是我的老朋友，是了解的。法国人一直很短视。我想，你最近曾经和他们谈过。但这不会影响美国的既有立场及苏联与欧洲对抗的现实。这些争执只是家务事。

邓小平：都是这个样子，有小争吵，但不影响团结。

基辛格：说得好。

基辛格：相对乔副部长我总是居于下风。副部长是研究哲学的，他研究过黑格尔，而我只研究到康德而已。但我确定，如果我批评法国而不批评德国，副部长应该不会有意见。否则他不会放过我。

邓小平：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在吵水门案？

基辛格：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令人难以理解。主要都是些为了各种的理由反对总统的人搞出来的。

邓小平：毛主席曾告诉你，我们也很讨厌这种事情。可是，这些事一点儿会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外交政策过去不曾，现在也不会受到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小平：我们才不管这种事情呢。

基辛格：我们现行的外交政策，仍受到广大美国民众的支持。当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现在，美国好像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

邓小平：我们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问题(指水门事件)。

基辛格：这种事，当然也有一些事实根据，白宫确实也做错了一些事。不过，当你改变很多政策的时候，难免会树立很多很多敌人。

(邓小平回故基辛格，邓小平说，从 1971 年—1971 年间互访后，美中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不错的。基辛格向邓小平请教有关香港媒体对中国政局的一些报导，邓小平解释说，批孔运动只是要把人民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

基辛格：我们的报纸说，批孔运动是针对个人的，是针对活的人，而不是古时候的人。

邓小平：他们说的也有点儿道理。当你批判保守的意识形态时，自然也会影响一些在位的人，有些代表保守思想的人就会遭到攻击。

基辛格：我观察中国的外交政策相当久了，我的结论是你们一直是满

一致的。当然，我们不会评论你们的内政与内部局势。

邓小平：报纸上讲的都不可靠。

基辛格：我有同感。(停顿一下)葛罗米柯问过我中国的情况。我告诉他，我看不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变化。(停顿一下)你知道吗，我从未带西斯科到中国，因为我在中国的任务从未失败过，所以我不需要他。但是，我上次带过他的同事阿瑟顿先生去。

(他们接着简短讨论了二十四史，中方送了一套给美方。)

邓小平：你的莫斯科之行如何？

基辛格：我正好要讲到这个。你知道尼克松总统六月份要去莫斯科吗？我与葛罗米柯讨论了总统的行程安排，以及在访问中双方可能达成的协议。这次讨论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第一天气氛很好，最后半天气氛也很好。但中间的一天半就很不好。真的很奇怪，我到苏联六次了，每一次都会被人家吼，可是，他们吼归吼，我从来都不会让步。

我的结论是，勃列日涅夫只是吼给政治局看的，其实没有任何具体目的。

基辛格：不管我们与苏联协议什么，都是双边性质的，中国不会感兴趣的。

乔冠华：(以英语)你们这么做是对的。

(在限武谈判方面，由于美苏之间歧见过大，基辛格预料将无法达成协议，在多目标弹头载具方面的争议，基辛格却没有细谈。基辛格提到：“事实上，苏联打的算盘是，他们给我们设限，自己却不设限；而他给我们设的限又早就是我们在生产时的自我限制。”他同时也将报章杂志上所称之苏联战略优势斥为“瞎扯”。华盛顿不但以几乎6：1之弹头量领先，其导弹也较为准确。)

基辛格：……美国报纸上瞎扯的东西还真不少。有时候，连我读到这些报导也会吓一跳。目前为止，苏联尚未拥有任何多弹头导弹。他们还在测试，但是还没有完成。过一阵子，人较少时，我会给你一些有关的数据，我不能让汉密尔知道。

(基辛格似乎在开汉密尔的玩笑。)

邓小平：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很难跟苏联达成协议。

基辛格：我可能会看错，但我想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我们可能会完成一项表面上的协议。不过，武检相当困难。我们也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坦白说，发射载具的数量并不是那么重要。每一个载具都可以装载很多武器。例如，在我们的潜水舰上，每一枚导弹都有十个弹头，能够很准确的射向不同的目标。

不能再光是评估某个单项的数量而已。所以说，协议很难达成。苏联还没有从潜水艇试射导弹，他们在陆上倒是试射了三种不同型号的导弹。我们估计今年底，他们就会完成测试了。接下来他们才会进入生产阶段，他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

邓小平：就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而言，主要是东部边境的问题。那儿的军事部署没有改变。现在还是这样。

基辛格：我想应该已经有一点变化了，但我还不能确定。我想他们最近增派了三个师的兵力。我会查看。

斯考克罗夫特(国安会少将)：确实如此。

基辛格：三个师不算多。

邓小平：基本上，他们还是没变。

基辛格：这也是我们的看法。

邓小平：苏联部署了大约 100 万的部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但他们分得很散。这样也只能吓一吓那些神经衰弱的人，我相信。以前，你跟毛主席讨论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 100 万连防卫都不够，要想进攻的话，还得再增加 100 万。

基辛格：这要看他们想要做什么。如果他们要占领全中国，毛主席说的没错。这要看他们的目标何在。

邓小平：如果他们只打算占领边境的一些地方，那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只会陷在那里而已。

基辛格：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这种打算，但是，就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有可能要破坏你们的核武能力。我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这么做，我只是说，这不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毛主席说过，我们生产核武的能力只有这么丁点儿。(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微不足道的手势。)但我很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么多。

(在简短讨论双边关系时，邓小平说目下没有什么“大事”；他与基辛格都同意布鲁斯大使返华盛顿述职与黄镇大使回北京皆属“正常”。基辛格并表示，他需要布鲁斯大使就欧洲问题上给他意见。)

乔冠华：我问过布鲁斯大使他跟欧洲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他只不过是认识现在欧洲各国领袖的祖父，没道理就叫他主管欧洲事务。不过，我确定他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基辛格：我跟布鲁斯大使是好朋友。

乔冠华：我问过布鲁斯大使是不是这样子，他也说是。

邓小平：不管怎么样，我们正遵循着《上海公报》的轨道在走。

基辛格：我们也是这样。

邓小平：你想，我们双边关系上，还有什么要讨论的？

基辛格：(对汉密尔说)还有什么事吗？(向邓小平)我们现在在跟南韩谈有关联合国部队撤退的事儿。我想，我们双方应该在休战议题上影响我们共同的朋友。(注：中方翻译译为：“我们应该影响我们共同的朋友。”漏掉了“休战”二字。)我方也准备依照《上海公报》的内容，发表美方撤军的声明。可是，我们也没法儿立刻撤军。我们一完成南韩撤军的细节，就会非正式地先通知你们。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去年支持联合国部队的行动，尤其感谢你们切实执行贵我双方的谅解。我们驻联合国大使——史卡利——比较不能受刺激——黄华大使会谅解的。史卡利已经心脏病发作过好几次了，他也非常尊敬黄大使。

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在思考上次我们在北京发布的公报里的措辞。我们可以透过黄大使来讨论，或是稍后我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再详谈。

邓小平：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能否与黄华大使讨论这个问题，副总理未下断语。)

基辛格：如同我所告诉你，我们持续降低和台湾的来往。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具体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尚未竟全功，但愿意听听你的想法。毕竟这个讲法还是你最早提出来的。

乔冠华：关于这个问题，我了解其本质，我参与了公报起草及用语的斟酌。其含义正如毛主席所告诉你。贵我两国关系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为基础，此外别无他途。因此，我顺便指出，就我们两国之间现有关系而言，只应向前，不应倒退。我很坦白地跟布鲁斯大使讲了这一点，我们谈的还满愉快的。

基辛格：我知道你同他说了什么，我们记得很清楚。

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出两点。首先是我们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是我们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已经向你提过这个看法。

我想今晚我们该讨论的都已经讨论过了，占用你很多时间，你一定也累了。明天，你还要到联大演讲。

基辛格：我一定不会透露什么。我想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全力协助下，我们离成功不远了。请你代我和总统向中国的朋友们，尤其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晚宴约于 11 点结束，基辛格送中国客人到电梯。）

十一、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来解决

1972 年台湾日本断交后，台北与东京新关系的架构即是“日本模式”，代表双方的机构分别是“亚东关系协会”（台湾）和“交流协会”（日本），完全不具官方地位，连台湾在日本工作的官员都得每年离境一次，再返回日本、延长居留签证，当时的蒋经国气愤得不惜下令断航，切断台日之间的黄金航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国一直迫使美国向日本看齐。以“日本模式”维持和台湾断交后的关系。事实上早在 1974 年 4 月邓小平首次访美（出席联合国发展会议），与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的华尔道夫大饭店举行秘密会谈时，即已开始就“日本模式”讨价还价了，而且随行的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对基辛格说：“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为基础，其他的模式没有可能。”乔还提醒基辛格，这是毛主席亲口对基辛格说过的。1978 年底卡特政府宣布与中国建交时，基本上是遵循“日本模式”，接受中国“断交、废约、撤军”的三原则。

《红墙白宫》揭露的另一秘密是早在 1974 年美国即已向中国提出把那时美国、台湾、中国关系相互易位的要求。也就是说，把中国驻华盛顿的联络处升为大使馆，台湾驻美大使馆降为联络处，美国也把在台北的大使馆降为联络处或领事馆，此一美国建交模式是卡特政府上台后，范锡国务卿于 1977 年夏天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会谈时提出，但遭邓小平断然拒绝，而且直斥美国作此提议等于双方关系的“倒退”。只要看看 1974 年 11 月 26 日基辛格和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会谈的记录，也难怪邓小平对范锡的提议有此强烈反应了，因为早在三年多前，基辛格已作过同样的试探，但行不通。邓小平说这种模式是“变相的一中一台”，中国难以接受。隔了三年多后，范锡旧事重提，了无新意，不进当然就是退了。再说基辛格的提议遭邓小平拒绝后，基辛格当场就作了让步，是关于台湾的外交地位，美国大致准备以日本模式来解决。

从尼克松 1972 年初访问北京后，和中国关系正常化拖了六年十个月才完成，除了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后使得正常化的脚步慢下来外，台湾

的安全并非美国考虑的主要因素。美国真正顾忌的是美国国内的亲台保守势力，一切努力在于安抚这股势力，使其不致影响共和党或福特总统继续执政的前途。

台湾对美国究竟有多大重要性，邓小平和基辛格的下面对话说得再透澈不过了：

邓小平：看来你们似乎仍然需要台湾。

基辛格：不，我们不需要台湾，那不是问题。

(1974年11月26日上午基辛格和邓小平先针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进行会谈。)

邓小平：外界有许多看法，也有不少说法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冻结，(建交)速度也放缓了。但我相信，重要的是，双方都能认为彼此关系的进展还算正常。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外界说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例如，(基)博士昨天提到，也在10月份和我们外长会谈时说过，我们放炮放得比较多(即抱怨之意)。

基辛格：没错，也越来越准了。

邓小平：所以，你们还派大使到台湾，他们还在增加驻美领事馆的时候，外界有些揣测也就很自然了。

基辛格：尤其是你绝对不会相信，有些事是出于愚蠢，而不是计划。我一直到木已成舟，才知道增加领事馆的事。

邓小平：至于我们对“关系正常化”的看法，我相信博士和其他的美国朋友都很清楚：那就是，日本模式。这方面，你们曾经要我们这边提出具体模式，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就是日本模式。同时，我们这边也希望你们能再往前多走几步。

基辛格：(副)总理先生，有关于你讲的日本模式，大家不是都说，日本人模仿美国人，现在你却强迫我们模仿日本人。这是个新的作法，我们可以接受基本原则。不过，我们也有一些日本人没有的特殊情形。在我们关系的不同阶段，我们都能找到符合你们的原则，也顾及我们需要的方法。或许，我们也不该要你们在一个对你们说来有着重大原则的问题上提出具体建议。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访，我们起草第一个公报时，当时我还不认得你们外长，中方还是很体贴的接待我。但我和黄华大使在起草之前，黄大使说，让我们先开诚布公地谈谈一定得写进公报的东西，这样才能找到适当的用字。结果真的成功了。

因此，我认为在日本模式的架构下，我们也该坦诚的讨论一下符合你们原则的我方需求，再想办法达成共同的目标。这样，我们就能拟出特定的计划。

邓小平：或许我们可以在小组会谈中谈得更仔细些。

基辛格：我同意。

邓小平：但我要先放炮。

基辛格：对我吗？

邓小平：嗯，实实虚虚，随便你。也就是说，如同我们知道的，这件事情上你欠我们。不过，不必现在就谈。

白宫

华盛顿

最高机密 / 密件

会议备忘录

参与会谈者：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

日期与时间：1974年11月26日，星期二，下午3点45分至5点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主题：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你们今天人数比我们多。

邓小平：我们人数还会继续增加，我认为贵国永远不可能超越我们，
因为我们有八亿人。

(基辛格感谢邓小平安排他的家人参观紫禁城，当基辛格提及他的妻子南茜要去接受针灸示范时，邓小平和他谈起针灸的历史。)

基辛格：谁会想到把一根针刺入身体能治病呢？全球没有其他文明想得出这招。

邓小平：我们回归正题好吗？我们想听听博士的意见，好吗？

基辛格：容我讨论一下关系正常化的主题，我知道菲利普·哈比卜(编注：指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先生已和你谈过双边关系。

我有信心，只要贵国愿意，我国也可以让事情加倍复杂化。这种事我们颇为擅长。

(基辛格回顾了1971—1972年间，美方对中方作过的承诺，并指出美方一直在履行承诺，例如大幅裁减驻台美军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程序。我打算分成以下几部分讨论：台湾的外交地位、美台双方的外交关系以及驻台美军问题。此外，还有我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

我们的问题与日本或其他已与贵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都不同，不同之处可分两方面来说：

首先，美台之间有正式的防卫关系；其次，在美国有一部分相当有力的人们，历史上一直倾向台湾。

在贵国的合作之下，我们已经很谨慎的、一步一步的，摆平了在美亲台势力。但是我们要记住，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不能在美国变成一个极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如果来一个参议员或参议员团体，拿杰克逊参议员对美苏关系的做法，用在中美关系上，不仅不符贵国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讲话很坦白，双方才不会误解。在我和盘托出我们的顾虑后，现在理当轮到你们说说你们的顾虑，然后我们再看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来就是为了铲除障碍，而不是藏身于问题之后。

我们相信，诚如我刚说的，炮弹已发(大致瞄准一个方向)，我们还是
有共同的战线。

诚如周总理昨天所言，这些情况多半是“北极熊”搞出来的。

鉴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不希望危及(和中国发展共同战线)的可能性，我也牢记毛主席去年跟我讲的两件事——关系正常化与国际环境。

既然说到这个，让我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首先是外交地位的问题，我们大致将采用日本模式来解决，但有一点不同，如果我们能在台湾保留联络处，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则对贵我双方都

最为省事。此外，我们会完全依照日本模式。

至于驻台美军，我们会悉数撤出所有美军，希望能和贵国就撤出时间达成共识与时间表。我们打算在 1976 年夏天之前，撤出一半的部队，剩下的一半在 1977 年底之前撤出。

我顺便提一下，我所讲的并不是我们想要达成协议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这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在 1975 年年底之前都不得对外公布，希望这是我们的默契。

最后就剩下我国与台湾的防卫关系，老实说，我们尚未想出理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去跟一个你所承认的国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地区属于那个国家)建立防卫关系实在很荒谬。

其次，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后，在台湾维持战略基地当然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但就像我在纽约和外长所说的，我们需要一套模式，至少在一段期间内，可以确定和平统一。再定期评估这套架构，才能避免我刚刚提过的难题。

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些障碍，我们早就直接把北京当作(合法的)(中国)政府，取消对台承认，终止外交关系，并且撤回驻台部队了。剩下的只有我们与和平统一的关系而已。

我坦白而且实际地说，断交造成的政治与心理影响，就是我们(美台)的防卫关系会随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逐渐降低。但是，舆论需要一段过渡时间适应，这个过程才不会造成国内局势紧张。

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考虑，如果我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接下来就可以着手草拟架构了。

邓小平：都说完了吗？

基辛格：这些是大要，是的。容我再强调一点，对我们而言，防卫承诺主要是以何种政治方式表达的问题(即美国国内政治能接受之意)，而不是要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邓小平：好吧，其实这法是你们自己制定的，不是吗？

基辛格：什么法？

邓小平：你也有参与制定这个法案啊。也就是你们承诺要防卫台湾的法案。那个法案是你们自己搞的。

基辛格：当然，确实如此。

邓小平：那么，既然你能制定法案，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废掉。

基辛格：这样说也没有错。重点不在于法能不能废，而是我已经向你解释过的那些原因，那也不会是权宜之计——承认中国这件事就会改变那种安排的性质，因为和某个国家的一部分订定防卫条约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我注意到博士刚刚提到的考虑。我也了解博士 10 月间，和我们外交部长在纽约讨论的这些想像的情形。

基辛格：是。

邓小平：我相信原则上，外交部长已经对你答复过有关我方主要的事件的立场。本质上你的想像，也就是你的考虑，不符合日本模式。

我们觉得本质上，那还是“一中一台”的变形。

基辛格：怎么说？

邓小平：主要是你只是换位置而已，改变联络处的地位。目前的情形是你们在北京放一个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放我们的联络处，你们在北京放你们的。然后，你们在台湾还是留着一个大使馆。这就显示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还没有出现。换句话说，即使你们改变这个顺序，也就是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也不能改正这个问题。

人家会说，其实这只是另外一种“一中一台”而已。因此，我们恕难接受这种模式。

而刚才你提到的防卫条约问题，也就是你们和台湾的蒋介石的防卫条约。当然，如果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了，并且遵守《上海公报》的话，你们和台湾的条约就会废掉。

这些道理，其实博士你自己刚刚也都说过了。

基辛格：关系正常化以后，防卫条约就不会有国际地位。

邓小平：但是，仍然还有实质上的意义。显然解决这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根据你的模式。我们不可能接受这种正常化。看起来你们好像还是需要台湾嘛。

基辛格：不，我们不需要台湾。这不是问题所在。你一定要了解。你那样说，就误解了这个问题。

我们想要用现在这种方式，逐步和台湾脱离关系。无疑地，我们所依循的进程已经动摇了台湾的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构想将加快这个过程。

邓小平：另外一个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路线(方法)。若要解决台湾问题，假设你们已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就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至于我们要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我想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谈话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

基辛格：如果我的理解无误，毛主席作了两项声明：第一，他相信这个问题终须以武力解决。不过，他也说，中国可以等上一百年，再采取行动，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邓小平：不错，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一百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

基辛格：我当然也了解这一点。当时，我还想讲一百年后我也不是国务卿了。

我必须不时向我的同事提这个说法，多少可以给他们一点希望，我了解这是象征性的。我也了解，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中，任何有关主权的属性都必须消除。

邓小平：毛泽东主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解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应由中国人来解决。

基辛格：我同意。这也正是那段谈话中我所记得的内容。我也用我这个比中国人侵的脑筋。做了一些推论，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人反驳我。(一笑)

我记得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说我聪明，我说，以中国人的标准，你的意思是我的智力中等。他也没有反驳我。(笑)。

十二、中国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1974 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中美关系起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正常化停滞不前，美国方面在尼克松辞职后，失去了一位有力推动者；中国方面，周恩来患病住进医院，不再是推动中美关系的要角，资深望重的首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鲁斯也换成了原驻联合国大使布什，本来福特有意请布什出使英国或巴黎，但布什选择去北京，可是中国当时正处于“文革”，布什在北京可做之事实有限，故有闲情逸致和太太骑着自行车逛北京。邓小平复出，因缘际会布什和邓小平俩人建立了友谊，布什在北京当了一年主任返美出掌中情局时，邓小平替布什饯行，席间曾说过不管布什担任什么职务，中国都会把他当作老朋友。

最高机密 / 不可流传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邓小平、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中国驻公使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副司长唐闻生、记录员廉政宝；美国国务卿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大使、政策设计部主任洛德 记录：国务卿办公室邦妮·安德鲁斯

日期及时间：1974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 45 分至 11 时 22 分

地点：中国北京第 18 号宾馆

主题：总统来访、核战争、限武谈判、南斯拉夫

(基辛格首先表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了解，为什么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抨击超级强权，并且提出安排史莱辛吉访华的可能性。苏联过去不断邀请美国国防部长访苏，但是美国从未首肯。“如果我们开始让我们的国防部长从事外交旅游，他可能会去一些我不希望他去的地方。”在不排除史莱辛吉可能出访的前提下，基辛格也建议是否安排其他内阁阁员互访，甚至总统出访。邓小平表示欢迎福特总统来访，并且同意应该安排在 1975 年。关于福特总统访华一事，将会记载于公报里。)

基辛格：现在，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我已经和贵国大使提起过。我 10 月份在莫斯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我们提出一项新的条约，在福特总统访问海参崴的时候，也向他提出了更详细的内容。这个条约非常有新意。苏联提议的内容如下：美国和苏联应该签订条约，根据条约，美苏双方在对方遭受其他国家攻击时，都要彼此协防。此外，美苏双方还要在盟国遭受其他国家以核武器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

(此时，会谈由于一名中国女孩推开外间大门而暂时中断)

基辛格：我在另外一间房里有客人，他们稍后会加入我们的谈话。

翻译：我的声音这么大，他们一定会听见我说的话。

基辛格：我们曾经要求苏联说明实务上将如何运作。而说明结果是，不论是谁先开始使用核武器，只要是用在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战争，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或是两国的盟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那么美国与苏联就要相互协防。如果无法提供实质的协助，双方也必须维持良性中立。我们认为这个提议有两个，不，三个基本目的。首先就是逐步渗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这个条约说明了，一旦双方的盟国遭到核武攻击时，我们必须与苏联合作。

第二，在于胁迫那些害怕以色列将动用核武攻击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和苏联建立盟邦关系。

而我相信第三个目标就是中国。这就是我们认为苏联的三个目标，当然，这份条约也有着联合共管的性质。

对于这项提议，我们还没有真的深入讨论，也不打算深入讨论。

乔冠华：事实上，美国提议防止核战的协议，也可以如此解读啊。

基辛格：不，绝对不是。

(基辛格接着开始解释苏联最新的提议，是“想要成立一种核共管状态”，和美国于1973年提出的防止核战争协议是不同的。)

邓小平：他们的目标和目的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

基辛格：而他们的外交手段也总是笨拙而明显的。

邓小平：但是他们的目的很明白，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白。我们认为，他们的目标只是这样的：首先，借着和你们签订这样的条约，苏联可以自行发展核武器，以便达到，甚至超越你们的核武水平。而他们会这么有兴趣和你们签订这样一份条约，就表示他们曾经在类似的情况下尝到甜头。如果我没记错，你们在1963年7月就签订过第一份包含核问题的条约。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商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问题，就在我要离开的那天，你们就签订了条约。

基辛格：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所有的行动。(笑)

邓小平：可是必须指出，那时候，苏联的核武器还落后了你们一大截。不过，在往后的11年下来，我必须承认，他们的水平已经和你们差不多了。

基辛格：这倒不尽然，我想解释一下。

无可避免的，国家的工业力量强大，核武数量也会跟着增加。但是，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特质，一旦超过了某个数量，核武器的优越性，和传统武器的优越性，还是有所不同的。

不过，从数量、多样性、准确性、和使用弹性上来比较，我们的核武器在海参崴条约签订后，都比苏联的先进很多。如果您有兴趣，我可以进一步向您说明，或者我们可以趁着我还在这里的时候，另外找时间谈谈这方面的事情。在核武方面，不论数量或是特色，我们都比苏联强。

乔冠华：如果可以，我想补充几句话。我们很感激基辛格博士告知我们苏联的野心，但是就像我们说过很多次的，我们在这种条约上，并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和苏联还有一份条约，这份条约到现在都还没有过期，而苏联已经要求和我们签订一份新的互不侵犯条约。当然，我们会如何处理这个新条约，目前还不确定。但是总的说来，我们并不认为核武条约有多少重要性。核武器的重点不在于一纸条约，而是在于整个策略，整个原则和路线方面。

邓小平：我还没讲完，我只提到了苏联的第一个目的。苏联提出限制核武条约的第二个目的，就像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是想要分化美国和你们的盟国。这个企图，你们已经知道或是感觉到了。不过，看起来好像不管你们有没有表现出来，他们都不会放弃这个目标，不论是以前、现在、还是以后。至于他们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和美国共同维持在核武方面两国称雄的局面。

而苏联会利用这一点，不仅和贵国相互竞争，还会威胁利诱其他只拥有少数核武的国家，从而成为霸权国家。

因此，我们解读这种条约时，只会重视其政治含义。一向，我们都不

认为这种条约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也不会被这种协约或条款限制住。基辛格博士也说了许多次，你们的目的也不是要限制其他国家。

基辛格：在美苏之间就限制核试爆，或是限制核武，而针对中国所举行的会谈中，我们都一直避免订定任何针对第三国的协议。

邓小平：但是即使他们成功地签订了条约，这些条约又有什么用？这种条约没有用的。即使他们签了这种约，他们手里还是抓着棍子，即使他们不签，他们还是抓着核武器。至于我们的核武器，就像毛主席说的一样，几根指头就数得出来。

基辛格：我们这边从来没有主动和你们讨论过核武器的问题。

邓小平：没错。

基辛格：我们预先通知你们苏联正打算展开核武谈判，也不说你们应该留意，而是万一，他们通知你们，你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而且，我们也有约定，不可在不知会你们的情形下，和苏联谈判。所以，不论你们认为重不重要，我们都要知会你们有关美苏之间的发展。我们也不会要求你们采取任何行动。

我还想和你谈谈另外一件在海参崴会谈时提起的事情，苏联建议我们详细研究中日关系，避免中日双方走得太近。我们已经拒绝了苏联的提议，而且通过一般管道，知会日方苏联的建议，也告诉了日方我们已经拒绝他们的提议。

邓小平：所以，由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联的目标。我知道，毛主席在 1957 年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曾经同他说，他们的现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个性。

赫鲁晓夫跟我们介绍葛罗米柯，并且告诉我们，葛罗米柯的口袋里有很多东西。赫鲁晓夫说，葛罗米柯今天可以搞一套模式，明天再搞另一套。而他的口袋里有许多东西可以搞，这就变成了他的特性。赫鲁晓夫就是这么讲葛罗米柯的。看起来，勃列日涅夫已经从葛罗米柯那儿学到这一招，所以他的口袋里东西也满满的。

我们和苏联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也不指望我们的核武器。除了挖深洞和多搞几支枪以外，我们没有什么花招。

基辛格：那完全要看你们，我们签订的协议与中国没有关系，除了防止核战争的那份条约以外，这个条约可能可以提供我们法律上的依据。不过现在正在海参崴谈的这个约定，在我们看来，有益于全面战略平衡。你们有没有意见就看你们自己了，这个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关系。

邓小平：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听到博士把最近的会谈和最近签订的条约，当成一项突破。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吗？讲得更白一点，这纸协约到底有没有用？

基辛格：首先，你要了解我们是多方面作战。我们在国内的策略是要孤立我们的左派分子，我不知道这事儿在贵国该不该提。

邓小平：我们喜欢右派！

基辛格：右派除了和我们站在一起之外别无选择，我们跟右派没问题。

邓小平：英国的希斯不就是个大右派吗？

基辛格：喔，是的。

邓小平：你以前祖国(编按：指德国)的艾德诺不也是个大右派吗？在法国，戴高乐、蓬皮杜和基斯卡，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都是有名的右派，相

对说来，我们喜欢这种人。

基辛格：我们把我们的左派分子都送到北京了。

布什：我不明白。

基辛格：布什大使就是左翼的共和党员。开玩笑啦。派他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完全信任他。

但是在美国，我们必须孤立并且瘫痪那股想要瓦解我们的防御计划的力量，这些人通常都在执行那种我觉得很蠢的政策。我们可以借着实施一些采用他们说辞的政策，来达到这个目标。

现在来回答你先前的问题：我压根儿就不认为这份约定能保证十年低荡。但是我相信一旦低荡遭到破坏，我们将更能够影响舆论，让舆论认为我们已经尽力在维持和平，而不会指控我们企图挑起紧张关系。

邓小平：我们这边根本不相信低荡是办得到的，更别说要维持十年了。我看没有任何协约，可以把苏俄的双手绑起来。

基辛格：不错，但是苏联将会无法违反了协约，还不让我们知道。我也不认为他们搞这项协约有何聪明之处。他们有两个选择：一则，他们可以遵守协约，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一些战略上的优势。他们也可以违反协约，这样的话我们在心理上，或是政治上都有可能大幅进展，而这种进展由于美国国内因素，是我们无法轻易获得的。

邓小平：在我们看来，还是要提高警觉。

基辛格：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

邓小平：那很好。

基辛格：我曾经读过梅特涅的外交政策，他说和拿破仑交手的秘诀，就是装傻，其实不傻。毫无疑问的，以我国的情形来说，尽管看来很奇怪，但是在有协约的情况下向国会请求拨款，要比在没有协约的情况下容易。(转向布什)你认为吗？

布什：是的。

邓小平：对于你们的限武谈判条约，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所谈的，是战略武器？只适用于核武器？

基辛格：是的，而且只适用于洲际长程范围的核武器。

邓小平：那表示只有战略武器包括在条约里，其他的都不包括。

基辛格：根据条约的定义是如此。

邓小平：但是姑且不论条约，战略武器是指什么？举例来说，传统武器算不算有战略性？

基辛格：没有。

邓小平：那么我们就意见相左了，我们的问题是，将来的战争一定是核战争吗？

基辛格：你认为如何？

邓小平：我们认为不一定是。

基辛格：我同意。但是我也想指出，正如我曾和主席与总理说过的，苏联集团任何扩张的企图，都威胁到我们的长期安定，不论往东方或是西方扩张，也不论受影响的国家是不是在我们的条约讨论的范围里。这和我们条约中涵盖的国家的感情无关，这只是战略上的现实考虑。而且，我们不管这种扩张是采用传统或是核武器。

邓小平：告诉你一件事，赫鲁晓夫在 1954 年访问北京，在访问期间，

他除了吹嘘苏联的玉米种植计划以外，还吹牛说海军舰艇已经没用了。他说在导弹时期来临后，军舰充其量只是活靶而已，立即就被击沉。随后两三年，苏联也真的停止加强海军。不过，他们也很快的修正路线。之后，在积极发展核武之余，他们也同时继续壮大他们的传统武器和海军。

(中方强调苏联在印度洋和其他地区日益扩张的海军兵力，但是基辛格对苏联海军的力量不屑一顾，并指出在最近的中东危机中，苏联海军“调动极其笨拙”，并指出莫斯科方面在中东危机时“惊慌失措”，证明了他们的海军是不堪一击的。)

基辛格：尽管如此，在传统陆战武力上，我们并不低估苏联，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强大。在海战力量方面，他们绝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有些可笑的将军，为了预算，表示不论我们与哪个国家作战，哪怕是瑞士，我们都会输。但事实上，苏联唯一可能在地中海地区损及我们的舰队的机会，就是动用他们陆上基地的战机。万一他们这样做，那就会是一场核战争。如果是海战的话，我们的航空母舰能在很远的距离以优势火力击沉苏联的舰队，他们绝对赢不了的。

邓小平：但是从我们和一些欧洲人士的讨论中来看，他们似乎比较担心。不只是在海军方面，而是在整个传统军力方面。

基辛格：在传统军力方面，大家都该操心。但是在海军力量方面，我想我们非常占上风。

邓小平：不过苏联发展的速度很快。如果苏联发动战争，那不见得是场核战争，很可能是传统武器战争。在这个考虑下，不该忽略传统武器。

基辛格：我完全同意。西方国家的问题，不在于海军军力而在于陆上传统兵力。不过，你也该注意到，我们最近已经增加我们陆军的数量了。不过毋庸置疑地，这仍然是一个问题。邓小平：你们陆军增加的数量，和苏联比较起来，还是少太多了。

基辛格：不错。不过，我看现阶段比较不利于苏联。首先，在欧洲方面，苏联无法不措由发动大型战争，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会使用核武器。

邓小平：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苏联拥有和你们同样的毁灭性力量，你们会那么容易决定吗？

基辛格：苏联并不像我们拥有这么多的毁灭性武力。

邓小平：就连先发制人的能力也没有吧？

基辛格：没有。让我向你说明一下我们的武器数量和配备，由于美国国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所撰写的荒谬意见，目前大家对我们的军力的认识已经被误导了。

我们拥有 1054 枚地面导弹，656 枚配备在潜水艇上的海上导弹，415 架 B—52 轰炸机，300 架 F—111 轰炸机，只有这 300 架轰炸机从来没有列入官方数据中。而这只是我们的战略性兵力。除此之外，我们在欧洲还有 500 架战机，航空母舰上，也有 700 架战机。

1979 年起，我们还配备至少 240 枚新式导弹在潜水艇上，就是所谓的三叉戟潜艇。

邓小平：你们这样做有没有违反条约呢？

基辛格：没有。我稍后会针对条约说明。我们还打算增加至少 250 架新的 B—1 轰炸机。

不过，刚才所说的 240 和 250 这些数字，只是我们计划中的数字。一旦我们开始生产，我们想制造多少都可以。

在导弹部分，唯一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是 1000 枚地面导弹，但是在 1982 年以前，都不会有这个状况，稍后我会补充解释。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前，1979 年起，我们就有能力连续生产三叉戟导弹。这种导弹不一定要配备在潜艇里，也可以装置在地面。

因此，苏联政府如果对我们的 1000 枚地面导弹发动攻击，那将是疯狂的举动，因为，即使他们能摧毁我们所有的地面导弹，我们还会有 1500 枚导弹的实力。况且，苏联也没有能力摧毁我们的 1000 枚地面导弹。

邓小平：所以，不管哪一方要动用核武器来攻击对方，都得三思而后行了？

基辛格：绝对如此，我刚才只是大略回答你们的问题，至于苏联能不能发动突袭，我的观点是，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反过来看看，美国方面只有 30% 的武力是地面导弹，其余都是海上或是飞机载运的导弹。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正计划把长程导弹也放在我们的战机里，由于苏联战机不够大，所以他们做不到。但是在苏联方面，他们的导弹 85% 是陆基导弹，而且他们的海基导弹目前为止都品质欠佳。更何况，苏联只有 120 架能够飞抵美的战机，而且情况显示，他们的训练不良。事实上，根据我们正在洽商的协定，苏联将要降低他们的数量。

根据协定，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意组织其空军战力，但是双方同意总数不能超过 2200 架。

如果不计算配置海外战机的话，苏联已经超过这个数字，而我们没有。因此，他们必须减少兵力。我们猜测他们很可能会淘汰飞机，不过我们不确定。

邓小平：不过，他们还是可以提高武器的品质，这并不违反协定。

基辛格：是的，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邓小平：所以你们双方还是在竞赛。

基辛格：但是我们的战力计划，已经规划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了，而他们还停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所有陆基武力都会非常容易被毁灭，而苏联 86% 的军力都在地面上，我们却只有 35%。其次，苏联目前对武力的改进，都集中在最脆弱的部分，也就是陆基武力上。我们的研究方向，则是在改进海基和空基武力，这些都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譬如说，他们的潜艇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测试携带多弹头导弹，也就是说，他们在 1980 年之前，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技术。这代表着我们在准确度和技术流程方面，比他们先进了 10—15 年。

邓小平：在这些方面，我们支持你们对苏联维持优势。

基辛格：我再重复一次，如果我们想先攻击他们，还可以动用我们部署在海外的军力，这是我刚才说的战略武力之外的额外兵力。

邓小平：我想，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是核与传统武力的问题。

基辛格：我只是回答刚刚外交部长说到，他们可以先对我们发动攻击而已。不过，如今想要动用核武器，的确比 15 年前要困难，这是千真万确的。

乔冠华：我所说的是，如果苏联现在以传统武力，发动一场规模不算大，而只是中等规模的战争，这种状况下，你们就很难决定是不是要动用核

武器。

基辛格：这的确将会比 10—15 年前来得困难，同时，也要看他们在哪里发动攻击。

乔冠华：我们在纽约也讨论过，如果南斯拉夫的局势生变，苏联毋需直接发动攻击。

如果他们策动南斯拉夫内部亲苏人士，引进苏联军队的话，你们要怎么做？

基辛格：南斯拉夫？在我们先前的会谈之后，我曾经到过南斯拉夫，并且和铁托元帅与他的同僚谈过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明年起将对南斯拉夫军售。目前，我们也正在考虑如果发生这个状况，该如何应付。我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情况不会像捷克或是匈牙利那样。我们还没有决定细节步骤。但是我们认为，一旦苏联部队跨出国境，其野心将无日无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东危机时，当我们发现苏联动用起空降师时，我们的反应会那样激烈。因为我们判断，如果苏联军队可以移师出国，在海外作战的话，他们的胃口可就没完没了。

邓小平：我们认为，不仅中东是个火药库，巴尔干半岛亦然。这是从沙皇时代的老策略。

（基辛格接着表示，如果在 1975 年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话，福特总统计划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停留，以“确定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维持独立的意愿，但是我们当然并没有宣布这个计划。”邓小平与基辛格同意，往后在更多人出席的场合里继续讨论。

在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里，邓小平详细说明了中苏关系，并指出莫斯科“仍然利用军事威胁和颠覆手段”来对付中国。当他询问关于欧安会议时，基辛格表示：“不成功的……会中不会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当继续回到讨论与莫斯科的争议时，邓小平试图让基辛格相信，对于苏联的威胁“我们不太在意。”）

邓小平：苏联在东方的军事力量并不只是针对中国，还要对抗日本和你们的第七舰队和你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如果他们打算攻击中国，就如同毛主席（和你）讨论过的，他们不可能只用 100 万部队就想接管中国。他们可能还得再增加 100 万的兵力，即使如此，还是不够。因为如果他们真要和中國打仗，就得准备打 20 年。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德行，只是坚忍不拔。”

基辛格：中国人还有些其他的德行。

邓小平：还有“小米加步枪”，还有地道。

基辛格：我从来没有参观过那些地道。

邓小平：布什大使没有带你去过吗？他没有尽到责任。

布什：我自己也还没有去过，我很高兴知道我们可以去参观。

基辛格：别鼓励他。从他和我们驻印度大使（莫尼翰）那里收到的电报和资料，已经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了。不过，驻印大使总会把他的报告登在报纸上。

邓小平：关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就讨论到此。对于苏联的重点策略部分，我们认为他们攻击欧洲，只是一种“声西击东”的策略，他们的真正目标还是在东方。我们的看法可能不同，不妨静观情势发展。

基辛格：我看也差不多。如果他们攻击东方，对西方会造成威胁。如果他们攻击西方，对东方也会造成威胁。无论如何，危险都是相同的。我们

不需要很抽象的决定这件事。

邓小平：不过这种战略评估有它实用的一面，尤其对西欧国家来说。这一点我们已经多次交换过意见了。

基辛格：我想欧洲不能坐视苏联东进，我想你们也不能袖手旁观欧洲遭到攻击。

邓小平：我们同意这点。任何地区遭受攻击，对其他区域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战略观点和备战，尤其是你们的欧洲盟国。如果没有(备战)，他们就要遭殃了。

当我们把重点放在西方的时候，那并不表示我们会忽略自己的国防力量。

基辛格：我们同意，我们也会强化我们的准备。不幸的是，你也了解目前在欧洲，有些领袖不是那么英勇。你也和他们见过面，心里也有数，不过，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在石油危机方面，我想提出一件事。美国有两个选择，经济层面来说，我们如果独立解决问题，会比和别人合作来得好些。我之所以会提出几项特定的提议，因为我想如果欧洲国家收入持续减少，就会降低他们的信心，而无法抵抗苏联的压力。如果他们拿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钱，他们将持续在政治上丧失士气。你们该了解，我的建议和政策，都不是基于经济的考虑。因为如果由经济着眼，我们应该只和沙特达成双边协定，而不理会欧洲。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欧洲国家因为经济情况而士气低落，西方的防御体系可能会衰退。

邓小平：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谈了很久，该吃点东西了。不然，我们的肚子都要闹革命了。

(邓小平与基辛格暂停会谈进午餐，至下午双方继续就欧洲、中东、南亚、东南亚、以及国际石油等政治议题进行广泛讨论。下面的摘要，记录了邓小平强调强大的欧洲盟国，以防止“北极熊”的侵略的重点性，以及美欧间基于“平等”的原则上的合作关系后，双方的会谈内容。)

基辛格：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一直认为中国是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最好的伙伴(笑)。如果你在这里为来访的欧洲各国总理安排一个研讨会的话，我可以提出几个能够从中获益的人(笑)。你们对丹麦总理很好，尽管他的胆识不符你的标准。

邓小平：我们之间的谈话很好。

基辛格：很好，很好。

邓小平：事实上，丹麦总理的确很害怕战争。

基辛格：任何人想要攻击丹麦，都不需要准备打 20 年的仗，或是搞那么多的地道(笑)。

不过说真的，我们明白你们和欧洲各总理的会谈非常有帮助，我们也很感谢你们的努力。

(双方的会谈转向，开始讨论欧洲的共产主义，这个话题让基辛格颇为忧心，因为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都采取一种策略，让他们看来“不那么激进而且很负责任。”)

基辛格：当你分析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你们要了解，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或是说一些话，来瘫痪我们国内和欧洲的左派势力。我们反对，也会尽全力来防阻左派势力进入欧洲政府。我们会在葡萄牙这样做，因为我

们不希望其他国家跟进。当然，我们在意大利和法国都会这么做。

(邓小平对欧洲共产主义这话题反应比较冷淡，他表示，这将是“反面教材的良好示范”。基辛格还是会谈，美国政府之所以决定要“防阻”，是因为如果共产党在意大利或法国胜选，将对北约和德国的政局造成“严重”影响。他声称，意大利或是法国共产党的胜利，“将会强化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该政党受到东德影响匪浅。”这个说明，也显示了基辛格内心深处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怀疑。

接下来，双方进入对中东情势和美国斡旋的长时间讨论。讨论过程中，邓小平呼吁美国要采取比较公平的原则。基辛格赞同，并认为要更努力把阿拉伯国家的目标考虑进来，但是他也提到：“事情一定会有起伏的，尤其是如果你把 15 个阿拉伯国家都摆在一起的时候。阿拉伯人不太能明确划分史诗和外交策略。”邓小平建议基辛格不要低估了阿拉伯国家。)

邓小平：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立场，这也是你们比较弱的一点，就是你们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唱反调。但是阿拉伯国家阵营有 1.2 亿人口，在这方面，苏联比你们占优势。

基辛格：我承认无能为力的虚弱感，绝对不会带来有利的立场。以色列是我们最弱的一环，但也是我们最强的一环。因为能做的也做了，能说的也说了以后，以色列还是巍然不动。阿拉伯人动不了以色列，苏联人也动不了他们。现在，任何想要取得谈判进展的人，都得来找我们谈，包括巴勒斯坦人。

(在南亚议题方面，基辛格与邓小平同意美国应该介入印度事务，让新德里在苏联之外，多一个选择。此外，也让美国更容易对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对基辛格所提出的，由包含西哈努克与朗诺支持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建议，表示反对。在能源议题方面，基辛格指出中国对石油生产国的援助，可能损害日本与欧洲，从而伤害中国的安全，但是邓小平在这个议题上没有松口。

最后，邓小平再次对台湾问题提出中国的三个原则，那就是必须依照日本模式，一旦美国终止与国民党政权的防御条约，台湾问题就成为“内部问题”，而应该由中国人来解决，并且，(在和谈过程中，不接受任何干预，检查或是保证条件限制。)

邓小平：我想我们不能在这次谈话中，就这个问题达成结论。

基辛格：我也不认为。

邓小平：那我们就此打住吧！你稍作休息后，我请你尝尝驰名的北京涮羊肉(在餐厅吃晚餐)。

基辛格：恭敬不如从命，我从没吃过。

(在整理出准备发表公报的最后程序以后，双方同意于次日再举行一次小型的会谈。)

次日早上，基辛格参观了紫禁城，并于下午拜会邓小平。双方就中东谈判问题讨论了一些细节，而这个话题也引中到了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包括赔偿要求与资产解陈问题。邓小平对美国谈判成员试图引用美国法律的行为加以反驳，并表示：“美国法律在中国不适用”。基辛格戏谑地表示：“有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就在芝加哥的近郊。”基辛格表示他希望避免一场“针锋相对的谈判”，并表示他同情邓小平的关切。

在正常化问题上，基辛格发现邓小平的立场没有改变；邓小平重申了

中国的三个原则，并补充说：“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小平表示，北京方面会一直等到华盛顿方面准备依循三个原则为止。基辛格表示，问题所在并不是接受这三项原则，而是“如何落实”。

邓小平指出，中国不会“在内政方面做出任何承诺或是保证。”基辛格提议是否可以在对台湾问题上达成“关于你们片面想法的一般声明，”而邓小平反问：“这种声明里该说些什么？”邓小平无意就这点继续讨论下去。

而在国际局势的激烈讨论中，邓小平重新提起了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威胁：“北极熊是冲着你们来的。”世界大战是一个危机，但是邓小平问：“那一定就是桩坏事吗？有时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的。”而就美国在世界政治的角色上，两人针锋相对。邓小平对华盛顿“总是站在最前线”的立场有意见，而基辛格劝告邓小平不要用自己的炮弹打自己。

邓小平：另外一件事就是基辛格博士重复地提起大炮的问题。看样子博士对炮火很关切。

基辛格：我的地道挖得很深。

邓小平：我支持这种做法。炮一定要打。而博士已经提过，炮火的准确度已经提高。

既然准确度已经提高，对于大炮该不该停止使用，就不太明确了。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该不该使用大炮的火力。而我还想请你注意一件事，那就是在很多事件上，美国总是在最前线的位置。博士在此间曾多次提到能源和食物的问题，在这些话题里，美国总是在最前线。你提到西欧、日本和其他国家是被这些危机影响最深的国家，但是他们都不在最前线上。

基辛格：在军事防备上，他们也不在最前线。

邓小平：当然，美国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最前线的位置。只是，最近以来，你们在很多重要课题上，都是在最前线上。相反地，苏联都藏在后头。举例来说，在塞浦路斯和中东问题上，你们都站在最前头。不论你们怎么看待中东问题，由政治立场来看，美国不顾 1.1 亿阿拉伯人民的反对，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都是不利的。当然，博士再三解释这是由于国内的问题所导致的。但不论如何，只要阿拉伯国家不能把失去的领土拿回来，这个问题就无解。谋略不能解决问题，公报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件事已经和中南半岛和韩国问题有些像了。我不希望博士把这些论点当作是恶意的。

基辛格：不会的，副总理，我已经把我们在许多话题上的看法整理起来。副总理已经说完了，是吗？

邓小平：是的。

基辛格：我也整理了美国国内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许我可以向你报告一下。首先，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也认为他是位伟人。在任何情况下，为战争作好准备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的政策也是在所有情况下作好准备，而不去仰赖其他人对和平的承诺。而根据这次的分析和你刚刚引用的许多话，我们对整体情势的分析，和毛主席的分析是相同的。

至于攻击究竟会发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则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因为无论攻击从哪里开始，最终目标还是我们，这点我同意。如果战争由西方开始，还是会影响到东方，而如果在东方发生，也会影响到西方，最终总会影响到我们，在这点上我们没有歧视。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结论就是，无论任何一种情形发生，我们都可能要做同样的事情。

在美国始终都站在最前线这个议题上，这应该只是根据你们所作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你认为我们必须这么做。副总理很正确地提出，欧洲或是日本在能源危机上都不是首当其冲的国家，尽管他们是主要的受害者。在国防问题上，他们也不是站在最前线的国家，尽管根据你们的分析，他们也是受害者。从各种角度来观察，这些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美援，都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存根，将来如果我们能讨论这个课题，大概是很有意思的，但是现在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如果这些国家脱离了美国，他们很快不会变得虚弱，而且被“芬兰化”。在现在的情势下，他们无法独自成为一个小组。对我们而言，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会方便很多。不管如何，我们也希望能如同副总理早先所说的，形成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能源问题上，我们都同意如果欧洲和日本都被自己国内的经济压力逼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就会无法发挥战略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站在最前线上。

在中东问题方面，我已经向你解释过我们复杂的策略了。我同意你的意见，除非能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任何战略性的解决方案都不是永久的，在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相同的，我也说明了我们的策略将会如何，而他们的策略将无情地引发一个激烈的结果。副总理自己由政治和军事战争的经验也学到，只要累积了足够的细微变化，迟早都会产生根本的变化。

至于塞浦路斯和中东问题，以及苏联在这些问题中的角色，苏联无法制造任何事端，充其量只能嚷嚷罢了。在这些议题上，我们宁愿不要站在最前面，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曾试着把英国推到前面去，而这个举动制造了很复杂的结果。在发射大炮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我们也有自己的地道，你们也该注意不要自毁要塞。

邓小平：他们还没有自毁要塞。

基辛格：我没有说他们有，在这件事上，我们要仰赖你们了。

邓小平：你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基辛格：我们通常不做任何攻击的行动。但是基本上，我认为这次我们做了非常有用也有利的交流，我想在许多双方都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我们建立了友好的精神……

当晚，基辛格设宴款待中国代表。基辛格关于他和乔冠华当晚彼此祝酒讲话的私人看法，表达了在 1974 年底的中美关系的情形。他描述乔冠华的祝酒词是“介于友好和正确之间。”至于他自己的祝酒词，他说“我的祝酒词亦步亦趋，所说的话稍微乐观些。”在放了那么多颗炮弹的一年里，只有一个双方共同的敌人，才足以维持一个完全不带感情的关系。

十三、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任何弹性

从这份会议记录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形成过程，应基辛格之召出席会议的都是美国政府内处理中国事务的要角。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哈比卜虽不是中国专家，但他主管的亚太事务局是中国驻美外交官员的主要打交道对象。

洛德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也是基辛格的亲信，他虽然不

是中国专家，但有位中国太太，他的岳父是当时台湾糖业公司驻美代表包新第，故台湾官方有些人想借这个关系接近洛德，甚至想影响他的中国政策观，当然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当基辛格在会中问有没有与中国正常化的办法，洛德马上建议把和台湾的关系降到代办级，减少对台湾的军售。国家安全会议的所罗门也是中国专家，他担心如果正常化没有进展，中国会与苏联合作，美国必得有些作为。

机密 / 敏感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士：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助理国务卿哈比卜、洛德、副助理国务卿格莱斯廷、国家安全会议幕僚所罗门、记录：布雪默

日期：1975年7月6日

主题：中国

基辛格：我其实没有太多好说的。我已经看过你们的报告，但是我不照你们写的做。这份报告和你们去年给我的完全一样。

洛德：不，不一样的。问题是，在你先去部署的访问中，你有没有认真的去了解，他们在安全上的需求是什么？

基辛格：从政治考虑上来说，美国在1976年以前致力于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任何事会引起福特作保守的反应，这件事就是导火线。

洛德：我们承认这点，但是也认为只要条件够好，就不会是一个政治问题。

基辛格：我在巴拿马和中国之间都有问题，我甚至不同意你们书生的立论，认为现在是推动它(指正常化)的适当时机。

洛德：上次他们并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基辛格：即使他们愿意讨论，他们对教授(编按：美籍华人李振翩博士，毛泽东的老同学)说的话也只是给国内听的。你不能针对某个政府说给国内听的话，要求这个政府负责。

洛德：这大概假定我们可以发布自己的声明。

基辛格：我们防卫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指台湾)的法律？

格莱斯廷：没有。

基辛格：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在竞选期间进行(正常化)。

所罗门：在最近，他们已经在七到八个场合里清楚表示，他们希望有弹性。他们害怕福特会取消访问计划。

基辛格：访问已经谈妥。他们很迫切希望成行，但是我看不出他们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弹性。

洛德：我们承认在机动性上没有太多空间，唯一的议题是，你有没有试着去了解那些条件？

哈比卜：在你这次的访问中，很难避免讨论这些条件。

基辛格：但是万一他们给我们优厚的条件呢？那时候我该怎么办？难道收进口袋里然后说：“我们在两年内没得好谈的。”还有，他们能够超出他们告诉这个家伙(指李振翩)的部分吗？

格莱斯廷：不能，问题是，他们会允许什么样的关系？

基辛格：当我们向国会兜售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这点。对了，那么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我们要继续销售武器(给台湾)吗？

格莱斯廷：你得给他们肯定的答案。

基辛格：但是我们有合法立场承诺军售吗？

格莱斯廷：只要地主国政府容忍这点，就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哈比卜：这些军售都必须以现款交易，不可以赊欠。

基辛格：可是，他们也没权力随时终止。

洛德：从这个关系一开始，我们就一直有这个难题。你一定要在片面声明里说清楚。

基辛格：我不知道我们这样，会走到什么地方去。我会试着和总统谈，但是我大概已经知道他的答案了。(白宫)那些人现在连巴拿马都不碰了。

洛德：报告强调从我们的国际立场上这样做的重要性，他强调你八月前访问的时候，有必要认真讨论此事。

基辛格：谁说我八月要去访问的？我八月根本不会去。

洛德：如果他们的回应很差，你的立场就强化了，但是如果他们的回应不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反而被束缚住而有麻烦基辛格：万一他们的要求到了底线怎么办？

但我想这种机会并不大，我看在这次事先访问里所谈到的条件将会很强。

基辛格：我们最好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已经通知他们需要什么了。

洛德：我想我们可以比较具体些，告诉他们，我们只能在(台湾)安全问题得到满意结果后，才能做这件事。

哈比卜：我想他们不会在你到访的时候，就讲出他们的底线，他们不会等总统去谈的时候才谈到底线吧？

洛德：不会的。

基辛格：这不是他们谈判的方式。

所罗门：他们可能对总统的访问之旅，也设下一些前提条件。

基辛格：不会的。如果他(指美国总统)也询问其他亚洲国家，譬如菲律宾和印尼的话，他们会如何反应？

哈比卜：如果他在回程途中这样做，我想那不会有问题。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基辛格：那这不是一趟专门到中国的访问了，去马来西亚如何？

哈比卜：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国家还是菲律宾和印尼。

基辛格：澳大利亚呢？

哈比卜：那要看那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基辛格：总统能不能只去澳大利亚，而不去纽西兰？

哈比卜：那比较难，纽西兰方面不会谅解。

基辛格：他们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人。

哈比卜：那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从来没有问题，他们只谈乳酪和牛油。

基辛格：还有羊肉。我今天晚上该同他们要求什么？(当晚基辛格预定要和黄镇见面)

洛德：你想不想谈谈你的访问？

基辛格：他们得先向我们提出建议。

洛德：自从上回你和他们见面以后，他们已经比较紧张基辛格：我发

现不论你和他们谈任何有关史莱辛吉的事情，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对伊朗人说，他们认为朗司菲德(白宫幕僚长)和哈特曼(白宫参议)的影响力都超过了我，这简直愚蠢。我可以了解他们对朗司菲德的看法，但是对哈特曼，我一点也不明白。

所罗门：他们从其他国家那里听了太多消息。

基辛格：哈特曼在白宫的地位直线下滑，根本和我没有关系。

洛德：他们该对你的访问做些建议。

(谈话在此时被一通找基辛格的电话打断。)

哈比卜：在访问一事方面，你曾经就总统访问时机建议了几个时间，而他们的回答是任何时间都可以，我认为现在你该跟他们敲定时间了。

基辛格：他们为什么不能主动提出访问的事？

哈比卜：我想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已经回答你了。

所罗门：如果你真想让他们心急的话，就根本不要提。或者，你可以只谈你自己的访问，那会略微减轻他们的紧张。

洛德：或者问问他们有没有由北京方面听到任何消息。

哈比卜：他的答案一定是：“看你决定了。”

基辛格：除非他们让我会见毛泽东，否则我下次就不去了。我不想再和我们的新闻界扯些狗屁倒灶的东西。

洛德：我认为在我们准备好把关系正常化进行到底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讨论这个话题。

基辛格：我和中国打交通的经验，就是告诉他们我方确定的立场，和他们开诚公布。

洛德：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未来两年内没有进展，关系会倒退。

基辛格：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上。

格莱斯廷：不错，但是我们的人不是这么解读。

哈比卜：另一个问题是你和这个过程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你的了解。你是唯一还在位的人，而这对他们而言深具意义。

格莱斯廷：报告里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未来半年的那一年里，对台湾是很好的时期，因为那里已经准备在座变。

基辛格：如果我们能找到通往关系正常化的台阶，我就会接受，但是这种台阶在哪里？

格莱斯廷：这样做的话，我们在国内会有麻烦。

基辛格：或者你们可以强化一致的观点，然后找出一个模式来进行。

所罗门：那一直是他们最有力的一张牌，这是整个关系正常化的核心。我猜邓小平扮演打前锋的角色。

基辛格：如果这是他们所想做的，我们应该可以倾着这个方向做些事情。

哈比卜：我认为你今天下午可以从复查你想和葛罗米柯谈的资料开始，接下来就是访问的事。

所罗门：目前唯一支持我们关系正常化的说词，就是万一他们的情况给渗透得太严重，他们可能会转向苏联。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可以稳住他们国内支持和我们建立关系的人们。

基辛格：只要不是立即关系是正常化，我愿意找些其他的方法。

次日(1975年7月7日),当黄镇与基辛格会晤,讨论现况发展时,他重复了邓小平就福特无条件访问北京的声明。“如果会谈能达成共识,那很好……如果会谈无法达成共识,那也很好。”基辛格暗示双方达成“全面共识的中程步骤”,而在双方建交上可能无法得到进展,但是黄镇并不明白这种暗示。基辛格的幕僚研讨出“局部的步骤”,诸如美国发表一个中国的声明、设立热线、或是增进双方学术性研究及教育的交流等,但是中国对这种半调子措施不感兴趣。

十四、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

1975年2月基辛格访问中国的目的在安排福特总统于同年12月访问中国的议题和公报内容,由于此时的双边关系乏善可陈,所以访问后根本没有发表联合公报。基辛格在10月21日会见毛泽东的前一天,曾和邓小平举行过两次会谈。邓小平的谈话仍以反苏为主题,再度警告美国,“北极熊”的手法是声东击西,并直指美国的作法是姑息主义,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说法极不以为然。

基辛格对慕尼黑的话题特别敏感,说他不但研究过这个问题,还要以受害的当事人现身说法。他指出,慕尼黑的悲剧是西方领袖不承认希特勒带给世界的威胁,而现在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则毫无幻想,他强调,一个每年花1100亿美金在国防经费的国家,不致于追求慕尼黑的精神吧。

次日早上[1975年10月2日],基辛格拜会了邓小平和乔冠华,就福特来访的细节问题展开讨论。乔冠华说的话显然让基辛格耿耿于怀,他提醒他们:“如果我们看起来像吵架,完全无益于双方利益。我想我们应该等到联合国里再辩,而不是在总统来访时。”这次会谈的焦点,在于基辛格对世界局势的通常的简报,包括中东问题、美欧关系、和东亚问题。这些话都是以防堵苏联霸权为出发点。他指出中国希望美国在各种苏联问题上,采取拒不妥协的态度,也表示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势,不容许他们如此做,不过,福特政府在安哥拉、葡萄牙、和其他地区都在阻止扩张主义。在下面的摘要中,他也谈到批评他的人们。

基辛格:那些经常攻击我们提出和缓紧关系策略的人——我所说的是美国人,我稍后再说外国人——他们也告诉我们,中东的问题所在,就是我们没有和苏联合作来解决问题的人,这都是同一批人。我们的政策,也正是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妥协。你们已经看过很多我们的人了,不妨自己判断。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像范锡先生和他的幕僚所说的,放弃了优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的话,那么这种相对权力论,将会让整个西欧都“芬兰化”。事情不能这样,这样也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去让苏联认为我们会接受核武器使用上的重大战略变化,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必须让苏联相信,不论在任何一种武器上,我们都不会默许打破现在的均势局面。

(在讨论过程中,邓小平质疑美国销售大麦给苏联、提供西方贷款、出售技术给莫斯科,以及赫尔辛基会议的结果。)

基辛格:在经济借贷方面,我们说的比做的多,欧洲人则是做的比他

们说的多。欧洲——在西德与法国之间——已经放出了约计 75 亿元的信用贷款，而美国这些年来则是放出了 5 亿元。

邓小平：70 亿？

基辛格：是的，我们利用科技的前景，来缓和苏联外交政策上的动作，我们也只销售零件给苏联，而不整厂输出，让苏联在这方面无法币依赖我们。某些欧洲国家把整个工厂卖给苏联，真是不高明。不幸地是，这么小额度的美国信用贷款，却把生意放进毫无策略的欧洲人手中。对我们而言，这不是做生意，我们贷款，只是基于战略的考虑……

邓小平：我们注意到了，最热衷宣布欧洲安全会议取得所谓成功的人，第一个是苏联，其次就是美国。

基辛格：不是的，苏联人的确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是我们美国国内的反对人士。

美国政府没有说欧洲安全会议有什么伟大成就。苏联必须宣布成功，因为他们因袭这种政策已经 15 年了。

我们的看法是——不论他们公开场合里怎么说——苏联可能觉得他们对欧洲安全会议的计算错了。他们由西方国家得到的，只是些过去就已解决的事件的一般声明。而我们却在实际议题上，取得了施压的方法。

欧洲已经没有尚待解决的疆界问题了。巴尔干国界问题已经在 1946—1947 年间的巴黎和会解决了。波兰东部国界已经在雅尔塔设定了，而东西德双方政府也已经承认了波兰西部的疆界。在欧洲，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未定界的问题了。有些我们的政客还搞不清楚，但在法律上这却是事实。

(在讨论美国及中国的关系时，基辛格试看说明他草拟的公报的正当性，即在强调双方已经采取局部措施走向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上，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议题，我们已经表明我们在上海公报上的原则不会改变，我们也会在这次公报里提出一些建议，朝这个方向前进。我们认为在双边关系上展现一些活力和进步是重要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在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层次，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在抵御霸权野心的努力上，不论在西方或是在东方，处于一个最佳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在双边关系上展现一些改善。如果中国不在美国人心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话，我们就很难让美国人民支持我们要做的事情。而除非我们的双边关系有进步，全美上下就不会在乎你们。这都要看你们自己了。

(尽管理智的邓小平早上质疑美国的政策，但是直到下午，他才以尖锐的批判炮轰基辛格，基辛格认为这是毛泽东提纲挈领的。在批评美国现任政府的政策和尼克松政府作了不利的比较后，邓小平再旧调重弹他一年以前就强调过的主题，亦即北极熊的主要目标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它是要修理美国的。”接着的摘要显示邓小平更进一步，用了会让里根听得津津有味的字眼，来攻击赫中基(欧洲安全)会议以及其他对和缓美苏间紧张的示好举动，是“姑息主义”的最佳例证。)

邓小平：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要靠自己来对付苏联，这点上，我们也从来没有任何幻想。这一点我们向博士和其他来访的美国友人都表示过。我们不依赖核武，甚至更不依赖(由其他国家所提供的)核武保护。我们只靠两样东西，一个就是 8 亿中国人的坚忍不挠。如果苏联想打中国，一定要准备作战至少 20 年。我们靠的就是小米加步枪。当然，现在的小米加步枪，已

经和延安时期不同了。我们追求的策略，是在经济建设和战略问题上自给自足。

从历史教训来看，我指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从 1936 到 1939 年间，这段历史很值得借鉴。基辛格博士本身是学历史的，我想一定比我更了解。（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了姑息政策，很快就达成了慕尼黑协议。

从这种策略上来看，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们想把危险往东边推，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姑息希特勒，希望他不要采取激烈的行动。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把危险往东边推过来。惨痛的历史教训证明了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策略是失败的，他们的策略导致了他们所希望的相反的结果。

事实上，这种姑息政策反而导致二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在我和许多欧洲人接触的时候，他们经常提起慕尼黑协定的教训。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认为这种重蹈覆辙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

在策略方面，苏联武器远超过了西方国家的武器，而你们也达到了武力的均衡状态。

至于整体兵力方面，苏联的兵力比美国和欧洲国家加起来的兵力还要强大。但是苏联有两大弱点：第一，他们缺乏粮食；第二，他们的工业设施和技术都很落后。从长期眼光来看，尽管苏联的兵力比较强，这两个弱点就把苏联摆在劣势地位。它的力量有限，所以一旦爆发战争，苏联撑不了多久。

所以，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会利用自身的优势，来补足苏联的弱点。

如果美国和欧洲善于利用苏联这些弱点，你们在谈判上会比较占上风。

至于我们对赫尔辛基会议的看法，我想你明白我们的观点跟你们的不一样。我们管它叫欧洲“不安全”会议，而你们称它为欧洲安全会议。慕尼黑协定让张伯伦、达拉第，和一些欧洲人民误以为安全了。现在，你们供应他们，替苏联补足他们的弱点，你们帮助苏联克服他们的劣势。你可说你们欺骗了西方，从而让他们丧失了斗志，放慢了脚步。

中国人一句老话：只要把驴子的眼睛蒙起来，它就会推磨。

我们一直认为想要依赖欧洲安全会议，或是任何其他事情来姑息俄国人，都会失败。

应付苏联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你们所谓的合约或协定，不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而是实际的准备。

在中国方面，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告诉过你，我再明白的告诉你一次，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中国不会向任何人求恩惠。我们靠着挖深洞，我们靠着小米加步枪来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所有问题，包括东方的问题。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说法甚表不平，他指出现任美国总统的政策，就是“尼克松总统会追求的政策，如果没有水门事件的话。”并就他对苏联的立场作了详细的辩护。）

基辛格：我必须说在聆听副总理方才的演说时，我觉得有些难过。很明显地，我一直误以为我以前听到的公开声明，只是为了公众效果而说的。

副总理很慷慨地指出了 1936—1939 年间的历史教训，他也指当初想把侵略者推向东方的西方国家，最后反而成为战争的第一批受害人。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当初也有些东方的人士，为了逃避此一困境，而想要把入侵者推到西方国家，最后他们自己还是成为侵略者的目标。

当我们说东西双方都有着相同的战略问题时，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在加入东方的防御系统里获利才这么说的，任何了解美国国内状况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不是我们的野心。

我们会这么说，是因为战略上来说，不论攻击哪里，东西双方都会受到影响。你们也根据这些假设采取行动。

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对你们施恩，因为你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给我们帮助。

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从我在华盛顿工作以来，我们和苏联有三次冲突的记录：一次是在古巴的核潜艇基地；一次是在叙利亚入侵约旦的时候；一次是在 1973 年的中东危机的时候；不对，总共有四次，还有一次是为了柏林通路。在这四次冲突里，我们都是自行应付，并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更别说中国，会如何处理。

副总理也谈到了慕尼黑精神。我研究过这段时期，而且我本人也是那个时期的受害人，所以我对这段历史也知之甚详。慕尼黑政策，是由一些拒绝承认有危险，也企图借由否定问题存在以逃避问题的政府制定的。美国现行的政策，正如我们试着告诉你的，对危险不抱着幻想，而是面对现实，找出最有效的抵抗方法。一个每年花费 1100 亿在国防上面的国家，不可能追求慕尼黑精神的。

不过，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在美国国内所滋长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欧洲较美国更甚。

我认识你所说的一些欧洲人，有些人还是我私人的好朋友。但是，我们在欧洲的朋友，不管是什么立场，都不会怀疑美国会做什么。有任何威胁，我们都会在那里。我们关心的是，欧洲人自己会不会在那里。是美国组织了北大西洋的防御体系，也成了唯一存在的团结核心。美国并没有鼓吹欧洲安全会议，而是为了缓和一些欧洲国家所受的压力，我们才不甘不愿地在 1971 年同意召开会议的。

如果你留意观察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行动，你将发现是包括我在内的现任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在阻挡苏联伸出的魔掌，尽管也许你不喜欢这些方法。

我们不依赖欧洲安全会议，我们也不依赖美苏之间的低荡。美国国内倡言反对低荡的人，并不见得都是靠得住的苏联的敌人，因为如果对状况缺乏策略上的了解的话，这些(反对低荡会话)都只是政治手段而已。说狠话容易，要强有力的行动，还要持续维持强大的政策，在民主社会才是难题。

如果苏联伸出魔掌，我们的反应会很断然无情的，不论魔掌伸到哪里，有我们抵抗苏联的时候，我们不会询问别人是不是和我们评估的看法相同。为了这么做，我们要以我们的方法来锻炼我们的民众，以一些能够让我们长期维持这种政策的方法。而不是像(国务卿)杜勒斯那样，从完全不妥协政策，变化成过度怀柔政策。

我想先对副总理所说的几个误解提出说明，然后我还有个别的看法。

其中一件事就是相对军力。的确，苏联在最近 10 年里在相对力量上有所增进。这并不是导因于双方签订协议，而是由于科技进步，以及 60 年代的美国政权的错误政策，当时，苏联正在发展其战略武器。如果你仔细分析在 1972 年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之后的结果，从那时起，美国的战略力量和苏联比较已经加强了很多。在战略武器的范畴来说，当超过一个程度

之后，军事优势就不太容易解释成政治优势了。至于第二份协定，也就是海参崴协定，你一定从德文那里把我说的话翻译错了。从签订海参崴协定以来，苏联的兵力没有变化。由于苏联并没有拆毁他们过时的核武，他们目前有 2700 个，而这些都是 5 年以上的老旧武器了。而在他们签订海参崴协定后，他们还要减少 200 单元。

由于我们淘汰陈旧的武器单元，我们的总数略少于 2200。但是数字并不是十分重要，因为每个(美国)核武都可以携带更多弹头。还有，因为苏联喜欢大件的东西，但是这比较需要体积，所以他们有 85%—90%的兵力是在陆地上的，使得他们很容易被攻击，因为美国武力的准确度已经提高了。我们只有不到 20%的军力部署在陆地上，而且他们比较不那么容易被攻击。因此，在战略平衡上，我们比较落后，尽管美国本地许多报纸上的文章，为了政治考虑也是如此断言的。

自从 1960 年，肯尼迪总统以美苏导弹差距为议题而当选，尽管苏联当时只有 30 枚导弹，而且每一枚导弹都要花上 10 小时才能就发射定位，而我们拥有 1200 架战机应战。以后，每个美国总统候选人，都会以导弹差距竞选政见当做自己秘密的梦想，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危险是，每隔四年这个问题就会爆发一次。

我们并不反对你们公开的姿态，我们认为这大体是正确的，甚至是有益的。但是当你们用公开的姿态来针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非反对不可了。你指责我们背叛盟友，还故意鼓吹战争，自己却置身事外，而危及世界安全，但事实上，我们是以实际的行动来防止战争，而且维持世界均势。

你必须对我们的目标有正确的理解。如果你以为我们只是搞些微不足道的战术性花样的话，那对我们彼此来说都太可惜了。你们不要求恩惠，我们也不要求恩惠。正确的政策应该基于正确理解国家利益，并且互相尊重彼此对国家利益的理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总统来这里访问是有用的，这也是我们政策的目的。

我们不需要演戏，我们也不需要你们来分散苏联的能力，这将是大大错误，还有可能会导致与 1930 年代相同的灾难。毕竟，当我们是盟友的时候，我们曾努力阻止了苏联的扩张企图，我们将为了我们的理由而继续阻止他们，正如同你们也会为了你们自己的理由来阻止他们一样。

我重申，我们极为重视我们的关系。我们已准备与你们协调。我们相信你们是认真的，我们也同样的认真。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我们能够有一个有益的关系。

十五、你们每天都在骂我

1971 年 10 月 21 日，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说话连他的两名女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都不见得听得懂，而不得不手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点头后再译，难怪会谈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基辛格说：“……我浑身都是病，很快就会上天堂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和基辛格谈了 100 分钟，在基

辛格和毛泽东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的单独会谈中，两人纵论天下大事时，毛泽东担心美国会步慕尼黑协定的后尘，走向与苏俄妥协之路，不会为维护欧洲的安全而战，还引述那年八月《纽约时报》军事记者密特朗所写的一本书支持他的立论，并进而谈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均为犹太人所控制，毛泽东在病痛中所展现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使基辛格感到难以置信。叹为观止。

国务院

密件 / 事涉敏感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士：毛泽东主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长乔冠华、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副司长唐闻生兼翻译、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副司长章含之；美国国务卿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基辛格、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大使、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德

时间：1975年10月11日，星期二，晚间6时25分至8时5分

国务卿基辛格在傍晚5点45分和副总理邓小平会谈时，对方告知，毛主席希望在晚间6点半和他见面。对方要求他携同部分访问团成员出席，包括基辛格的夫人，基辛格希望毛泽东能亲自接见他和夫人，另外两名官员陪同他参加。接着，基辛格和邓小平又谈了15分钟。基辛格博士和同行诸人休息至6点15分，然后他们从人民大会堂前往毛主席寓所。

以上诸人依序引见给毛主席，彼此短暂寒暄，此时，摄影师拍照，并拍摄影片。会见的人包括基辛格、基辛格夫人、布什大使、桑乃费尔德参事、助理国务卿哈比卜、洛德主任、格莱斯廷和洛德曼先生和安妮·巴狄克女士。毛主席站着，谈话似乎是相当困难。当他看到基辛格夫人，他坐了下来，要了个拍纸簿，写下他要讲的话，说基辛格夫人的个头比基辛格还大。然后，毛主席再度站起来，欢迎其他的会见者。然后客人便被送出房间，美方客人只留下国务卿基辛格、布什大使和洛德。

参与会谈者围坐在扶手椅上，呈半圆形。整个谈话过程当中，毛主席讲起话来都是十分困难，若不是由唐小姐(唐闻生)和王小姐(王海容)重复他所说的话，确认没有弄错之意，才进行翻译，要不然就是由他的护士拿着一本记事本，让他把要讲的话写在上头。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毛主席都不断用力地用手和手指做出手势，以强调他的重点。

毛泽东：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很快就要上西天了。

基辛格：不会的。

毛泽东：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函了。

基辛格：我希望你还有很长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泽东：我遵照博士(即 doctor，医生，一语双关)的吩咐。

基辛格：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泽东：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辛格：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泽东：是有点重要，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

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泽东：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辛格：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是的。

基辛格：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给我这个？

毛泽东：好。（毛泽东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我看主席学英文大有进步。我说到，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不。（把两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着副总理邓小平）

基辛格：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方法有意见。

毛泽东：昨天，你们和邓小平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开始咳嗽，护士趋前协助）要是不管哪一边对另外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嘛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辛格：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对手，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比我们打过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也有许多看法相同之处。

毛泽东：那边是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是因为根据你们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其次是日本。

基辛格：那并不正确。

毛泽东：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用手指头数）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5个（举起他的5个手指头）。

基辛格：那并不正确。

毛泽东：所以我们有争议。

基辛格：我们是有争议。苏联对我们是重大威胁，但不是最高优先。

毛泽东：这样说不对。苏联是超级强权。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强权（用手指头扳数）。

我们落在后面，（数着自己的手指头）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排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瞧。

基辛格：我知道我几乎从不曾和毛主席意见不合，但他这一点并不正确，因为这只不过是我们优先顺序的问题而已。

毛泽东：（拍他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借由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你瞧，我们排第5。我们是小拇指。

基辛格：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泽东：但是你在中国能拿到台湾。

基辛格：我们在中国能拿到台湾？

毛泽东：可是，现在你们拥有中国的台湾。

基辛格：但是我们之间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泽东：100年以内。

基辛格：上次我到这儿的时候，毛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确是如此。

基辛格：比100年少得多了。我想用不着100年。

毛泽东：(用手做手势，计数)很难讲。5年、10年、20年、100年。实在难说得很。

基辛格：它听到这话从毛主席嘴里说出来，肯定大吃一惊。

毛泽东：不，因为上帝保佑你们，而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摇晃看他的手)因为我是个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指着三个美国人说)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基辛格：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遇到上帝，所以，我对这点实在不敢讲。

毛泽东：我敢讲。我已经82岁了。(朝着国务卿基辛格)你现在几岁啦？大概50岁吧？

基辛格：51了。

毛泽东：(指着副总理邓小平)他已经71了。(接着他的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他(指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你们还都还活着。瞧，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用。我们不会活太久了。

基辛格：我想就主席稍早提到我们的相对优先顺序这件事情再谈一谈。

毛泽东：没问题。

基辛格：苏联是超强，难免要优先，我们经常要应付它。但在战略上我们要遏阻苏联扩张，所以中国对我们而言有优先。不过我们不希望利用中国当跳板跳到莫斯科，因为那无异是自杀。

毛泽东：你们已经跳到那儿了，你们也用不着我们的肩膀了。

基辛格：我们还没有跳到那里，这只是阶段性战术。总统会向您证实。

毛泽东：请代我向贵国总统问好。

基辛格：我会照办。

毛泽东：我们欢迎他来访，你有什么办法帮我治治我现在这个说话不清楚的毛病？

基辛格：即使如此，您的意思我们都能懂。

毛泽东：(指着头)这儿不错，我能吃、能睡；(拍拍膝盖)这儿不灵光；不疼，可是走路没力气。我肺也有问题。总的说来，我身子不太好。

基辛格：见到您总是很高兴。

毛泽东：你知道我是会见外宾的样板。

基辛格：毛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记录，我认识那算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记录了，我们非常重视。

毛泽东：有些事我们也得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基辛格：我认为毛主席当时的基本评估，到目前为止，从情势发展看来，都证明是正确的，基本上我们都赞同。因为尼克松总统辞职，我们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得不运作一下，比我们愿见的要多些。

毛泽东：我认为那还可以，运作说得过去。

基辛格：那是很基本的，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毛泽东：欧洲现在太软弱了。

基辛格：我们与主席看法相同，欧洲的确太过软弱。

毛泽东：他们怕苏联。

基辛格：他们担心苏联跟他们自己国内的情势。

毛泽东：日本要争霸。

基辛格：日本还没有到能争霸的地步，他们的领袖还得有些改变(换

人)。可是，日本有成为霸权的潜力。

毛泽东：没错。

基辛格：我想，他们下一代的领导人，我的学生中曾根康弘，我在当教授的时候教过他……那一代比较有可能发挥日本的潜力。

毛泽东：欧洲太散，太松了。

基辛格：同时也没几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

毛泽东：对哦。

基辛格：下个礼拜会来中国访问的西德总理，施密特算是欧洲现在最强的领导人了。

毛泽东：法国怕德国。(扳着指头算)你们担心万一东西德统一了，就会变成一个拳头。

基辛格：是的，法国比较倾向让东西德一直分裂下去。

毛泽东：(点头称是)这样不好。

基辛格：可是，东、西德也可能在民族大义的基础上统一。

毛泽东：是，我们也赞成统一。

基辛格：还要看谁被谁统一。

毛泽东：西德人口 5000 万，东德只有 1800 万。

基辛格：事实上，西德也是比较强的一边。

毛泽东：可是两德现在统一的话，会很危险。

基辛格：我们也赞成两德统一。可是，如果现在要统一的话，苏联会动武干涉。无论如何。美国是支持两德统一的。

毛泽东：我们也同意，你们，跟我们。

基辛格：我们也不怕统一后的德国，可是，只有先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势力，才能谈统一。

毛泽东：不打一仗，苏联势力是不会减弱的。

基辛格：是啊，所以时机很重要，偏屈在水门案期间我们没有行动的立场，所以在政策上才要略作调整。

毛泽东：水门案好像没必要搞成那个样子嘛。

基辛格：真是不可原谅，不可原谅(唐小姐表示听不懂)，搞成那样子真是不可原谅。

本来只是一桩小事情，却给一群短视近利的家伙搞成全国性的、国际性的悲剧。尼克松总统是个好总统，(毛主席点头赞同)我现在还时常跟他联络。

毛泽东：请代我向尼克松先生致意。

基辛格：我回国就会跟他打电话。

毛泽东：那就先代我向福特总统致意，再替我向尼克松先生问好。

基辛格：两件事都乐意之至。

毛泽东：你太忙了。

基辛格：你觉得我出差太多啦？

毛泽东：我是说你太忙了，可是呢，好像你不这么忙也不成，你不忙就不成了。风雨欲来燕穿梭啊——

基辛格：我可得花上好几天仔细寻思这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天下不太平，风雨——暴风雨——欲来，风雨渐渐逼近的时候，燕子就忙起来了。

唐闻生：主席问我“燕子”英文怎么讲，还问我 sparrow 又是什么，我说那是另外一种鸟。

基辛格：是的。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做点儿事来阻挡暴风雨，不要像燕子对暴风雨无能为力。

毛泽东：该来的风雨还可以缓上一阵子，拖一下子，要完全阻挡可就难啦。

基辛格：所以呀，暴风雨要来之前，就要先站在最佳位置上，这可不是件小事。我同意你说风雨欲来，我们也想要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子上，不要逃避，而是要征服风雨。

毛泽东：敦克尔克。

基辛格：那不属于我们。

毛泽东：那样靠不住。8 月间有个《纽约时报》的军事通讯员出了本书。

基辛格：哪一位？

唐闻生：(征询过在座中方人士后)我们查出来再跟你讲。

毛泽东：你想，美国在欧洲部署的 30 万部队，经得住苏联一次的攻击吗？

基辛格：过去 10 年来，《纽约时报》一直看坏美国，认为只有战败的分。如果欧洲真的遭到攻击，我们一定会用核武器解决的。我们在欧洲有 7000 件武器，都不是搁在那儿来让敌方掠夺的。那还只是在欧洲，我们在美国本土的更多。

毛泽东：可是有很多美国人都不相信你们真的会动用到核武器。他们也不相信美国人会愿意为欧洲而死。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国内才刚刚度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一部分是因为中南半岛，一部分也是因为水门事件而起，那段期间很多失败的因素都已经公开。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最近 5 年间我们的所作所为，你会发现，我们对苏联从来不假以颜色，而苏联是节节败退。我跟你保证，总统也会再跟你保证，只要苏联敢动欧洲一根寒毛，我们一定用核武器伺候他。面苏联最好不要怀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你有信心，你信任核武器，你反而不太信任你们自己的军队？

基辛格：我们得面对现实，我们的兵不如苏联多。那是事实，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都不会去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如果他们国家的兵够多，一切就好解决了，所以我们才要配合现况摘出一套战略。

毛泽东：敦克尔克战略也并非不理想。

基辛格：主席先生，到头来，我们对彼此说的话还是互不信赖嘛。

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不会有敦克尔克战略的。如果真的发生攻击，只要我们成功阻挡攻击，在我们动用(核武)后，我们就可以战胜苏联了。

毛泽东：(以手指做手势)我们会用敦克尔克战略，我们会让他们先攻占北京、天津、武汉与上海，用这种战术，我们才能获胜面击败敌人。那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这样打的，胜利都要等一段时间的。

基辛格：我相信如果苏联在世界任何地方发动了大规模攻击，美国很快就会被牵扯进去。我也坚信，除非发动核战争，否则美国绝对不会从欧洲撤军的。

毛泽东：只有两种(撤兵)可能，一种是你说的，另外一种就是《纽约时报》说的，参议员高华德 6 月 3 日在参议院的演讲也反映了这一点。

基辛格：他说些什么？

毛泽东：我们会给你一份副本。6月3日参议院辩论外交政策问题时他说了话。

基辛格：重点是什么？

毛泽东：说他不相信欧洲。

基辛格：你得了解这一点，主席先生，今年是大选前一年，很多话都是为了国内效应而说的。20年来，《纽约时报》都站在特定立场上，报导错误的记录不胜枚举。

毛泽东：听说《纽约时报》是给一个犹太家族控制的。

基辛格：那倒不假。

毛泽东：好像《华盛顿邮报》也是。

基辛格：《华盛顿邮报》——已经不再如此了。（询问布什大使，布什指出葛瑞翰女士也是犹太人，她是麦耶先生的女儿。）没错，主席说的对。

毛泽东：他们那个女的报老板是犹太人。

大使（看着布什）在北京好像水土不服啊，你怎么没来看看我呢？

布什：今天晚上很荣幸可以在这里，我想您贵人公忙，无暇接见区区一名联络办事处主任。

毛泽东：我不忙，我才不管那些例行公事呢，我只看国际新闻。

基辛格：可是主席对美国国内发生些什么事情，知道的比我还多。我还不知道《纽约时报》又出了什么书，也没听说高华德的演讲。

毛泽东：你怎么会有时间嘛，你太忙了！

（向洛德）洛德先生，你最近升官了。

洛德：是的，主席先生。

毛泽东：（向布什及洛德）你们俩都升官了。

基辛格：他（布什）还没有。他在1980年将会升。

毛泽东：他能当总统。

基辛格：要在1980年。

毛泽东：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提高声调并用手拍打椅子）。你们一定要说毛主席是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就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觉。

基辛格：这对我们很为难，特别是叫你官僚。

毛泽东：准！（用手重击他的椅子），所有外国人都拍桌子并骂我的话，只会让我高兴。

基辛格：我们会考虑看看，但这对我们来讲还是很不自在。如果我们称主席是官僚的话，那一定是无关战略的战术手法。

毛泽东：但我的确是个官僚，这是苏联给我戴的帽子。

基辛格：但是，最近我没有看到什么苏联来的访客。

毛泽东：你们每天都在骂我，每天都骂。

基辛格：但对中国的评价我们跟苏联不同。

毛泽东：（在基辛格的话还没翻译完前）因此，我接受这个称号，官僚再荣幸不过。

而且你们也说过我是个战争贩子及侵略者。

基辛格：我？

毛泽东：在联合国的美国。联合国通过一项美国支持的决议案，宣称中国侵略朝鲜。

基辛格：那是 25 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没错，所以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辛格：是的。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我已经在你面前公开这些话。我也对许多来访的外宾说过，包括欧洲人在内。难道你没有言论自由？

基辛格：当然有。

毛泽东：我也有言论自由，我放的炮比他们放的炮还猛。

基辛格：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

唐闻生：你已经注意到……

基辛格：主席的炮。

毛泽东：请代我问候贵国国防部长。

基辛格：我会的。

毛泽东：我很满意他去访问日本竟然不来北京。我们要请他来这里，给苏联人瞧瞧，但是你们太小器了。你们美国人非常有钱，可是这一点你们实在是太小器了。

基辛格：当敝国总统来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这一点。

毛泽东：带他一起来。贵国总统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个文官和一个军人一起来。

基辛格：您是指我(文官)和史莱辛吉(军人)？

毛泽东：是的。但是我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你们派谁来由你们自己决定。

基辛格：好的，他不会跟总统一起来。也许以后才来。

毛泽东：我们希望邀请他参观我国东北、蒙古和新疆。他也许不会去，你大概也没有这个胆量。

基辛格：我会去。

毛泽东：(朝着布什看)他去过了。

基辛格：我一定会去。

毛泽东：好。

基辛格：我们已经试着向你示意，我们已经准备好就这些当中的一部分问题提供建议或是协助。

毛泽东：军事部分，我们下面不讨论。这类事情应该等以后战争开打了再说。

基辛格：是。但是你应该晓得，我们会预作准备加以考虑。

毛泽东：所以，会议可以结束了吗？

基辛格：是的。

(基辛格国务卿、布什大使和洛德先生于是向毛主席道别。基辛格和副总理邓小平确认，中方会发布这次会议的公开声明，而且会把声明文件立刻送到美方手上。美国人于是向其他中国官员道别，然后乘车离去。)

十六、我们不信任苏联

1975年12月2日，毛泽东与福特总统会面时，健康之坏可想而知，难怪他一见到福特，就说他病了，还怪基辛格命令他不得去见上帝，而福特居然不知毛泽东说的是反话，竟说希望毛泽东能实现他上天堂的愿望。由于毛泽东的身体不好，美方以为毛泽东会见福特，只是礼貌性的见个面而已，不会有实质性的谈话，岂知道一谈竟谈了110分钟，而且都是大问题，如西欧团结抗拒苏联的扩张，古巴充当苏联的马前卒，在非洲的安哥拉扩充势力等。在长达近2小时的会谈中，几乎没有双边关系的话题，而毛泽东不讳言双方的关系无甚进展，甚至一、两年内都不会好转，似乎这并不使他忧心，他担心的还是苏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制止苏联的野心，除了骂骂苏联之外。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的无奈和他的反苏情绪。

国务院

密件 / 非经许可不得流传

会谈备记录

参与会谈人士：毛泽东主席、副总理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外长乔冠华、中国联络办事处主任黄镇大使、副外长王海容、MFA 副司长章含之兼翻译、MFA 副司长唐闻生兼翻译：美国总统杰若·福特、国务卿基辛格、美国联络办事处主任布会大使

日期与时间：1975年12月2日，星期二，下午4时10分至6时

地点：中国，北京，毛主席寓所

(大约下午3点左右，中方告诉美国代表团，毛主席希望见福特总统。福特、福特夫人和女儿，以及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在下午四点离开总统行馆驱车通过紫禁城的前门到达毛泽东的住所。福特一行人在门口受到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其他官员的欢迎，并陪同进入毛泽东的小书房兼起居间。毛泽东站起来欢迎美国访客。当摄影师照相时，毛泽东与以下诸人握手及寒暄：福特、福特夫人、福特女儿苏珊·福特、国务卿基辛格、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总统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西斯科、助理国务卿哈比卜、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稳和所罗门。寒暄及拍照后，美国代表团只有福特、基辛格、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洛德留下，中国人员则有毛泽东，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副司长兼翻译章含之，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兼翻译唐闻生和毛泽东的护士。与会者分别坐在大扶手椅上围成半圆形开始对话。)

毛泽东：你好吗？

福特：好啊！希望你也一样。

毛泽东：我不好，我病了。

福特：我觉得您看起来很好。

毛泽东：我的样子看起来还不坏。对了，国务卿先生好吗？

基辛格：我很好，很高兴能来这里。

毛泽东：其他的美国朋友好吗？

福特：他们都很好，我们今天上午进行的讨论很有收获，主席先生。

毛泽东：你们都谈些什么？

福特：我们讨论与苏联的问题，根据国际整体形势所必须采取的对应行动，以及贵我两国为了共同利益而必须采取的对应行动。

毛泽东：我们能力不够，只能放空炮。

福特：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泽东：在骂人方面，我们有些能力。

福特：我们也可。

毛泽东：你们也可？那么我们就达成一项共识了。

福特：我们可以以武力对抗一个制造许多麻烦的国家。

毛泽东：这个主意不坏。如此一来，我们又达成另一项共识。

福特：我们今天上午非常具体地讨论我们现在正在讲的那个国家。

毛泽东：那不是别人，就是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者。

福特：今天上午讨论的时候，有人话说得很重，主席先生。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你批评了他。

福特：我们强烈地批评了另一个国家。

毛泽东：在北方的那个。

福特：是的。

毛泽东：你们的国务卿现正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愿闻其详。

毛泽东：他不让我去见上帝，他甚至叫我不听上帝的，不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他太厉害了，我没办法，只有听他的。

基辛格：我们很高兴。

毛泽东：说真的，我没别的想法，没有任何办法。他(基辛格)下了一道命令。

福特：命令上帝？

毛泽东：不，命令我。(毛泽东用中文和黄镇说话)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你还要回(美国)去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总统先生，你还需要他吗？

福特：我们当然希望他回去。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大使回去和布什留在北京是一件重要的事。

毛泽东：(跟布什讲)你还会留下来吗？

布什：只留下几天。

毛泽东：你升官了。

福特：是的，他升官了，我们将在一个月内提出新的继任人选。

毛泽东：我们非常舍不得他走。

福特：他是一个卓越的人材，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不过，我们会派同样卓越的人来。

毛泽东：那很好。看起来，让黄镇回美国似乎比较好。

黄镇：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可我也真的想待下来(中国)，因为我已经出国太久了，可是还是要听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你应该多留在那里一、两年。

黄镇：是的，我一定会回去并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一些年轻人曾经批评他(黄)，请两位(指王海容和唐闻生)也对乔老爷乔冠华有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否则落到他们的手中肯定吃不完兜着走，这简直是在打仗，现在贴出许多大字报，也许你可以到清华和北京大学去看看。

福特：我看不懂那些文字，我想你要大使多留一、两年的意思，是我们将继续维持两国间的良好关系，主席先生。

毛泽东：是的，是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将持续，依我看，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之间现在没有什么大事，也许今年，明年，或是后年，我们两国之间也不会有大事发生，也许往后，情况会变得好一点。

福特：在此同时，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应该在国际场合作得更密切，防止一些国家，如苏联挑拨离间。

毛泽东：是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信任苏联，邓小平也不喜欢苏联。

福特：对于他们在全局的领土、经济和其他方面全面扩张的阴谋，我们有类似的感受，但是，我们会迎接这种挑战。

毛泽东：太好了，我们也会迎接他们的挑战。

福特：主席先生，明年之后，我们期待在双边的基础上改善贵我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在双边基础上确实改善关系的时机到了。

毛泽东：你指的是我们之间？

福特：是的。

毛泽东：很好。

福特：同时，主席先生，假如贵我两国在东西方一起迎接苏联的挑战，那么，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会在美国国内获得更多支持。

毛泽东：太好了，不过，这只是空口说白话，至于苏联将如何行动，则有待观察。

福特：主席先生，同时，我们必须让苏联信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不是空话，而是以行动作后盾。我们将继续对他们施压，我希望来自东方的压力也像我方的行动一样强。

毛泽东：只是放几发空炮，骂街而已。

福特：我们会做得更多，主席先生，就像我们过去一样，而且，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坚强。未来也会坚强，不只是文字，不只是空炮。

毛泽东：所以，你们有实弹？

福特：是的，我们要枕戈待旦，应付他们的挑战。

毛泽东：那没问题，那不错，是的，你们现在是和平共处。

福特：不过，那不代表我们会规避任何扩张主义国家的挑战，事实上，我们已经迎接了挑战，而且将继续迎接挑战。

毛泽东：很好，我们要不要达成一项协议？

福特：(点头称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成这项目标，你们从东方施压，我们从西方施压。

毛泽东：是的，君子协定。

福特：那是对付非君子的最好方法。

毛泽东：他们不是君子。

福特：这比我们今天上午使用的措辞温和。

毛泽东：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相互友好。

福特：主席先生，这是美国人民和我最大的愿望。很明显的，美国人民完全支持过去三年贵我国间的历史性发展，就像我们一样，他们承认，必须拿出力量来阻止像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按照我们的看法，维持并准备使用武力是维持世界稳定与发展的最好办法。

毛泽东：很好，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冲突。

福特：没错，即使有冲突，我们也会坐下来讨论，想办法化解。

毛泽东：真的，中美两国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冲突在所

难免。

福特：但是，这妨害我们观察国际大环境的能力，一起努力并坚决追求两国及全人类最大利益。

毛泽东：(咳了一下)例如，我们从未与苏联进行过像你我之间这样的讨论和交谈，我到过莫斯科两次，而赫鲁晓夫到过北京三次，没有一次真正好好地谈过。

福特：主席先生，我见过布里兹里夫先生两次，有时候谈得很好，有时候谈得不好，我认为，这就象征了我们立场坚定，因为我们不赞同事事附和他们，未来还是如此，我们的态度持续强硬，而且整军纪武，他们了解：我认为，只有坚定立场才符合贵我两国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我们所想要的。

毛泽东：很好。你们和日本的关系现在怎样了？比以前好？

福特：是的，正如主席所知，我大约一年前访问过日本，这是现任的美国总统首次访日；大约一个月前，天皇夫妇访美，这也是天皇首次出访美国，我们感觉，现在是美日关系自二次大战以降最好的时候。

毛泽东：日本也受到苏联威胁。

福特：我同意，主席先生，因此我认为，改善中日关系就像改善美日关系一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双方关系已经是历来最好的了。

毛泽东：对日本来说，和你们的关系是排第一，与我们的关系是排第二。

福特：你们和日本的关系很好吗？

毛泽东：不坏，也不太好。

福特：你希望双方关系是更好，是吗？

毛泽东：是的，他们有亲苏派，反对谈反霸。

基辛格：或许只是害怕谈吧。

毛泽东：是的，没错。

福特：你们与西欧各国的关系如何，主席先生？

毛泽东：比较好，比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好。

福特：我们与西欧以及你们与西欧保持良好关系很重要，都有助于对抗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泽东：是的，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点，我们在欧洲没有利益冲突。

福特：事实上，主席先生，我们当中有些人相信中国对于西欧统合和强化北约组织所作的贡献，比西欧部分国家为他们自己所作的更多。

毛泽东：他们在分散了。

福特：部分西欧国家没能像他们应有的强大及直率。

毛泽东：依我看，瑞典不错，西德不错，南斯拉夫也很好，荷兰和比利时有点落后。

福特：说得对，苏联正企图利用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弱点，我们必须加以阻止，而且，我们正试着这么做。

毛泽东：是的，葡萄牙目前似乎比较稳定了，情况似乎改善了。

福特：是的，在过去 48 小时里，它的情况令人非常鼓舞，我们支持的武装力量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采取行动稳定债势。我们同意你的看法，南斯拉夫相当重要，而且有力地对抗苏联，但是，我们担心铁托之后的情势发展。

毛泽东：铁托之后可能是卡迪吉执政。

福特：不过，我们关心这个国家的问题和外在压力，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当地各个派系都与境外组织有联系。

是的，它有这么多的省份，而且是由许多前共和国组成。

福特：我有过一次非常有趣的旅行，主席先生，今年夏天我去了一趟罗马尼亚，而且，我对齐奥塞斯率总统的特立独行和实力，印象深刻。

毛泽东：很好。

福特：我们也关心西班牙的情势，主席先生，我们支持国王，我们希望他能够控制一切不利其政权的因素，我们将与他一同努力控制转型期间的各种情况。

毛泽东：是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如果欧洲共同市场能接纳他们，最好，为什么欧洲共同市场不要西班牙和葡萄牙？

福特：主席先生，即使是佛朗哥当政时，我们都敦促北约盟国对西班牙友善点，我们也希望新国王登基后，西班牙更能够被北约盟国接纳，此外，我们认为欧洲共同市场应该回应西班牙政府想与西欧统合的行动，我们将竭尽所能地从两方面来促成这件事。

基辛格：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不够激进。

毛泽东：是这样吗？真的，过去他们曾经彼此打过仗，而且过去你们也没有谴责佛朗哥。

福特：没有，我们支持新国王，因为西欧南部必须团结一致——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假如我们想阻止苏联的扩张企图，所有这些国家国力都必须增强。

毛泽东：很好，而且我们认为希腊应变得更好。

福特：是的，他们度过一段困难期，但我们觉得新政府已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会帮助他们，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再次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

毛泽东：那很好。

福特：当然，希腊有一股过激分子，我们不赞成，而且会削弱北约，给苏联可趁之机。

毛泽东：哦？

福特：当我们向地中海东部推进时，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西奈协议有助于降低苏联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推动更广泛的和平不能有任何停滞，下次美国大选一结束，我们就会全力推动和谈，并在那个地区达成一个广泛、公平及永久的和平。

毛泽东：永久的和平很难达成。

福特：是的，几百年以来他们都没有达成，不过得努力去做，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大大削弱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假如和谈停滞不前，将会给予苏联捣乱的机会；因此，我们相信，和谈必须继续推进，而且，西奈协议已经帮助我们发展与埃及的友好关系。假如我们在下次选举后推动其他国家达成更广泛的和平，对于排除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我不反对这样做。

福特：当移向南亚次大陆，我们希望透过在印度洋加西亚岛的基地发挥影响力；当然，我们会继续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已经解除对巴国的武器禁运，他们将能够发展足够的武力，来警告印度，如果印度胆敢轻举妄动，就会自讨苦吃。

毛泽东：那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你认为孟加拉国的形势如何？

毛泽东：那里的形势现在已经改善，不过仍然不稳定；我们打算在那里派驻一名大使，也许，他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抵达那里。

福特：你是否关切印度将利用目前的情势。入侵并对孟加拉采取军事行动？

毛泽东：有这样的危险，我们必须小心。

福特：据了解，主席先生，印度已经对其他国家采取不明智的行动，我希望他们不要对(孟加拉国)下手。

毛泽东：的确，假如他们在该地区采取行动，我们将表示反对。

福特：我们正与巴基斯坦和伊朗一起阻止印度的行动，而且，我们将谴责这种举动。

毛泽东：是的，我们又达成另一项共识。

福特：我相信，你和我们一样关心苏联在印度洋的活动，以及他们在东非的活动，我们强烈反对这种情势发展。当然，我也在此提到安哥拉，我们正在当地采取断然的行动阻止苏联在非洲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你们能用的方法似乎不多，我们也一样。

福特：我认为，我们一起可以做和更好，主席先生。

毛泽东：我赞成把苏联赶走。

福特：假如我们好好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做到。

毛泽东：经过刚果——扎伊尔，金萨沙。

邓小平：(用中文和毛泽东交谈)那里的捣蛋分子就是南非，南非介入了，整个非洲的黑人都很生气，整个情势更乱了。

毛泽东：南非的名声不好。

福特：但是，他们正为了阻止苏联扩张而奋战，我们认为那是值得钦佩的，我们正经由赞比亚和扎伊尔投入大量金钱。我们相信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国家采取广泛的行动，我们就能够阻止苏联取得非常重要的海军据点，以及控制安哥拉的丰富资源；而且，我们强烈反对古巴的实质介入，他们目前已有5、6千名部队在安哥拉，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很不好。

邓小平：你的意思是你们钦佩南非？

福特：不，他们在对抗苏联上立场坚定、而且是完全自动自发的，没有受到美国任何鼓励。

邓小平：在安哥拉。

福特：南非正在对抗“安哥拉全民解放运动”(MPLA)

毛泽东：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福特：时间是关键。

毛泽东：在我看来，“安哥拉全民解放运动”似乎不会成功。

福特：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不会成功。

基辛格：假如其他两支军队纪律够严明，再加上我们提供装备，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阻止他们；他们“解放安哥拉国家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联盟”(UNITA)需要熟悉游击战的人训练，假如有人可以训练他们，我们将提供装备。

毛泽东：过去，我们曾透过坦桑尼亚支援他们，但是，坦桑尼亚曾扣留过某些通关货物，也许，现在我们应该经由扎伊尔运送。

邓小平：可能经由扎伊尔运送比较好。

基辛格：经由扎伊尔。或许中方也可以动用对莫桑比克的影响，如果莫桑比克不支持亲苏的“安哥拉全民解放运动”，那对非洲具有道德精神上的意义。（中方内部有讨论）

毛泽东：不过，你知道，莫桑比克支持“安哥拉全民解放运动”，要透过他们运送装备可能相当困难。

邓小平：不可能。

基辛格：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了解他们目前的作为，因为他们也非常尊敬中国。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基辛格：我不认为莫桑比克了解安哥拉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些建议，而他们比较愿意听中国的话，更胜于听美国。

毛泽东：我们能试一下。

邓小平：我们能试一下，可是不一定有效。

基辛格：那倒是真的。

毛泽东：扎伊尔可能更可靠。

基辛格：扎伊尔应该是一个积极援助的基地，虽然我们无法得到莫桑比克的帮助，但是他们可能会置身事外，即使得到莫桑比克的帮助，但至少他们将保持中立。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福特：我再次重申，时间是关键，因为其他两支武力需要支援；一直到最近他们做得很好，但目前陷入僵局，假如经过贵我和其他国家的努力后，“安哥拉全民解放运动”还是获胜，那将是一场悲剧。

毛泽东：那很难说。你认为这就是整个情况吗？

福特：关于安哥拉问题，在离开华盛顿前，我批准了另一笔 3500 万美元的援助给另外两支军队，表示我们坚定对抗苏联挑战和击败“安哥拉全民解放运动”。

毛泽东：好。（中方摄影师进入室内并开始拍摄影片）

福特：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以便我们双方讨论国际情势，以及表明我们扩大双边关系和在许多、许多国际问题上携手合作的意愿。

毛泽东：是的，目前有一些报纸形容我们的双边关系恶劣，也许你应该透露一些消息给他们或是跟他们简报。

基辛格：贵我两国都应该这么做。这些记者在北京也听到一些消息。

毛泽东：不过，那不是从我们这边传出去的，是那些外国人透露的。

福特：我们不尽信报纸上讲的，主席先生。（摄影师离开房间）我认为两国在全球制造我们关系良好的印象，非常重要；当我回到美国后，我将公开表示我们关系良好，而且，我希望你们的人也这么做；不但拥有良好的关系重要，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关系良好也同样重要。

毛泽东：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

福特：我们也会这么做。

毛泽东：好啊！

（当摄影师照相时，美国客人起身与毛泽东握手并道别，毛泽东表示，他要送福特总统到外厅；在护士的搀扶下，毛泽东和福特走到外厅，在那里，

美国访客再次向毛泽东道别，此时镁光灯闪烁；福特感谢毛泽东并表示，双方从速次谈话中部有收获；基辛格说，他很高兴毛泽东遵守他的命令，不去天堂；福特说，他希望纠正一下基辛格，这样毛泽东就可以上天堂了，不过，他和基辛格都补充说，这件事不会很快进行；毛泽东则表示，他还不能走，因为他还要遵守基辛格的命令；基辛格说，这项命令继续有效。其余的美国访客和毛泽东握手并道别，美国代表团在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官员的陪同下走到屋外，然后搭车离去。)

1975年12月1日到5日福特总统访问中国5天，福特明告中国将依日本模式进行正常化，只是他还需要些时间，并感谢中国的耐心等待。福特需要时间主要是次年为大选年，不愿在和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贸然行事，影响选举的胜算。

福特和基辛格与邓小平谈起范锡时，信心十足的说他若想回到政府工作，还得一段时间。”

会谈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超向美国买高速电脑，但美国怕影喝和苏联的关系，顾虑重重，使邓小平很不高兴，此时基辛格特别献策，嘱中国驻美大使先向美方口头提出要求及说明想买的电脑类型，美国会找符合中国需要的电脑，同意出售。从基辛格对中国面授机宜的情形看，此公着实对中国体贴入微，而他在中国当权滚心目中的地位，始终不衰，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5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福特、国务卿基辛格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再度会谈。

邓小平：坦白的说——我希望不会冒犯你——在和苏联打交道方面，或许我们比你们有点经验。

福特：容我说，副总理先生，我们跟他们打交道已有一些经验。正如昨天我所指出，我们在许多方面跟他们正面挑战过，我们也将继续这么做，不过我认为，如果您能指出有哪些地方和方式，不管是在东南亚、中东、或非洲，贵国现在在做什么以因应这种挑战，那我们就更了解如何以行动配合，这样子，对我们今天坦率的对话也会有帮助。

邓小平：(脸上看起来，明显的有些紧张)我们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我们自行准备，扎实的准备。第二，我们发了几次空炮弹，包括鼓励美日加强关系，鼓励欧洲团结一致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我相信你们也了解，我们告诉欧洲人，现在苏联的军力强过美国加上西欧……

(在广泛讨论国际事件，包括安哥拉问题后，[邓小平对中国在安哥拉的角色有所顾忌，但建议美国进一步“介入”]，话题转向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困难。

福特先表示感激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耐心，并向邓小平保证，美国政府将依循日本模式。但是，他仍谨慎行事，未声明把关系正常化列为优先，而只是向邓小平保证，他会在大选过后，以较有利的地位建立外交关系，不过，这可能将“花上一段时间。

毫不意外地，邓小平一点也没表示要让步。他重申毛主席提过有关不可能和平转移的公式化表述，并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家事。邓小平在提出对在中国作战失踪美军的调查报告后，也指责达赖喇嘛的问题，并提出买高速电脑的要求。尽管这种电脑可能作为军事用途，基辛格对打破出售军事

相关科技给中国的限制很有兴趣。美国政府那时已经同意英国把劳斯莱斯飞机引擎卖给北京的计划。福特和基辛格热切的回应显示，他们乐于多帮点忙，或许可以缓和近来的紧张。）

邓小平：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感兴趣的東西你们可能不能提供，例如，运算速度千万倍的电脑。我们不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关系。

基辛格：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拒绝提供苏联某些类型的电脑。（邓小平朝痰盂吐了一口痰）我认为，我们可以批准相当高品质的电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我们对苏联的政策同时能维持住就好。

邓小平：我想这种问题可以透过贸易管道协商，你们如果现在觉得窒碍难行，我们也不在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福特：副总理先生，原则上我们非常渴望在电脑方面能够提供协助，我认为我们做得到。当然这些事情可以交给贸易人员讨论，但我想以我们整体的态度，可能在这方面会有进展。

邓小平：好。

基辛格：我可以提个建议吗？副总理先生。

邓小平：可以。

基辛格：我知道你们的正常程序是透过贸易管道。但这会有一个后果，就是说，你们可能会要求某种特别类型的电脑，然后要我们作决定，我们可能会因为和苏联而非中国的关系，加以拒绝。如果，贵国大使能事先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我们便可以找符合你们需求、确定你们一定会赞成高品质的类型，我们能和电脑公司合作。因为这里头有许多可能对你们有效的不同品牌。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技术上不同的类型，同时又能保持对待苏联的原则，那我们就能提供你们，我们也一定做得到……那用意是赞成不是拒绝。

福特：国务卿建议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程序，我希望你能了解，副总理先生，我们非常急于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如果我们依循正确的程序，我们就很有可能合作。

邓小平：好。我们是这么认为，我们先研究这个课题，再进一步考虑。我们认为解决，或是不解决这类特殊问题，对我们的整体关系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中方都发出笑声）

（福特和邓小平讨论完正式议题，话题转向其他问题，包括韩国、日本、进一步谈到西藏，以及中国农业和人口过多问题：邓小平承认：“我们的国家仍落后”。东北亚的讨论包括标准式的美国警告朝鲜对南韩的威胁，短暂讨论日本军团主义潜在威胁，以及防止东京在南纬扮演砍治或军事角色的意见交换。讨论过程中，基辛格和福特对前国防部副部长范锡——也是民主党外交政策首席顾问——语多讽刺。显示他们两位[指福特、基辛格]对 1976 年大选过度自信。）

邓小平：当年范锡率领世界事务组织代表团到中国时，我们和他讨论过(朝鲜)问题。

福特：你稍早提到范锡。他是我在法学院念书的同学。我想他不会再回政府机关任职了，即使会的话，也要一段时间。

十七、邓小平能否复出，是关键转折点

这次基辛格主持的国务院内部会议，以讨论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情势为主。参加的官员可说是处理中国事务的一时之选。1975年7月6日那次会议的原班人物之外，多了汉密尔，职务是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原任此职的哈比卜则升为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原任亚太事务副助卿的格莱斯廷转到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去了，取代了所罗门的位置，阿姆斯特朗则接替了格莱斯廷亚太副助卿的职务，此人也出生于中国，恒、来、安可说是老中国通，而宋贺德和霍罗茨则是新一代的中国通了。宋那时是中国及外蒙事务科科长，霍罗茨是情报研究局亚太处长。

国务院会谈备忘录

密件 / 未经授权不得发布

日期：1976年10月29日

参与会谈人士：国务卿基辛格、政治专务国务次卿哈比卜、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汉密尔、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格莱斯廷、副助理国务卿阿姆斯特朗、中国科科长宋贺德国、情报研究局亚太处处长霍罗茨

主题：中国的形势发展。

基辛格：你们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如何？

汉密尔：我们很想听听你们自己的见解及指示。

基辛格：我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利用你们的智慧，针对当前中国形势的发展做出评价。等会儿，我也会谈一谈我的评估。

格莱斯廷：大体来说，我们不能辩驳媒体的说法，但我们对当前的平衡态势有某些不确定感。

基辛格：怎么发生的？有政变吗？

格莱斯廷：中国可能已发生政变，或许温和派会以制止政变为借口发动政变，他们认为反对极左派的行动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

基辛格：我看不出有政变的企图。

阿姆斯特朗：我不认为真有政变，不过“四人帮”强烈反对新的权力分配。

基辛格：新的权力分配如何？

阿姆斯特朗：华国锋与温和派结盟。

格莱斯廷：我们发现周恩来逝世开始出现的一种态势，张春桥一干人等反对邓小平，但也有人反对张春桥。

汉密尔：中国人说这是反对周恩来的攻势，因此造成了其他的人反对“四人帮”。

不过，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过去。这是毛泽东的两条路线斗争，分做两派，也就是理想派对务实派的斗争。毛泽东常在不同的时候支持不同的派别，常在两派间倒来倒去。

格莱斯廷：毛泽东是仲裁权力的人以及给予实力的人。毛泽东支持极左派攻击周恩来，结果邓小平就垮台了。

洛德：我们也不应该忘掉毛泽东曾说，女人最讨厌。（指江青）

基辛格：的确，毛泽东曾经重复说过好几次。

哈比卜：回到政变问题上，“四人帮”曾尝试集结任何特定的军事单位

吗？我经常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军方是关键。评估军方未来的动向是非常重要的。

格莱斯廷：有一些揣测认为，极左派可以获得来自东北与上海各一个师的支持。但没有证据显示军方已有反应。

哈比卜：北京卫戍区的动向如何？

汉密尔：他们确实在计划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但没有纯属军事的动作为。所以说，有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正在酝酿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绝对没有军事政变这回事。

基辛格：早期极左派可以接受华国锋，为什么后来极左派不接受他了呢？

格莱斯廷：极左派是可以“忍受”华国锋，而不是“接受”华国锋。

阿姆斯特朗：根据可靠的报告指出，邓小平垮台后，毛泽东就提拔华国锋接掌领导职称。

霍罗茨：后续的发展可能是，华国锋可能成为党主席，张春桥担任总理。

洛德：极左派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霍罗茨：有可能。

格莱斯廷：但是，极左派与张春桥走过头了，超出了他们拥有的权力范围。他们没有成功，在他们夺权的过程中，他们已激怒当权源，情势就像斗牛士屠牛般鲜血淋漓。

虽然他们仍然继续干，但也受到限制。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再次发动攻势，他们知道应该夺取重要战务，也可能正因为这样，温和派才会反弹。

哈比卜：罗慕洛(菲律宾外长)在纽约透露，他曾问中国外长乔冠华解放军是否支持华国锋，乔冠华回答罗慕洛，没错。

洛德：解放军在集会中证实此事。

格莱斯廷：有人提到党、人民和军队。

霍罗茨：周恩来逝世与邓小平遭下放后，极左派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有潜力。

基辛格：邓小平调动大军区司令员用意何在？(1973 年底邓小平曾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

格莱斯廷：毛泽东、邓小平都认为该这么做，还有人称赞邓小平的做法。

汉密尔：文革后，解放军拥有太多的权力，中央军委同意邓小平的做法。

哈比卜：据说叶剑英元帅仍然支持邓小平，而且他对邓小平遭到解职相当愤怒。

基辛格：是的，叶还为此离开北京。

格莱斯廷、汉密尔：叶颇受尊重，他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辈份相同的人。

汉密尔：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解放军是和温和派站在一起的。

格莱斯廷：但是解放军并非一个完全同质的团体。

基辛格：解放军是那些人？

格莱斯廷：叶剑英与各参谋长。还有权力很大的各大军区负责人。陈锡联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韦国清为广州

军区领导人。

基辛格：江青在各省的追随者有没有怎么样？

汉密尔：有些人显然被逮捕了，不过说法是，他们大部分人曾听命于新的领导班子。

基辛格：“四人帮”会被处死吗？

格莱斯廷：我不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被监禁，就象刘少奇的遭遇一样。

基辛格：“四人帮”在哪里？

格莱斯廷：北京。

阿姆斯特朗：事实上，他们被隔离不能对外联络。

汉密尔：他们被隔离了。

格莱斯廷：隔离是关键。

汉密尔：追随他们的红卫兵和学生已经被遣送下乡，当声势壮大时，这些人(指学生和红卫兵)也会就范的。

基辛格：他们会废掉“革命京剧”吗？如果这样的话，至少我就不需要再在北京忍受它了。

洛德：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中国会加强开放文化交流。

基辛格：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吗？毛泽东挑选的三位领导人都先后下台了，政治局成员也伤亡惨重。而 1971 年(注：指林彪事件)之后，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也下台了。周恩来生病的时候，也遭到猛烈的攻击。

格莱斯廷：很显然，周恩来从 1973 年起就被攻击了。

基辛格：1973 年，毛泽东发起批水浒运动，也开始批孔。同年起他们完全忽视周恩来，也没有人再谈起周恩来。

汉密尔：确实，整肃领导层伤害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路线朝令夕改也把每一个人都搞糊涂了。

格莱斯廷：不难看出其影响。乔冠华在纽约时就小心翼翼。其他的人也是戒慎恐惧。

基辛格：我们和乔冠华在纽约见面时，乔知道高层整肃的事吗？

汉密尔：乔冠华很谨慎，防卫心理很强。

基辛格：华国锋现在控制住形势了吗？

格莱斯廷：华国锋是党主席，不过他并没有独立的权力来源。他必须小心。他成功的机率是 5 对 5。

汉密尔：如果华国锋失败了，将严重打击中国的民心。

格莱斯廷：邓小平能否复出的问题很重要，会是关键的转折点。

基辛格：毛泽东的遗体已经在展示了吗？

格莱斯廷：还没有，不过，我想应该会。在 10 月 6 日与 7 日的高层决定已经宣布了。

基辛格：周恩来还比较受欢迎。周恩来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可能继承毛泽东吗？

格莱斯廷：应该会。

阿姆斯特朗：如果新领导人批毛泽东的话，就会动摇民心。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与斯大林的混合体。

汉密尔：这么做对新领导人而言将是非常危险的。

汉密尔：林彪垮台后，有人指责林彪误导毛泽东，走上歪路。

基辛格：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如何？我不相信林彪在飞机阿姆斯特朗：我们确信林彪已经死了，他在逃跑时死的。

格莱斯廷：可能林彪的飞机没油了，也有报导说飞机上发生枪战。不过，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林彪究竟在想什么？或许他比毛泽东还要亲苏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

汉密尔：这实在令人沮丧，我们总是突然知道，而无法预知。不过，林彪本人也是如此；江青也是如此。

基辛格：我把很多事情怪在国务院头上，不过这件事不包括在里面。

格莱斯廷：这种事很难分析。

基辛格：中国在华盛顿的联络处这几天在做什么？

哈比卜：他们照常请客。

汉密尔：不过，谢启美(中国驻美参赞)最近已停止鼓吹强硬路线。

格莱斯廷：毛泽东死了以后，他才停止这种做法。中国联络处目前是快乐而谨慎的。

阿姆斯特朗：根据一些报告，中国其他的大使馆似乎也都赞许中国发生的事情。

汉密尔：我们由东京获得一份关于中国大使馆副馆长的报告，他所说的中国反苏的转变应该不是真的，但我们可以把他说法解读为，这可能是一个和我们关系的直接的讯号。

基辛格：中国的这种变化，对外交政策有何意义？

基辛格：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的外交政策如何？

汉密尔：我们预期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会较为软化。

格莱斯廷：应该是，但对我们也会比较软化。这种政策比较成熟老练。

哈比卜：中国为什么要对苏联软化？

基辛格：这样在战术上比较聪明，可以加强本身的力量。

格莱斯廷：中国过去的苏联政策是自我伤害。他们会调整，但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仍然存在。

汉密尔：苏联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与我们的关系是次要的。中国会调整他们的对苏政策以符合他们的战术需要。

格莱斯廷：这些假设的前提都是中国领导层要能团结一致。

汉密尔：中国的转变很慢很慢。过去你到中国时，决定是否要接待你的人，可能只有两位。可是现在不同了。

基辛格：那两个人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再加上叶剑英。叶剑英给我们的印象不怎么样。

格莱斯廷：如果林彪攻击那个政策(指与美国改善关系)，那么叶剑英愿意和你挂钩，就代表军方支持亲美政策。

格莱斯廷：我们送过林彪礼物，对吧？

洛德：对的。

基辛格：我们实在不知道叶剑英是谁，那必是中国的一桩大事。

汉密尔：现在类似的决策由委员会来决定。

格莱斯廷：现在他们想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与全国人大会议，批准他们的决策。

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好转吗？

格莱斯廷：是的。

基辛格：小麻烦会停止吗？

格莱斯廷：当他们制造小麻烦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注意。

基辛格：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他们与史莱辛吉的行为令人气愤。他们甚至跟史莱辛吉讲总统(尼克松)在北京谈到的安哥拉的内情。

格莱斯廷：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不会有大变，但他们的行为应该规矩。

基辛格：日本怎么样？

哈比卜：日本非得吞下反霸(即反苏)的子弹不可，然后才能签约了。日本必须先大选，然后才能签约。(编按：意指“中日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权条款)。

格莱斯廷：这并非已定案。中国不喜欢日本首相三木武夫。

哈比卜：他们也不喜欢福田纠夫啊。

基辛格：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三木武夫？

格莱斯廷：因为他对苏联太好了。

阿姆斯特朗：他迄未接受反霸条款的文字。

格莱斯廷：我曾问中国联络处的人关于三木武夫的事，他们回答说，他对苏联太好了。后来，李先念也曾告诉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希望日本做得多些，但也不要做太多。

显然，中国很怕日本变成一个大国，特别是军事大国。

基辛格：我们有关债务赔偿的提议怎么样？他们会接受吗？

阿姆斯特朗：如果其他有关“关系正常化”的事处理好了，有可能。

基辛格：关系正常化还不可能。问题是关系正常化须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格莱斯廷：我们不能说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应该试试看。

基辛格：1974年讨论的有关台湾的建议如何？我们该怎么办呢？打仗吗？

洛德：我们唯一的筹码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格莱斯廷：唯一确实的答案是，如果中国解放台湾，就他们与苏联的关系而言是很冒险的，而且也不能不顾日本与美国的反应。

基辛格：我们必须向国会回答这个问题。

洛德：最好的做法是发表单方面声明。

(国务卿暂离房间，随即返回)

基辛格：大选过后，我看正常化根本就八字都没有一撇呢。

汉密尔：中国会对这个问题施压，难道不会吗？

基辛格：非不能，不应该，他们不该这么做的。

汉密尔：中央情报局告诉盖兹(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中国还无力进军台湾。但重点不在这里，这是比较高层次的。在较低层次的领域里，中国可能攻击台湾外岛，采取除了攻击台湾本岛之外的其他施压措施。

基辛格：假如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进军台湾一事对他们而言，会不可抗拒。我们说我们要求和平解决是没有约束力的。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会能做些什么呢？

格莱斯廷：(台湾)法律的地位并不明确。我们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没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基辛格：在我们这里说来，去跟我们承认的国家开战，而且，我们还

派驻大使在那里，为了一块我们承认属于他们国内的领土而战，实在非常荒谬。

汉密尔：长远看来，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台湾决定加入北京，或者如果双方能自行达成协议。就我们的观点这将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阿姆斯特朗：这可能性很小。

格莱斯廷：的确，几乎不可能。

洛德：中国可能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

汉密尔：他们会这么做。台湾谈论独立将会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基辛格：他们正在这么谈吗？

汉密尔：没有。

格莱斯廷：如果他们这么搞，就会被完全孤立。

哈比卜：这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基辛格：问汉密尔高华德这封信是要干嘛？(编按：高华德参议员一向大力支持台湾。)

汉密尔：是关于你决定台湾不应该拥有独立的飞机生产设备。

基辛格：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汉密尔：是不符合。

基辛格：我们不批准什么？

汉密尔：我们不批准他们设计和制造教练机，这是我们所不能掌控的。

基辛格：中国的转变对它的国内政策有什么影响？

汉密尔：他们会更支持军方的需求；也会提出经济刺激方案，提高经济增长率。

格莱斯廷：但他们不会提高太多工资。

基辛格：因为那儿没有东西可买？

汉密尔：他们想增加生产力，就必须跨越意识形态的束缚，要同意多劳多得。

阿姆斯特朗：他们仍然有这样的问題；在意识形态狂热与把做好工作之间取得平衡，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等等。

基辛格：可能毛泽东是对的。意识形态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将使中国积弱，温和派则使中国停滞不前。没有左派的话，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官僚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他们会回到半军阀国家吗？看看捷克与波兰，我想任何共产国家都管不好经济。

格莱斯廷：近几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就已经不那么平衡了。最后可能还要趋于无效。

基辛格：自周恩来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没那么高明了。

霍罗茨：过去一年内政也失去了方向。

基辛格：印度搞得比中国好吗？

格莱斯廷：不，中国人搞得比印度人好。

基辛格：但是，在军事上中国落后了……

汉密尔：尽管有共产党的官僚体系，中国应该比现在更上轨道。

(然后，汉密尔说，他有件特别的事要请示国务卿，阿姆斯特朗、宋贺德、霍罗茨等离去。)

十八、基辛格下台前的最后一次密谈

这次的会谈极具历史意义，因为此时卡特已击败福特，当选为总统，距离卡特走马上任剩下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范锡内定为国务卿，已进驻国务院，准备接收。基辛格和黄镇见面的主要目的即介绍范锡给黄，向黄传递美中关系正常化不会因政府更迭而有所改变，福特说范是他在耶鲁法学院念书时的同学，福特认为范想由在野之身变成在朝主政，还得有相当一段时间，言犹在耳，宾主已经易位，福特和基辛格即被迫下台走路了，基辛格自我解嘲说，每隔一段时间，国务院就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当权派会被夺权，靠边站。

黄镇似对基辛格下台后的出路颇为关心，他看到报载基辛格可能出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董事长，特向基辛格求证是否属实，基辛格否认有此事，不过表示很愿意过过董事长的瘾。

黄镇见基辛格，除借此认识范锡外，并给了范一个下马威，重申中国“断交、废约、撤军”的正常化三条件。

这时距尼克松历史性的中国破冰之旅已快5年了，但尼克松原计划在他总统任内完成的正常化，已因水门案而成泡影，基辛格苦撑到下台前，也是师老无功，美国和中国建交要等两年后，才在卡特的“三条件”后完成。

机密 / 不可流传

会谈备忘录

参与会谈人士：中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联络处参事钱大镛、翻译徐尚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尚未接任之新任国务卿范锡、政治事务次卿哈比卜、国务院幕僚洛德

日期：1977年1月8日(星期六)下午1时16分至2时40分

地点：国务院八楼·晚宴厅

(在将范锡介绍给黄镇和与会的其他来宾后，基辛格对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而范锡则回答了一些问题。)

基辛格：范锡，无论何时你到北京去的话，你的身材就不保了。

黄镇：范锡先生在1975年曾经访问过中国。当时我也在北京，但是没有机会见到你。

范锡：是的，我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食物真的是非常好，不过，我没有增加太多体重。

黄镇：你在中国待了多久？

范锡：大约三个星期。(范锡接着把他当年在北京和上海的行程重复叙述了一次。而国务卿则开了个玩笑，调侃他把无关宏旨的事情也搬到台面上来讲。)

基辛格：我正在试着说明这里的流程……迟早……哈比卜先生是最资深的外交家。

我相信范锡到这里来的时候，一定以为他可以在国务院当家作主，但是他们(指职业外交官)迟早会逮住他(即控制之意)的(笑)。

范锡：已经有人警告过我了，我以前就认识他，也共事过。

基辛格：国务院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一次文化大革命(笑)。

(基辛格开始回忆他在中国的秘密之旅，以及《上海公报》的谈判内容。)

基辛格：我们谈成了《上海公报》，赛(范锡的小名)，通常是晚餐和几杯茅台下肚以后才讨论的，我大多数的讨论过程都是用中文进行的(笑)。

黄镇：《上海公报》里有些措辞是你创造的(笑)。

基辛格：我做出的让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谈出了如何表达一个中国的概念。我们制造出来了一个模式，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对这个立场不持异议。

黄镇：正如你所说的，在《上海公报》里，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就知道中国的政策了，我们严正反对任何想要制造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或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阴谋。

基辛格：也许我可以把两国的关系所告诉范锡的话整理一下，然后黄大使可以看看我说的对不对。首先，我告诉范锡我一直认为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算是我们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主动出击，也算是国际形势里最重要的环节。在《上海公报》和其他公报里，我们表达了对霸权危险的关切，也提到了对世界霸权危机的关切。由此出发，我们接着开始把我们计划和其他主要国家举行的会谈内容先行充分的照会中国。毛主席在几次和我的广泛会谈，以及两次和美国总统的会谈中，谈到了中国在国际情势方面的论点，在许多重要论点上，他的意见和我们是并行不停的。

黄镇：他与你见过5次面。(指毛泽东和基辛格)

基辛格：我们等他们(指侍者)弄好了以后再接着谈。

(指着在场的中国人)他们都是老朋友了，都是在互相访问的过程中认识的。

范锡：亨利，你去了中国几趟？

基辛格：九次。

董镇：其中你有五次和毛主席会面。我们的毛主席可能和基辛格博士谈的最久，次数很多。不论是国际情况，双边关系，和我们对国际大事的看法，毛主席都陈述了他的见解。我们也谈到我们的共通点，最重要的共通点，就是我们都反对北极熊(笑)。

范锡：是的。

(接着大家喝了茅台酒，并祝福老朋友和新朋友。)

基辛格：在台湾问题方面，我们确认了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在许多场合里，我们也澄清了，我们不会支持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或是黄大使刚才很正确地提到的其他模式。我们还没找到正确的模式(在回答翻译的问题时，他重复说“精确”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了解，这个过程(指正正常化)一定要完成。

黄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白，我们提到了三个要求：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美军撤出台湾，还有废止和台湾的条约。既然基辛格博士和范锡先生都是老朋友了，而且范锡先生也在两年前访问过中国，今天，我就老实不客气的提出一个问题来。

最近，我们发现在这期的(时代杂志)里，有一篇卡特总统的访问，在访谈间，他公开称呼台湾为“中国”，还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摆在对等的地位上。我们觉得，这种言词，已经违反了《上海公报》的原则。

范锡：关于卡特总统的谈话这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上海公报》应

该被视为主导我们双方关系的指导原则。(哈比卜此时正在和国务卿谈话，而中方则等待他们的谈话结束。国务卿说，一如往常，他刚才是在等哈比卜给他指示。笑)

黄镇：老实说，《上海公报》构成了目前中美关系的基础，只有双方都严格遵守公报原则，两国的关系才能持续改进。任何违反公报原则的行为，都会伤及中美关系。

范锡：我这么说好了，我完全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基辛格：既然现在我们平息了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解决其他的议题吧！(笑)

黄镇：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困难了。

(双方接着有一些言不及义的闲聊，包括因为吃了太多的中国食物，而引发的“体重问题”。)

黄镇：不久之前，我遇见了一位好朋友，他也是你们两位的老朋友了，就是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

基辛格：是的。

范锡：是的，他要去中国。

黄镇：他不只介绍布里辛斯基和范锡先生及布鲁门梭(卡特时的财政部长)先生给我认识。当时我们已经和基辛格先生认识了。他告诉我们，你们都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范锡：对的。

基辛格：我不是。

黄镇：范锡先生，你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吗？

范锡：我曾经是。

基辛格：三边委员会就像是一个流亡政府。所以现在我想上那里去，并且祝福范锡先生。

黄镇：洛克菲勒先生将于1月21日抵达中国。

范锡：是的。

范锡：我几天前的晚上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在去日本旅游之后会去中国。谈到三边委员会，他们自今天起要开会，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把委员会里头所有的人都派进了新任政府里，委员会里已经找不到人去东京开会了。

基辛格：赛，我一直相信我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中国友人，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他们不见得会完全同意所有的细节，但是这样的坦率的对话，有益于增进双方相互的了解。

范锡：我当然希望我们能够持续这样的直接而坦率的对话。

黄镇：我们也想这样做。

(此时中国代表之间有些讨论，这些谈话没有翻译。)

范锡：卡特总统要我代他向华主席(指华国锋)致意，并强调我们很重视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持续进展。

黄镇：我会向华主席转达他的致意，我也请你代我们向卡特总统致意。

范锡：谢谢你，我会的。

黄镇：(向基辛格)我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你卸任后的将来，各方争相聘你。最近的消息是哥伦比亚广播网(CBS)的董事长将要辞职，而他可能请你接任。这是真的吗？

范锡：真的，亨利？

基辛格：哥伦比亚广播网的董事长是我的好朋友，而只要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对他来说，辞职是不可思议的。你想得到他会辞职吗(问范锡)？

范锡：不能想像。

基辛格：他是我的好友，我们经常在社交场合见面。我倒真想做做什么的董事长(笑)。

范锡：那倒好，我就有对象抱怨了。

基辛格：我喜欢主席这种头衔(笑)。

哈比卜：你可以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黄镇：主席的地位就像总统一样。

基辛格：但是我们的宪法让我不能当总统。

黄镇：这提醒我了，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会谈的时候，你告诉过毛主席关于美国宪法的规定。

基辛格：对的。毛主席对我的政治前途很关切。

(接着又是一轮的闲谈和敬酒。黄镇谈到他最近的南方之旅，而基辛格则是回忆起他第一次到中国的访问。)

黄镇：从你的第一次秘密访问后，时间过得真快。

基辛格：几乎有6年了。我还记得所有通过巴基斯坦传过来的通讯内容。

范锡：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这件事公开后，我读了那次访问的报导。那在历史上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基辛格：我想那次的中国之旅是我个人最兴奋的时刻。

范锡：在你的生涯中？

基辛格：当然，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中国式的外交风格。正如同我曾公开表示过的，我学到了中国人说话算话，我们都可以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所说的话。

范锡：是的。

黄镇：我还记得在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也说过这样的话。你还说你对记者谈到这点的时候，你把我们和另一边(指苏联)做了一个比较。

基辛格：没错。

黄镇：我们也多次提出，简单来说，我们和俄国人交往的经验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第一，他们欺善怕恶。第二，他们的话通常都不可靠(笑)。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软化，如果你们软弱了，北极熊就会吃定你了。

基辛格：我的印象是，如果你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的国务卿(编按：范锡当过国防部副部长)，那么他对力量的真实意义会比较了解。

范锡：真的，我想我很了解力量的真意。

基辛格：你知道吗，我在范锡获得这个职位六个月前，就提名他坐这个位子了。(洛稳此时说，他无论如何还是得到这个位子了。)当时我正参加《时代杂志》的董事会，他们问我如果我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发生，就算卡特胜选的话，我希望由谁出任国务卿，我告诉他们：“范锡。”

范锡：你瞧，他真的是主席。

(在接下来的敬酒与闲聊里，基辛格宣布，如果新政权逐步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将“全力支持。”)

黄镇：我们的领导人不断地和你谈到我们对美苏关系的看法，那就是

美国要保护世界各地，这关乎它的既得利益，而苏联寻求扩张主义。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现象。举例来说，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就是，他们对东方采取的手段是声东击西，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西方国家。

基辛格：我也告诉大使这可能是事实，但是对我们来说，无论全球均势如何被打破，都没有差别。我们必须对欧亚两洲同样关切。

范锡：是的。

黄镇：(在和中方人员讨论过后)我们也知道你们的看法。

基辛格：我不否认事情可能会像你们预测的那样，你也晓得，在这次总统大选里，总统当选人(卡特)的话题集中在强化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关系，从而建立强大军事力量。

范锡：(对基辛格说)在这方面我或许可以有些看法，正如亨利所说的，在这次大选里，卡特曾在好几个场合中表明，卡特政府的主要外交策略之一，不只是为了强化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政治关系，还要加强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兵力……

(范锡接着讨论了如何加强北约兵力的计划，来确保他们的装配是适当的，并且有迅速反应的能力。)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大使先生，我们的海军已经有远见，所以在过去五届的总统里，有四名都是出身海军的(范锡和基辛格开始讨论四位总统的名字。)

基辛格：事实上，过去五任总统都是。

范锡：独占现象。

黄镇：我认为范锡先生关于检阅北约兵力的谈话很重要，正如我们曾和基辛格博士说的，西欧国家太软弱了，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团结并且加强他们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欧洲需要美国，反之亦然。我们希望你们能加强你们对等的合伙关系。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慕尼黑的想法在西欧已经死亡，因为这种想法，会让人失去警戒，而降低人民的战斗意志。如果情况变成这样，他们的军队会失去作战的士气。

基辛格：欧洲内部的情况很复杂。大使先生，你以后就要和我的朋友范锡先生打交道了。我很高兴你赏光来拜访我们。

(在闲聊之后，洛德护送中国人员到外门口出入口。)

——全书完——

